

# 第一章 緒 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壹、研究動機

東南亞(Southeast Asia)一詞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才出現的，主要是為方便同盟國對軸心國作戰，所做的區域劃分。當時英軍的 Lord Louis Mountbatten 綜理同盟國聯軍東南亞指揮部，管轄北回歸線以南的領土。<sup>1</sup>目前學術界所規範的東南亞區域主要包含下列十個國家，這些國家同時都為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Nations, ASEAN)成員：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新加坡、汶萊、越南、緬甸、寮國、柬埔寨。前五國為東協創始國，後五國則依入會的先後順序排列。

東協成立於一九六七年，主要是著眼於戰略和安全的考量。初期主要的國家有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以及泰國（隨後又於一九八四年加入汶萊）。這些非共產國家的集合，除「響應」美國的反共號召外，也為抵抗共產黨向外的領土擴張政策(Expansionism)。同一時間，北越、寮國及柬埔寨也組成印度支那共產國家組織(Communist Indo-Chinese Nations)。除了這九國之外，緬甸這時宣布中立，不參與雙方角力。一九五〇至一九七〇年代，美國因應冷戰局勢施行全面性的圍堵政策，同時責成菲律賓、南越以及泰國等國家，成立東南亞公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防止共產黨的「外溢」。冷戰結束，美國在失去共產主義的威脅後，乃戮力於國家經濟的發展，將焦

---

<sup>1</sup> 蔡百銓譯，D. R. SarDesai 著，《東南亞史》(Southeast Asia: Past and Present)。台北：麥田出版，民 90，頁 1。

點放在與歐盟、獨立國協、日本、中國、中東，以及拉丁美洲間的經貿往來。東南亞頓時失去美國關愛的眼神，不過也由於列強甚少關注，加速其區域整合的腳步。<sup>2</sup>

一九五〇年代，東南亞國家在政治上採行「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之策略，左右游移於冷戰時期的美蘇兩強間。另一方面，東南亞諸國在經濟上的表現，逐漸從原先保守的進口替代工業(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慢慢轉型到出口導向策略(Export-Oriented Strategy)的經貿走向。學者估計到公元二〇〇〇年後的未來，渠等國家可以進入新興工業化國家(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NIEs)的行列。不過，一九九〇年代末期（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間）的亞洲金融風暴打亂了學者的預測及該等國家的願望。亞洲金融風暴後，使東南亞國家除了整頓財政和金融外，也開始朝區域整合的目標邁進。此外，人民幣在風暴中屹立不搖的表現，讓東南亞諸國有更強的意願與中國合作，重新拓展經濟及貿易往來。<sup>3</sup>此外，由於中國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南中國海的政策方針，再加上「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的簽署，讓東協與中國之間因為南沙群島(Spratly Islands)的紛爭，暫時劃下休止符，共同致力於「拼經濟」的願景。

東協經過四次的擴編，一九八四年首先同意汶萊加入。一九九五年越南加入，緊接著緬甸和寮國於一九九七年加入，最後在一九九九年准許結束內戰的柬埔寨入會，完成該區域國家的入會行動，使東南亞的整合更趨完整(ASEAN-10)。除區域整合外，東協也與歐盟每年定期舉行高峰會，商討合作事宜。近年，「東協加一」或是「東協加三」的東亞區域整合，正如火如荼的展開，而

---

<sup>2</sup> Clark D. Neher, *Southeast Asia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Er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9, chap. 2.

<sup>3</sup> 張惠玲，〈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共區域霸權目標之影響〉，《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2 期，民 89.02，頁 51-66。

東協內部也催生彼此間更進一步的合作－東協自由貿易區 (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另一方面，東協讓昔日強勁對手－中國加入區域整合運動，東協成員國有著不同的盤算，期望藉由中國對東協成員不同國家間的關稅減讓及貨品輸入限制的放寬，有助東協國家在經貿上進一步整合。並希望經由彼此的合作，建立起由十七億人口組成、國內生產毛額總值高達2兆美元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China-ASEAN FTA)。

二〇〇三年十月八日在印尼召開的東協會議，中國與東協成員簽定了包括「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邁向(面向)和平與繁榮戰略夥伴關係聯合宣言」，以及「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之補充議定書」在內的三份文件，透過上述文件的簽署，中國實質上已成為東協的「第十一國」。其中，「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是在一九七六年由東協五個創始成員國在峇里島簽署，是東協成立以來第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官方文件，可被視為東協國家相互關係的行為準則。另一方面，在此次會議中，中國與東協迅速達成一項特殊關稅減讓計劃的協議，這項為期三年的計劃，中國將對東協國家的農產品及製造業關稅減讓，讓東協諸國實際受惠，作為雙方建立世界最大自由貿易區的基礎。

從東協與中國的產業結構、人力資源等面向來看，兩造在諸多要素上皆屬相仿，尤其是在貿易及產業上的相似性頗高。且中國與東協國家尚屬開發中國家，彼此相互競逐外資及市場，中國甚至與東協處在相互競爭的局面。<sup>4</sup>但是，從一九九七年在吉隆坡舉行的第一屆「東協加三」高峰會議開始，中國隨即積極地尋求融入東協及東亞區域整合的計畫，雙方要在二〇一〇年建立自由

---

<sup>4</sup> John Wang and Sarah Chen, "China-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Shaping Future Economic Relations," *Asian Survey*, Vol. 43, No. 3, May/Jun., 2003, pp. 507-526.

貿易區的願景即是其中重要議程之一。<sup>5</sup>這些過程的轉變及中國與東協間的「攻防」，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地方。此外，中國與東協的關係一直處於「不穩定」的狀態，要到冷戰結束後彼此間的交流速度才慢慢回溫。中國與東協的互動過程中，彼此間態度的轉變、雙方同意暫時擱置南海主權爭議，這都是值得從中瞭解及關切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在冷戰結束之後，國際社會的互動已漸漸由政治、軍事上的衝突，轉移到經濟、貿易上的合作與競爭。在一九六〇年代，全球共有十九個區域經濟組織，其中歐洲有五個、拉丁美洲有七個，而亞洲僅有兩個；不過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區域經濟組織已經增加到三十二個，而這當中又以歐盟(European Union, EU)、北美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 NAFTA)，以及東協較為重要。<sup>6</sup>此外，受到全球經濟區域化的影響，亞洲各國也積極展開區域經濟合作的整合運動，這當中東協扮演著火車頭的急先鋒。不過，東協自一九九二年起推動的東協自由貿易區計畫，似乎不若規劃藍圖中的「波瀾壯闊」。東協內部針對關稅、市場開放等議題，都僅限紙上談兵。再加上東協諸國在一九九〇年代都屬經濟成長極高的地區，美歐國家的投資者更趨之若鶩，紛紛捧著大把鈔票競相投資。所以，在當時的氛圍下，區域合作對東協來說並非「利之所趨」。

無奈一九九七、九八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攪壞了一池春水，也促使東協欲進一步整合來達到先前的榮景。此外，有鑑於東協內部國家發展腳步不一，東協需要藉由「外力」來達到其內部的整合。東協最終選擇了中國，中國也樂於與東協「策略聯盟」。中

---

<sup>5</sup> 社論，〈台灣正逐漸成為東亞政經整合的孤兒〉，《中國時報》，<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4+112003101200133,00.htm>，民 92.10.12。

<sup>6</sup> 蔡學儀，〈亞洲經貿區域化與台灣因應之道〉，《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2 期，民 92.03-92.04，頁 24。

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為何而形成？中國與東協雙方都各自盤算著自身的利益，兩造間的互動過程是誘發本論文進一步探究的主要動因，也促使筆者有動機來研究「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這個新的研究領域。另一方面，本論文將嘗試以「東亞區域主義變遷」之角度，藉由東亞三大區域主義—亞太主義(Asia-Pacificism)、東亞主義(East-Asianism)，以及東協主義(Aseanism)—之交會與變遷，做為本論文之最主要的理論基礎及佐證依據。

## 貳、研究目的

東亞區域主義充斥著三條路線的競合，分別為：以美國為主的亞太主義，中、日兩國相互競逐的東亞主義，以及以東協為主體的東協主義。本論文從東亞區域主義的觀點出發，並將之作為東亞區域整合所處之「環境」，通過東亞三大區域主義間之交會與變遷，探討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之形成。本文首先就有關之理論及文獻，進行分析與討論；其次，從歷史面向回溯東協及東協加一的發展時程，企圖從中得到啟發；再者，探討中國與東協間之互動過程，進一步理解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形成之因。茲就本論文之主要研究目的說明如下：

(一) 將本文重心置於「東亞區域主義」，針對三大區域主義在東亞區域結構中的變遷與消長，做出分析與探討。同時，經由三者間的互動過程，說明在此一情境下，對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形成之影響。另一方面，從歷史的面向探討東協及東協加一的相關演變過程，並嘗試從中取得區域整合之動機與關鍵點。此外，亞洲金融風暴對東協及東亞區域整合，有著重要的地位。金融風暴後東亞區域整合速度，有增溫的趨勢，且不論是東協內部整合的再強化，還是「東協加一」、「東協加三」的整合。本文亦針對金融風暴對東協諸國及東亞區域整合的影響，提出回應與探討。

(二) 以政治經濟、軍事安全及區域結構三個面向，探討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形成。其中，又以前兩者為分析的重點。在政治經濟的考量部分，亞洲金融風暴在中國與東協間就自由貿易區的形成，扮演著重要及關鍵的角色；在軍事安全的面向上，「中國威脅論」的論調、南海問題，均為中國與東協間進一步合作的障礙。雙方需在建立彼此間信任後，才有邁步合作的空間；至於，在區域結構的因素部份，筆者嘗試將中國與東協在此間的互動變化與東亞三大區域主義作一結合。本文通過上述三個面向的探討，企圖從中理出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形成的原因。

## 第二節 研究架構、研究途徑與方法

### 壹、研究架構

在冷戰結束之後，國際社會的互動已漸漸由政治、軍事上的衝突，轉移到經濟、貿易上的合作與競爭。本文將後冷戰的國際政治格局、全球化下的國際政經局勢，視為當前國際社會之現況、背景與氛圍的描述。在此一國際大環境下，國際間為因應當前的政經局勢，由區域主義所延伸出的多項區域整合運動及機構，做為在此一趨勢下、區域主義間競合的自保及應變之道。在東亞區域的部分，潛藏著三大「品牌」的區域主義：亞太主義（美國為首）、東亞主義（中國與日本相互競逐影響力）及東協主義（東協主導）。三者彼此間的互動及交會，也可以視為國際社會政經局勢發展的延續。

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顯然是受到了國際政治、經濟，以及歷史變遷的制約。冷戰時期，在東西雙方壁壘分明相互對峙下，東亞的區域主義不是在反映美蘇強權的制約，就是顯示出南方國家的無奈。但是，隨著冷戰的結束及外來影響力的減弱，東亞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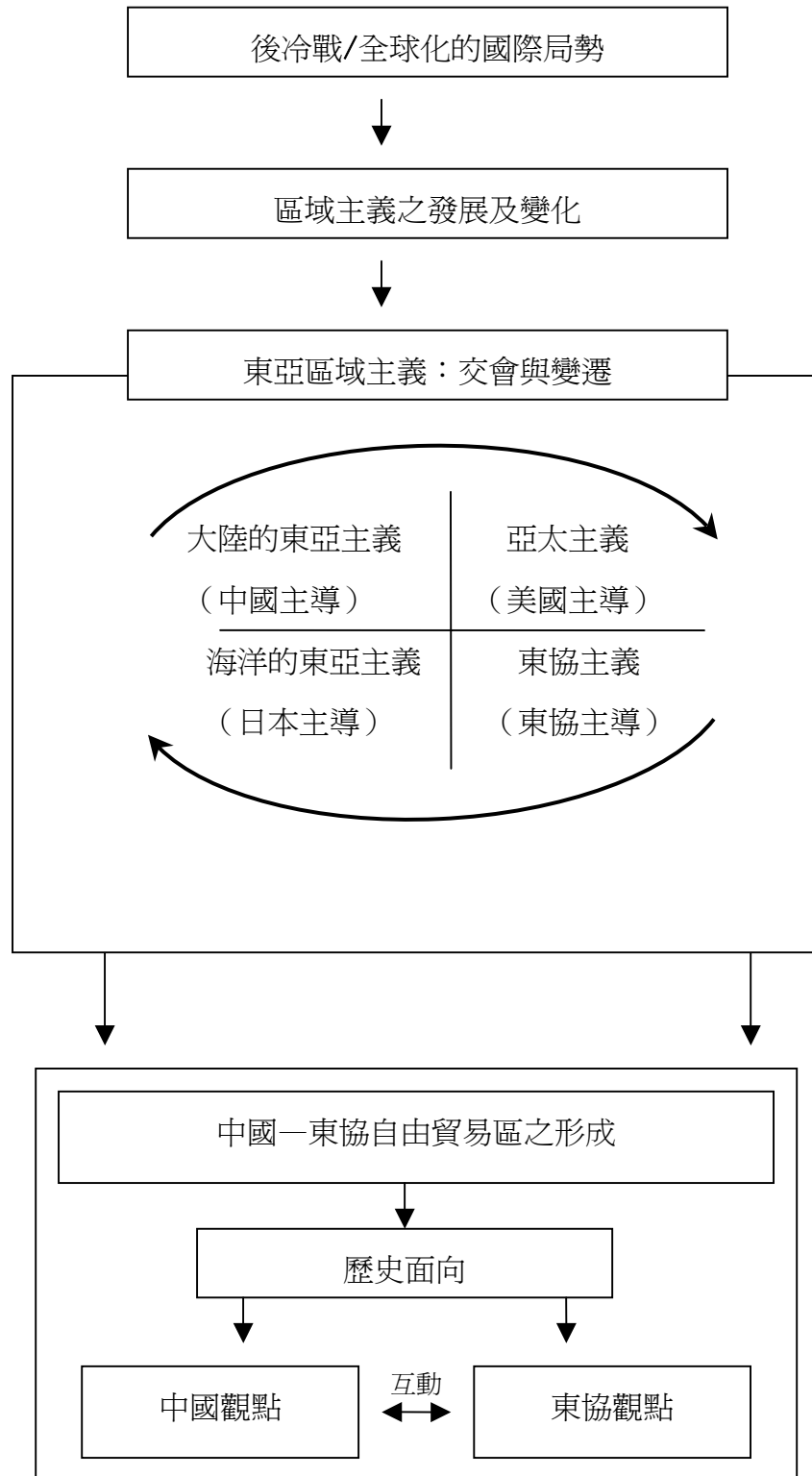
國的自主性逐漸提高，較有能力抗拒區域外先進國家的支配，也更有能力推動利己的區域主義。新的東亞區域主義，嘗試建立起「亞洲認同」(Asian Identity)。另一方面，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道路並不平順，冷戰時東協主義者依附在美國為首的集團羽翼下；冷戰後，又受制於美歐國家的「干涉內政」。所以，東亞國家在面對美歐國家概念下的「自由經濟區域主義」(Liberal Economic Regionalism)時，總是以「亞洲價值」(Asian Values)來回應。<sup>7</sup>

在東亞區域主義的交會與變遷下，探討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之形成，依此構成本論文之「論文場域」。最後，茲就本論文之研究架構圖，圖示如下(圖 1-1)：

---

<sup>7</sup> Hyun-Seok Yu, "Explaining the Emergence of New East Asian Regionalism: Beyond Power and Interest-Based Approaches," *Asian Perspective*, Vol. 27, No. 1, 2003, p. 263.

圖 1-1：論文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至於，在本文章節安排部份：第一章為緒論，旨在說明本文之相關研究論述；第二章重點為「東亞區域主義」的交會與變遷，本章將運用區域主義與整合理論的觀點，同時藉由國際合作之論點，檢視中國與東協在區域合作上的互動過程。以及以國家利益的觀點，嘗試探討此間相關國家的互動與對外政策出發點；第三章主要探討東協及東協加一，相關發展歷程。其中，針對亞洲金融風暴究竟是區域整合發展的逆流？抑或是區域合作的契機？做出回應及分析探討。再者，就東協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東協加三」，以及「東協加一」的發展與近況，做一說明與討論；第四章的重點主要為東協加一之相關因素探討，將從東亞區域主義的交會與變遷的觀點出發，探討、分析中國與東協間的互動。同時以政治經濟、軍事安全及區域結構三個面向，嘗試說明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形成」的原因；最後，第五章則為結論的部分，除提出本論文之研究發現，亦就未來研究方向說明之。

## 貳、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依照方法論上的界說，研究途徑(Approach)與研究方法(Method)實為兩種雖具有相關性、但其運用時機仍不盡相同的概念。研究途徑主要意指：選擇問題與相關資料的標準；而研究方法則是指：蒐集與處理資料的手段和程序。<sup>8</sup>茲就本論文中所引用的相關研究途徑與方法，說明如下：

### 一、研究途徑(Approach)

在研究途徑部分，本文主要運用「歷史研究途徑」(Historical Approach)。此一研究途徑主要運用歷史資料，描述和分析歷史事實；歷史研究的目的主要為描述歷史事實，從而指出某一特定時

---

<sup>8</sup> 朱泓源編，《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88，頁160-162。

空背景下發生的歷史事實，是否有關聯性、前因及後果；此外，歷史研究是從個別歷史的因果關係，來「重塑過去」的一個過程，其著重的在於特定的時空，同時研究的是事實間或是行為間的因果關係。<sup>9</sup>另一方面，歷史研究途徑著重從廣泛、詳細的相關研究作品中，進一步來發現模式。Earl Babbie 認為，通常這個研究途徑偏向去處理一個特別的理論及規範。<sup>10</sup>所以，歷史研究途徑主要是運用歷史資料來描述和分析事實。同時，該研究途徑嘗試釐清歷史事件間的因果關聯性，進而尋求事實的真相並加以分門別類，做出解釋和分析。

## 二、研究方法(Method)

本論文之研究方法主要採取「文獻分析法」(Documental Analysis)，文獻分析法又可稱為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文獻分析法必須經由廣泛的蒐集，並且閱讀、整理相關理論之研究成果。同時，針對中西文書籍和文獻進行研究。除閱讀外，還須將內容加以分析，並充分利用相關期刊、統計數據、報紙、專書、法規條文及政府出版品等，以利研究。最後，針對研究標的進行深入探討，並進一步尋求進階文獻。

# 第三節 研究的範圍與限制

## 壹、研究範圍

在研究範圍方面，可細分為「研究標的」及「研究時間」兩個部分加以說明。在研究標的部分，本文主要的研究標的為中國

---

<sup>9</sup>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92，頁164-170。

<sup>10</sup> 李美華、孔祥明、林嘉娟與王婷玉等譯，Earl Babbie 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下〉》(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台北：時英出版社，民87，頁511-520。

與東協。值得注意的是，本論文僅嘗試處理東協及東協加一，整體事務之發展和整合運動的形成及演進，並不著重於東協十個國家個別之發展與比較。倘在文章中觸及的重要議題，有牽涉到東協個別國家時，筆者會審慎處理和回應，避免偏離分析和處理的研究標的。

至於，在研究時間部分，主要分為兩條路線：一條為「東協路線」，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九七、九八年間的亞洲金融風暴前後；另一條則為「東協加一路線」，主要是從一九九七年到現在的發展。由於亞洲金融風暴可以視為東亞區域整合更積極推動的關鍵，且「東協路線」到後來有與「東協加一路線」匯流發展的趨勢，所以筆者在相關議題的處理上做了此一區分。由於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整合時程是「動態」的現在進行式，本文應盡最大的可能，貼近最新的整合議題與合作計畫，目前僅將歷史的時間點延續到二〇〇四年初。

## 貳、研究限制

區域研究所要考慮到的變數相當複雜且繁瑣，所涉及的領域及相關理論觀點，均相當廣泛。所以，要達到完整且周密的內容及精闢的分析探究，著實不易。筆者嘗試做最大的努力，企圖克服相關限制，同時也遵循「價值中立」的原則，以期本文能有一定的水平及標準。在個人研究限制方面，除本身無法親赴相關地區作實證研究外，蒐集的資料過於龐雜，另礙於經費及個人能力所限無法面面俱到。此外，相關資料之蒐集整理、分類尚未完整，使章節安排上不甚完備。至於，在論文相關議題分析的部分，由於著重廣度，衍生出在分析方面深度不足的缺失，實為本文尚待加強的部分。另一方面，受到外語能力不足的影響，對於日文及東協相關國家語言的不瞭解，導致無法閱讀多方觀點之相關文獻，亦造成研究之另一限制。

最後，關於本文書寫「體例」的部分，在文章中出現的外國人名（日人使用漢字除外），均統一使用英文標示不另作中文翻譯；再者，由於第三章探討東協及東協加一歷史面向，故在該章中出現的區域組織名稱，其後會再加註英文名稱及縮寫，前文（第一、二章）若已加註者仍為之，為免造成誤解特此說明之。

## 第二章 相關理論觀點的探討

### 第一節 區域主義與區域整合的發展

根據Bela Balassa在其著作*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中的看法，區域整合可依其整合程度的高低，分為五種不同的層次（由低而高排序）：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關稅同盟(Customs Union)、共同市場(Economic Market)、經濟聯盟(Economic Union)，以及完整的經濟聯盟(Full Economic Union)。<sup>11</sup>首先，「自由貿易區」意指區域內國家同意消除關稅及限額的措施，不過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的國家針對第三國及其他貿易規範，不受此一限制；其次，「關稅同盟」在區域內免除關稅及限額，對外則採取共同的關稅稅率；再者，「共同市場」除具備關稅同盟條件外，主要著重在區域內生產要素（人員、資金、勞務、商品）的自由流動，至於對區域外的生產要素則採取一致的規範及限制；至於，「經濟聯盟」意指各成員國除同屬一個共同市場外，在財政、貨幣、工業、運輸，以及其他區域發展和經濟政策均採取一致的運作方式；最後，在「完整的經濟聯盟」架構下，區域內各國已經形成單一的經濟實體，同時由超國家機構(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來掌理、統籌實施單一的經濟政策。

區域整合始於五〇年代的歐洲，到了六〇年代則有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開發中國家間的整合運動。七〇年代在東南亞地區，該等國家也因安全上的需要籌組東協，進行進一步的區域整合。在八〇年代時，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成立，除破壞區域整合的行情外，也帶動另一波區域整合的熱潮。部分國家為

---

<sup>11</sup> Bela Balass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Homewood, IL: Richard D. Irwin Ltd., 1961, p. 2.

盡快達到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先從地緣上相近國家間的合作開始，簽署區域貿易協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以及籌組自由貿易區。在這波區域整合的「狂潮」下，其實也隱含了國家間害怕被排除在整合列車之外的不安心理，所以近年來區域整合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

由於本論文探討「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之形成，在進入本章內容前，應進一步就自由貿易區(FTA)的概念加以界定和說明。承前文所述，自由貿易區主要意指「區域內」國家同意在關稅及限額上逐年減少至0。至於，區域內國家針對「區域外」國家及其他貿易規範時，將不受「區域內」規範的限制。換言之，在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內，該等國家（十一國）應當遵循區域內之規範與限制，不過該等國家仍有與「區域外」國家簽署其他貿易規範的權利。例如，新加坡與美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sup>12</sup>是新加坡在「東協自由貿易區」及「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之外，與第三國簽署的貿易規範。

現在將焦點轉回到東亞，東協這個組織是「東亞」唯一的區域組織，其相關之發展歷程，必然會牽動整個區域整合的板塊位移，尤其是「東協加一」的倡議與執行。本章內容首先將說明及界定區域主義的相關論點，同時針對區域主義的發展做一探討；其次，本文亦借用區域整合理論來檢視東協與東協加一的整合狀況，希冀了解其發展和未來走向；最後，針對東亞區域主義的變遷，探討東亞區域發展及整合趨勢。

## 壹、區域主義的理論觀點

### 一、區域主義的理論基礎

---

<sup>12</sup> See Jose L. Tongzon, "U.S.-Singapore Free Trade Agreement: Implications for ASEAN,"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20, No. 2, 2003, pp. 174-178.

「區域」(Region)的定義，是從事區域分析和研究時，首先要界定的基本概念。Bruce M. Russett 認為區域的定義是靈活的，他在經過有系統的分析、研究後，提出五種不同的區域劃分標準：一、社會和文化相似的區域；二、由政治態度和對外政策相似的國家所組成的區域；三、政治上相互依存的區域；四、經濟上相互依存的區域；五、地理位置鄰近的區域。<sup>13</sup>經由 Russett 觀點的說明，可瞭解區域的基本概念及認知。另外，在學術界廣為引用的是 Joseph S. Nye, Jr.對區域的定義：一個國際性區域，是由有限數量的國家，藉著彼此間地緣關係及一定程度的相互依存性，而連結在一起的。<sup>14</sup> Nye 從地緣關係的角度切入，同時也考慮到國家間相互依存的聯繫。此外，還有其他不同判斷區域的方式，或是對區域有不同的見解。例如，以使用語言的異同來作區分；也有學者使用貨幣計價單位的差異來作區分；<sup>15</sup>還有建構主義者運用「認同感」的不同來作為判別標準。若從結構分析的角度來看，區域這個「單位」是介於主權國家與全球之間的層級、領域。所以，區域的定義及概念已經超脫其地理特質的原始定位，其新的意涵可視為另一種特定的「空間領域」來看待。

而「區域化」(Regionalization)是指社會和國家間，各種功能性或地域性之結合，透過各種交流、網絡與互動結合的關係。<sup>16</sup>區域化同時代表著一個區域內社會整合的成長，及自發性的社會、經濟互動過程，就是所謂「柔性區域主義」(Soft Regionalism)的概念。<sup>17</sup>另一方面，Robert Gilpin 提出「鬆散的區域集團」(Loose

---

<sup>13</sup> Bruce M. Russett, *International Reg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s: A Study in Political Ecology*. Chicago: Rand McNally & Company, 1967, pp. 1-13.

<sup>14</sup> Joseph S. Nye, Jr., ed.,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68, p. vii.

<sup>15</sup>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 Overview," in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4.

<sup>16</sup> 沈宗瑞、高少凡、許湘濤與陳淑鈴譯，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著，《全球化大轉變》(Global Transformations)。台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民 90，頁 21。

<sup>17</sup> Andrew Hurrell, "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York: Oxford

Regional Blocs)的概念，<sup>18</sup>同時描繪、提供從非正式結合的區域化，逐漸朝向具備正式結合要素的區域主義之發展路徑。區域化的柔性訴求，給予主權國家最大的政策彈性空間。換言之，此種自發性的區域化過程，讓主權國家在不失其自主性的情況下，達到初步區域內整合的目的，有助區域主義在其間的推展，對區域合作與整合都有推波助瀾的效果。

說明區域及區域化後，本文將進一步探討「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概念與意涵。Nye認為區域主義是：建立在以區域為基礎，而形成的國家間集團(Interstate Groupings)。<sup>19</sup>John G. Stoessinger將區域主義認定為三個以上國家所組成的一個集團，以形成一特有的政治實體(Political Entity)為目的。<sup>20</sup>換言之，區域主義是指具有特定地緣關係國家間，所發展出經濟性、政治性，以及機構性合作的互助關係。<sup>21</sup>另一方面，Gilpin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認為區域主義是：在一定地理範圍內的一些國家，試圖透過經濟合作或結盟，改善她們和已開發國家相對而言的地位。其主要的合作形式有三種：第一、建立自由貿易區或是關稅同盟，除了增加區域內部市場規模外，同時也保護本國產品面對外部的競爭；第二、實施投資規則和協議，以加強成員與已開發國家，特別是與其跨國公司討價還價的地位；第三、制定出區域產業政策，以便在各領域當中把本地相關的公司合理組織和集中規劃，使之成為該區域的領先者。<sup>22</sup>

「區域主義」所牽涉到的政經得失損益，一定是區域內、外有別的。換句話說，在該區域內的成員國間，基於共同利益而進

---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9-40.

<sup>18</sup> See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sup>19</sup> Joseph S. Nye, Jr., ed.,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op. cit., p. vii.

<sup>20</sup> John G. Stoessinger, *The Might of Nation: World Politics in Our Tim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5, p. 338.

<sup>21</sup> 黃兆仁，〈東亞區域主義與經濟互賴〉，《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第6期，民87.12，頁167。

<sup>22</sup>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p. cit., p. 294.



行的區域內合作，本質上將因競爭或對立而不利於非成員國。所以，區域主義代表各國以特定之區域作為實現國家利益的場域，同時也因為彼此間的攻防戰—合作 (Cooperation) 和衝突 (Discord)，造成該區域特定政經事務的改變。如此不但直接影響區域內或成員國家間的行為模式，也會間接促成區域外國家或其他區域的學習、仿效，改變該等國家或區域的政經發展。<sup>23</sup>

Andrew Hurrell 在檢視不同區域發展的現象後，把區域主義分為五個不同的「範疇」(Categories) 來解釋：一、**區域化 (Regionalization)**—區域化意指一個區域內社會整合的成長，以及自發性的社會、經濟互動過程。換言之，也就是所謂的「柔性區域主義」，或者是早先的「非正式的整合」(Informal Integration)。此一非正式的整合及柔性訴求，給予了主權國家彈性空間，且在不喪失其國家自主性的情況下，區域內的整合速度也會加快；二、**區域意識與認同 (Regional Awareness and Identity)**—區域意識或是區域認同，主要就是對於某一區域所產生的歸屬和認同感。雖然這一名詞的界定尚屬模糊，不過仍可了解到任何一個地區基本上都是主觀上的認定，是人們經由認知和想像所得到的結果。就如同「認知的區域」(Cognitive Regions)，或是「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這些都是經由人們的認知過程，逐漸形成的概念；三、**區域國家間合作 (Regional Interstate Co-Operation)**—許多區域主義所呈現的現象，實際上是各國政府間的議價談判及制定規範的互動過程。這種互動關係可以是正式的，如區域國家間的高峰會議或部長會議。也可以是非正式型態，如區域論壇的形式。所以這些正式、非正式的安排，和 Stephen D. Krasner 所稱的國際建制 (International Regime) 相當類似；四、**國家推動的區域整合 (State-Promoted Regional Integration)**—國家推動區域整合的過程，連帶會要求各國政府針對商品、勞務、資金及人員

---

<sup>23</sup> 蕭全政，〈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與台灣的角色〉，《政治科學論叢》，第 14 期，民 90.06，頁 203。

的相互往來，制定特別的政策，目的就是要減少或取消相關的互動障礙。國家推動區域經濟整合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歐盟，當然東協自由貿易區、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也朝這個方向邁進；五、**區域凝聚力(Regional Cohesion)**—這裡是指在上述四種過程結合起來時，有可能形塑出一個和諧、穩定的區域體。<sup>24</sup>

Hurrell 的論點提供研究者很好的分析途徑，上述五大範疇給予在區域研究上有較為嚴謹的概念。其對區域主義所劃分的五大範疇，本質上構成區域主義的五個面向，不論是靜態的說明或是動態的分析，都建構完備的研究方向。這對於本文用之分析東亞區域主義，乃至東協、東協加一的發展過程，提供了很好的方向及依據。

## 二、區域主義的發展趨勢

從一九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期，全球開始興起新一波的區域主義發展潮流，儘管學界有著各種不同的看法和分析角度，不過皆同意這一波的發展潮流，主要是因為來自全球化的壓力。傳統國家在全球化的氛圍下，無法應付該挑戰和巨大的風險，必須藉由區域的層級來降低風險，所以**區域間的合作與整合**可以說是主權國家作為對全球化的一種回應及自保的方式。Leszek Buszynski 認為東協現今面臨的，是新舊區域主義間的衝擊。舊區域主義被定義為冷戰時的產物，具內向型、排外的，且大都是出於各國政府為了特定安全或經濟目的所做的安排；不過新區域主義則是外向型、非排他的，同時具有多元功能（複合型）。<sup>25</sup>換句話說，這一波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的發展現象，不同於一九三〇年代或是一九六〇、七〇年代的發展特質，此一新的發

---

<sup>24</sup> Andrew Hurrell, op. cit., pp. 39-45.

<sup>25</sup> Leszek Buszynski, "ASEAN's New Challenges," *Pacific Affairs*, Vol. 70, No. 4, winter, 1997-1998, p. 555.

展趨勢主要包含了以下三個特質：一、外向型與開放型區域主義；二、南、北區域主義；三、複合型區域主義。<sup>26</sup>三者之內涵及特色，分述如下：

外向型與開放型區域主義 (Extroverted and Open Regionalism)：過去傳統的區域貿易協定(RTA)，主要目的為增進區域間的貿易量或是進行產業間的區域整合，且其整合時機都是在全球經濟體系出現危機時，各地區為求自保，避免過度依賴國際經貿體系，而發展出內向性、保護性的區域主義。不過在全球化下發展的新區域主義，必須透過區域整合的方式、建立起對外開放性的聯繫，以期積極整合進入國際體系。此外，還需藉由簽定區域內或區域間的自由貿易協定(FTA)，完成開放型區域主義的策略佈局。<sup>27</sup>另一方面，開放型區域主義是一種擺盪在多邊主義與雙邊主義間的「協調式單邊主義」(Concerted Unilateralism)，透過同儕壓力的共修過程（樂善），把選擇性自由化(Selective Liberalization)的正果也普渡給非會員國（好施）。開放型區域主義通常是解釋亞太區域整合的重要特質，其特色主要是透過自願與協調的運作方式，在區域內逐步消除貿易與投資壁壘的同時，也遵守最惠國待遇(Most Favored Nation Treatment, MFN)原則，促進或至少不傷害多邊貿易體制。<sup>28</sup>開發中國家主要希望經由開放型區域主義的原則，積極整合進入國際體系，一方面避免走向封閉型區域主義，另一方面則是作為與已開發國家區域組織整合的重要機制。

南、北區域主義(North-South Regionalism)：新區域主義也打破傳統區域主義的迷思，同時因應全球化的趨勢與潮流，促成開

---

<sup>26</sup> 郝培芝，〈亞歐會議形成的結構性動力與意義：從新區域主義的觀點分析〉，《問題與研究》，第43卷，第1期，民93.01-93.02，頁129-132。

<sup>27</sup> 同上註，頁130-131。

<sup>28</sup> 洪財隆，〈第三條路？—開放型區域主義之緣起、內涵與進展〉，《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26卷，第5期，民92.05，頁15。

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間的互動和合作。一改過去南北衝突、對立的觀念，開發中國家爭取已開發國家資金的進駐，雙方更進一步釐清彼此間的關係，制定規範性的運作規則，使資本輸出國和接受國間，建立起制度性的機制，從而降低國際投資的風險，且保障國際商業活動的安全性。而開發中國家也希望在全球競爭中，透過與已開發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方式，提供跨國性、多國性的保障條件，增加自身的競爭力，爭取外資的進駐。<sup>29</sup>例如東協國家倡議召開的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 ASEM)，除了彼此戰略上的考量外，東協諸國還有爭取國際資金進駐的用意。<sup>30</sup>

複合型區域主義(Multiple Regionalism)：新區域主義的氛圍也反映在全球化過程中，國際資本投資的不確定性。所以各國藉由參與不同的區域組織，透過建立多方的貿易協定來分散風險，同時各國希望積極整合進入世界經濟體系，避免在此一潮流下被邊緣化。例如東協國家不僅只為東協會員國，她們同時也為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的發起人，也都加入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APEC)。此外，新一波區域主義形成的動力，往往源自區域的內在自發力，且不再侷限於帶有政治性的安全同盟或經濟性質的整合，而是朝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元目標來發展。

從一九三〇年代、乃至於一九六〇、七〇年代的發展過程，區域主義已漸擺脫其原本封閉、保護的策略，朝外向型、開放型的方向發展。這一點東協做得不錯，除了參與亞太經合會、促成亞歐會議外，近來「東協加一」的區域整合，也依此方向邁進。討論區域主義相關發展後，本文將進一步探討區域整合理論的內涵與變遷。

---

<sup>29</sup> Paul Bowles, "ASEAN, AFTA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Pacific Affairs*, Vol. 70, No. 2, summer, 1997, pp. 228-229.

<sup>30</sup> 關於亞歐會議，東協與歐盟間的「盤算」，詳見後文：參、東亞區域主義與整合趨勢。

## 貳、區域整合理論的觀點

Ernst B. Haas 認為「整合」(Integration)是一種增加國家間互動，提升民族國家各自所處環境之混合、同化的過程。藉由此種過程，降低國際組織體系及其會員國所處的民族國家環境間之分野；<sup>31</sup>Karl W. Deutsch 則認為整合是把許多部份，結合在一起。換句話說，就是將原先分離的單元，結合進系統內，成為系統的一部分。<sup>32</sup>整合和區域整合的概念，從十九世紀末至二次大戰前就已經形成。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爭鬥，就已經形成互斥、對抗的經濟貿易保護集團。二次大戰結束後的五、六〇年代，歐洲的區域整合提供其他地區學習和借鏡。多數學者如 David Mitrany、Deutsch、Haas、Nye 等等，他們認為現實主義無法切確地解釋歐洲區域整合的現象，所以他們將區域的整合過程作有系統的分析、整理，分別用不同的觀點切入探討，逐漸發展成區域整合理論。區域整合理論主要可以分為社會中心(Social-Centered)和國家中心(State-Centered)兩個研究取向：<sup>33</sup>社會中心的研究取向主要有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和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他(她)們認為整合過程可以循序達到政治面的整合；國家中心的研究取向主要包含政府間主義(Intergovernmentalism)及自由派政府間主義(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他(她)們認為整合僅限於經濟層面，受限於主權的因素，整合的過程無法擴散到政治層面。

### 一、社會中心(Social-Centered)的研究取向：

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與

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

---

<sup>31</sup> Ernst B. Haas,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29.

<sup>32</sup> Karl W. Deutsch,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8, pp. 271-272.

<sup>33</sup> 曾怡仁、張惠玲，〈區域整合理論的發展〉，《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8 期，民 89.08，頁 53。

Mitrany 為功能主義的創始者，他認為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無法解釋相關國家為何自願拋棄部分主權，走向區域整合。所以他主張國與國間的聯繫和互動，往往會走向整合、減少民族主義的色彩，使國際社會更加穩定。Mitrany 認為透過整合的過程，使個人或組織經由有成效的國際合作經驗，逐漸轉移其對國家的忠誠，願意接受更多的國際合作、相互依存關係，再逐步跨越國界的藩籬，達到區域整合的目標。<sup>34</sup> 功能主義有兩個重要的論點：一、強調互賴會自動擴張，Mitrany 提出「分枝說」(Doctrine of Ramification)來強調合作的擴張性。國家間在某一領域合作的發展，會導致其他領域的合作。換言之，一個領域的合作是另一個領域合作的結果，同時也是另一個領域合作的動力。而這些領域之合作會形成一個功能性的互賴網，慢慢滲透到政治領域，使民族國家的行動能力降低，從而改變政治領域的主導性，影響國際動向、增進國際間的和平穩定；<sup>35</sup> 二、功能主義認為人民經由整合的過程，對國家的忠誠態度會改變。功能主義者不認為國家可以為世界帶來和平、為人民帶來福利，所以主張依人類社會生活之需求來組織功能性機構，此機構不受限於國界的人為框架，較能為人民謀取福利。當人民從功能性機構中得到滿足時，便會轉移對國家的效忠，如此將有利於國際整合。<sup>36</sup> 不過上述兩個論點，仍有其實踐上的缺憾。例如前者的分枝說因為六〇年代中期以後，歐洲整合運動出現停滯時，就無法用此一樂觀的角度來說明；而後者所提到對國家忠誠度的轉移，也非 Mitrany 所言如此容易。就因為功能主義出現了其解釋的侷限性，區域整合理論的「分枝」—新功能主義也應運而生。

---

<sup>34</sup> 金榮勇，〈東亞金融風暴對東協組織的影響〉，《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2 期，民 88.02，頁 61。

<sup>35</sup> 張亞中，《歐洲統合：政府間主義與超國家主義之互動》。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88，頁 378-379。

<sup>36</sup> 同註 33，頁 54-55。

新功能主義是由 Haas 所提出，主要是從功能主義的論點出發，並針對功能性整合的缺陷提出修正。<sup>37</sup>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新功能主義屬於經驗性的理論，而功能主義則偏向追求世界和平、理想化的規範。Haas 認為功能主義最大的弱點在於太過天真，認為從糧食等較不具爭議性的領域著手，即可以跳脫權力、政治的羈絆。Haas 同時認為即使是最基本的社會問題，必然會涉及到有限資源的分配，所以政治性的決定是無可避免的。不過，功能主義除了太過理想化外，Haas 也認為其點出功能性取向的國際合作認知，是值得稱許與深思的。<sup>38</sup>Haas 從功能主義發展出的新功能主義，主要論點如下：一、Haas 利用「外溢」(Spill-Over)的概念來說明整合的過程。Haas 研究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及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的經驗，認為透過「外溢」的效應，精英因在相關領域整合時得利，進而會支持其他領域的合作，使之達到整合的目的。<sup>39</sup>Haas 也認為「外溢」的現象並非是自動發生的過程，其實是精英透過某領域的決策或協調，來對其他政策領域產生影響；<sup>40</sup>二、把政治問題和經濟福利問題分開，前者稱為「高階政治」(Politics of High-Level)，後者則稱為「福利政治」(Politics of Welfare)。整合的過程一開始都是從技術面、或較不具爭議性的方面開始，所以從「福利政治」的範疇著手較能完成較大的整合。至於「高階政治」的領域中，仍然是國家間的權力鬥爭；三、在整合過程中，除了整體國家意志外，精英的態度及利益團體的角色也十分重要。換句話說，就是將整合看作一種發展性的過程、解決紛爭的過程。將整合的層次擴及到政府和民間，這種發展性的過程，有助於彌平各種利害關係的對立與衝突，能用相互妥協、

---

<sup>37</sup> Ernst B. Haas, *Beyond the Nation-State*, op. cit., pp. 47-49.

<sup>38</sup> 盧倩儀，〈區域整合理論之比較與評析〉，《美歐季刊》，第 12 卷，第 1 期，春季號，民 86，頁 29-30。

<sup>39</sup> Ernst B. Haas,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European and the Universal Proc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15, autumn, 1961, p. 372.

<sup>40</sup> Ernst B. Haas, *Beyond the Nation-State*, op. cit., p. 409.

磋商的方式達成整合目的。<sup>41</sup>

不過，新功能主義也有一些盲點。Nye 雖然支持整合過程，但是對於 Haas 的「外溢」效應提出質疑，認為在其過程中也有可能產生「溢回」(Spill-Back)效果。<sup>42</sup>Nye 對新功能主義的最大貢獻在於提出了一套整合模型，並認為新功能主義主要包含了下列七項「過程運作機制」(Process Mechanism)：溢出、互動、聯繫、精英、區域團體、認同以及來自區域外的影響力。此外，新功能主義者強調利益團體會促成整合，但是若整合不利於利益團體的生存時，利益團體則會反過來向國家施壓，運用國家政策的轉變取得該等團體在國內利益的延續。最後，新功能主義者忽略了國家的角色，國家不僅只會因應利益團體的要求，國家也會在整合過程中發揮其自主性，主導整合運動的相關議程，排斥國內如利益團體等組織對於國家政策的過度干預。

綜上所述，社會中心研究取向的功能主義和新功能主義，本文依其主要的觀點，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一、功能性的整合趨勢，建立在國際間的整合以及提高區域內人民之福祉為目的。在「外溢」或「溢回」的過程中，負責執行整合政策的國際組織，其執行之權力和能力，也會因「外溢」或「溢回」效應的影響，有所增長擴及到其他領域；二、整合過程中，成員國內政治精英、利益團體對於政策制定、議程設定都有所影響。當擴大整合領域有助於國家發展及整合利益時，國家會經過國內政治的議價過程後，適度調整其國家利益的定位，給予整合機構有限的干涉權；三、當整合性國際組織在功能事務上得到一定成果，同時得到成員國內利益團體和選民的青睞時，這些利益團體和選民會將原本對政府增加利益的期望和信任，轉投注在國際組織上。雖然對國

---

<sup>41</sup> Ernst B. Haas,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op. cit., pp. 367-368.

<sup>42</sup> Joseph S. Nye, Jr., *Peace in Parts: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Regional Organiz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71, p. 65.



家及民族認同的忠誠度轉移不大，但是他（她）們在日後施加政策影響力時，也會將國際組織納入考量。總之，功能主義和新功能主義者從「功能性」出發，對於整合運動及其過程之論述，給予研究者許多啟發，有助於國際合作的促成與進一步的發展。

## 二、國家中心(State-Centered)的研究取向： 政府間主義(Intergovernmentalism)與 自由派政府間主義(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

政府間主義和新功能主義一樣，認為整合過程停滯主要是因為國家強調「主權」。因此，當整合運動威脅到國家主權時，成員國就會採取消極的態度，導致整合過程停滯不前。只有在國家偏好的政策能取得他國共識時，國與國之間的整合機制才會再度打開。所以，政府間主義的主要觀點，是在突顯國家對主權的執著。政府間主義的代表學者為 Stanley Hoffmann，該學派認為整合只是一系列談判後的合作。他（她）們同時也質疑**新功能主義**的「外溢」效應，政府間主義者認為「外溢」效應在實際運作上會受到很多限制，而且整合僅限於經濟及社會福利等低階政治的範疇。另一方面，由於國家會極力維護其主權和自主性，只要涉及到高階政治的領域時，都會受到國家的抗拒。此外，國家間民族的差異性，也會導致整合成效不佳、「外溢」效應受限。所以，根據 Hoffmann 的觀點，「外溢」過程會和國家利益相衝突，無法達到高階政治的層面，因此「外溢」效應並不是用於政治整合，僅限於經濟整合的領域。<sup>43</sup>

另一方面，自由派政府間主義的代表學者為 Andrew Moravcsik，該學派以新現實主義的邏輯與假設為其理論基礎，認為一國之對外政策除了完全以本國的安全、利益為制定政策的考

---

<sup>43</sup> See Stanley Hoffmann, "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Fate of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ase of Western Europ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Vol. 95, No. 3, 1966, p. 882.

量外，也受到該國在國際體系中所處國力強弱的影響。自由派政府間主義同時認為，國家的對外行為會受制於國內政治的影響。國家對外的政策作為受到國內利益團體和選民等政治行為者，經過相互羈絆、角力的過程，影響國家的政策產出。在區域整合的部分，自由派政府間主義者強調：一、談判是區域整合主要的手段，國家在談判前須先釐清國內利益團體和選民的需求，依此設定底線進行談判；二、由於各國都已經設定談判底線，所以談判結果只限縮在一定的範圍內。另一方面，由於該底線完全反應一國國內政治的需求，如此也是展現及強調國家主權意志重要的指標；三、自由派政府間主義者認為國際組織的價值，僅作為談判秘書性質的幕僚機構。其存在的目的在於提供常設的談判場合、降低會員間的談判、降低交涉成本而已。<sup>44</sup>

綜上所述，政府間主義者強調主權的重要性，國家掌握權力和擁有自主權是至高無上的原則。所以當整合運動威脅到國家主權及自主性時，整合過程就會遭受成員國的**掣肘**，使整合運動停滯。要突破此一僵局，還必須在多數成員國間，重新取得整合議程的共識、偏好後，整合契機的大門才會再度開啟。此外，針對國際組織、整合平台的部分，政府間主義者將之視為達成目的之工具，這種機制、平台有助於國家解決國際化壓力以及化解其經濟危機。所以，對政府間主義者來說，國家在整合過程中是有自主性的。

本文依其主要的觀點，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一、**強調國家主權的重要**，國家為維護主權而保有其自主性，因此依其整合目標而存在的國際建制，無從限制國家權力之行使。<sup>45</sup> 成員國在顧及

---

<sup>44</sup> See Andrew Moravcsik, "Preferences and Power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t Approach,"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1, No. 4, Dec., 1993, pp. 473-524.

<sup>45</sup>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88.

自身主權及國家利益的情況下，對於整合過程的政策選項之偏好，都會較為嚴格和謹慎。且必須是在成員國能夠充分監督的範圍內，才願意將整合業務、部分國家的職權，交予國際機制整合處理；二、**制度為整合的手段**，從典則（建制）理論(Regime Theory)的觀點來看，國際建制是一種改善國家間協議效率的工具。<sup>46</sup>在主權國家間的集體行動由於存在許多不確定的因素，使協議的推動和執行實屬不易。若藉由制度的建立，能強化合作的可行性。透過彼此間可信度資訊的交流及傳遞，可提高侵犯他國權利的可預期成本。同時，經由議題連結(Issue-Linkage)改變交易成本，有助於協議能更有效率的執行。<sup>47</sup>由於制度可以幫助國家解決集體行動的難題，並經由合作和交換取得利益，所以自我意識強烈及欲極大化自身利益的國家，便會朝制度建立的目標邁進。此外，並輔以論壇(Forum)形式或是降低協議成本的方式，減少國與國彼此間行為的誤判。

以社會中心為研究取向的功能主義和新功能主義，強調國家的功能因為整合過程而逐漸萎縮。整合會藉由議題連結、議程設定，產生「外溢」或「溢回」的現象。與此同時，人民、利益團體等原國家內部的組成部分，也會因為轉移部分國家的忠誠，使國際組織、整合平台能有運作的空間，進而弱化國家的功能和角色；以國家中心為研究取向的政府間主義和自由派政府間主義，認為超國家的組織及制度，其所擁有的權力是國家所賦予的，所以該組織及制度是依附於國家、為國家的利益而服務。

西風東漸來到東亞，本文檢視東協區域整合運動的發展歷程，其所採取的策略為先在較不敏感的領域進行合作，再擴大到政治與安全的層面。東協之所以被譽為最成功的區域安全組織（其中之一），主要是因為東協運用各種策略，運用暫時擱置彼此爭端

---

<sup>46</sup> Andrew Moravcsik, op. cit., p. 507.

<sup>47</sup>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op. cit., p. 97.

的方式建立穩定的區域環境，同時促成區域內部的團結，以共同面對外在環境的衝擊。至於「東協加一」的區域整合，則是漸次地進行合作，從初步的經濟整合、貿易互惠，再到擱置南海主權爭議、共同協力發展經濟的合作方式。

### 參、東亞區域主義與整合趨勢

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顯然是受到國際政治、經濟、歷史變遷的制約。冷戰時期，在東西雙方壁壘分明相互對峙下，東亞的區域主義不是反映美蘇強權的制約，就是顯示出南方國家的無奈。但是隨著冷戰的結束以及外來影響力的減弱，東亞各國的自主性逐漸提高，所以較有能力抗拒區域外先進國家的支配，也更有能力推動利己的區域主義。

針對東南亞乃至於東亞區域整合，其中並非只是單純的經貿合作，還帶有美國、中國及日本三者間的角力。日本從二次大戰就處心積慮，為建構大東亞共榮圈(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ty Sphere)的願景。日本於二次大戰後發展出雄厚經濟實力，自然對東南亞的競逐不肯鬆手。中國在一九七八年起也開始進行改革開放，從原先的成立經貿特區(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s)，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主導東協加一的議程，欲將自身影響力深入其後院—東協，運用經濟整合的運作模式，達到區域整合後的經濟利益。至於在美國方面，有學者認為 Clinton 時代由於漠視東南亞與美國間的關係，同時在亞洲金融風暴時對該等國家援助不利，導致美國在該區域的影響力直線下降。Bush 政府上台後，修正並強化東南亞政策，欲在推動民主人權與維持政經穩定兩方面，維持並取得一個平衡點。<sup>48</sup>此外，為因應九一一所帶來的衝擊，美國順勢改變其戰略思維，以全球反

---

<sup>48</sup> 金榮勇，〈布希政府的東南亞政策與挑戰〉，《問題與研究》，第 40 卷，第 6 期，民 90.11-90.12，頁 53-68。

恐的戰略思維為其對外政策的主軸。加上東協區域內國家因為種族、宗教等問題而衍生出的衝突日增，在雙方「各取所需」的情況下，給予彼此再次合作的機會。美國與東協在區域安全與反恐等議題上進行合作，除牽動東亞三大主義的交鋒，也讓美國成功地重回東南亞地區，繼續發揮對該區域的影響力。

表 2-1：東亞三大區域主義之比較

	亞太主義	東亞主義		東協主義
主導勢力	美國	中國	日本	東協
發展目標	以美國為首的先進工業化國家，配合著自由經濟的全球主義，取代冷戰時期圍堵式的霸權結構。	代表著傳統之東亞大陸勢力。近代歷史上中國影響力的高峰，即為「朝貢國制度」的展現。	代表著傳統之東亞海洋勢力。近代歷史上日本影響力的高峰，即為「大東亞共榮圈」的推動。	受全球主義或區域經濟合作潮流、及冷戰後區域強權爭霸之影響，使東協欲尋求獨立自主發展。
具體成效	亞太經合會的成立促使美國得以利用該組織發展並結合其自由經濟理念，甚至可以重整亞太政經秩序。此外，美國亦可運用該組織制約歐盟之歐洲主義的行動。	中國積極參與東亞區域相關組織。此外，在金融風暴後，宣布人民幣不貶值、提供經援，倡議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欲贏得東協諸國的信任及擴大區域影響力。	日本因為金融風暴的關係，經濟大國地位受到動搖。且在經援紓困東協方面，不若中國來得積極。倡議東亞自由貿易區，目前的策略是與東協諸國簽署雙邊協定。	東協由原先區域安全組織，轉型為區域經濟整合集團，同時亦為東亞區域整合的平台。此外，亞歐會議的召開，使東協「洲際平衡」與「大國平衡」的路線頗具成效。
聯動關係	為推動亞太主義，美國必須經常平衡中、日東亞主義間的衝突，以及用妥協或聯合方式來化解來自東協主義者的壓力。	延續著冷戰時期的海陸爭霸的格局，「大陸」的東亞主義，由於地緣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比較偏向東協主義的行動思維。	「海洋」的東亞主義，由於地緣政治與經濟上的差異，思維比較偏向亞太主義，嚴格來說也可以算是銜接美國的亞太主義。	東協主義者運用亞太及東亞主義間的矛盾，取得該區域的利益及發展空間，同時也提高其自身戰略地位與價值。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參見：蕭全政，〈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與台灣的角色〉，《政治科學論叢》，第 14 期，民 90.06，頁 214-218。

如表 2-1 所示，可發現亞太主義(Asia-Pacificism)、東亞主義(East-Asianism)，及東協主義(Aseanism)三者間的異同。以美國為首的先進工業國家，在強調自由經濟的全球主義範疇下，積極推動亞太主義，除強調全球化的政經發展外，同時也欲建構後冷戰時代的亞太政經秩序；東亞主義主要由中國和日本，依其各自不同的考量相互競逐，支持不同思維方式的東亞主義；至於，東協主義則是孕育於東西對抗的冷戰時代，當時主要還是以安全為主要整合出發點。不過到了後冷戰時期，在經濟合作與區域整合的風潮帶動下，東協主義逐漸由原本的區域安全組織，轉型為東亞經濟整合的重要平台。

## 一、亞太主義(Asia-Pacificism)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成立，為區域內的經濟合作邁開一大步。起初美國似乎興趣缺缺，當時的國務卿 James Baker III 甚至對亞太經合會持否定的態度。不過，鑑於自由貿易談判在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中呈現膠著，美國對亞太經合會的政策才轉向，藉由亞太經合會來推動自由經濟理念、重整亞太政經秩序，同時也間接迫使歐盟接受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美國主張的經濟潮流。<sup>49</sup>亞太經合會是後冷戰時期，美國與東亞國家多邊聯繫最主要的橋樑。相較於歐盟(EU)和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兩者有其具體的目標，亞太經合會還停留在廣泛交換意見的論壇形式，即便是在一九九二年於新加坡設立秘書處、一九九三年更將部長理事會「升級」成元首高峰會，但是其區域角色扮演仍不斷受到挑戰和質疑。所以，人們戲謔亞太經合會是「第五個輪子」、聊天室、元首團體照場合，以及世貿的啦啦隊。<sup>50</sup>

<sup>49</sup> Hyun-Seok Yu, op. cit., pp. 271-272.

<sup>50</sup> Ibid., p. 270.

不過，亞太經合會其實是亞太（區域）主義的溝通平台及核心，支持亞太主義最力的不是亞洲國家，而是遠在太平洋東岸的美國及其盟邦澳大利亞。美國在東亞最忠實的盟友日本和韓國，則屬替亞太主義敲邊鼓的角色。為了推動、遂行亞太主義，美國必須經常平衡中、日東亞主義間的衝突，以及用妥協或聯合方式來化解來自東協主義者的壓力。

## 二、東協主義(Aseanism)

面對來勢洶洶，以亞太經合會為中心的亞太主義，東協主義者除了表現出抗拒前者正式化、建制化外，也不斷加強自身的發展和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的設立。東協諸國在九〇年代，經過高經濟成長的洗禮，面對全球新一波的區域整合趨勢，除要保住既有的市場和成果外，更要結合東南亞地區的國家推動區域內經濟合作，以強化東協各國的經濟力量。此外，進入後冷戰時代後，東協國家也開始尋求獨立自主，除了主動參與亞太事務以提高其發言權外，也藉著倡議東亞經濟集團(East Asia Economic Group, EAEG)、推動東亞經濟會議(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 EAEC)，以凝聚亞洲區域勢力，排除西方國家對亞洲政經的制約與掌控。雖然東亞經濟會議(EAEC)未能如馬來西亞前總理 Mahathir Mohamad 原本的構想，東協諸國最後作出妥協，將其定位為亞太經合會內部的核心機構。不過，這未嘗不是一個制約亞太經合會的途徑，因為實際上東協自由貿易區倡議之計畫已經開始實行。東協國家可挾東協自由貿易區以制東亞經濟會議，同時借力使力進一步影響亞太經合會的發展動向。<sup>51</sup>

另一方面，在安全的層面上，東協諸國為提升在亞太區域安

---

<sup>51</sup> 李文志，《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從扇形戰略到新太平洋共同體》。台北：憬藝出版社，民 86，頁 117-118。

全體系的主導地位，採取了與非東協國家間建立安全對話機制。東協推動東協區域論壇(ARF)，作為溝通、處理區域安全事務的重要平台；成立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Asia Pacific, CSCAP)，作為強化東協區域論壇之第二軌道的外交對話管道。除此之外，東協國家的集體力量為進一步奠定主導東亞事務的地位，初步必須排除美國在其間的影響力，所以分別從「洲際平衡」與「大國平衡」兩方面積極部署。<sup>52</sup>一九九六年三月第一屆亞歐會議(ASEM)在泰國曼谷召開，由亞洲十國（東協七國與中、日、韓）及歐盟十五國政府首長與會。就東協對此一安排的戰略面而言，東協有意藉推動「引歐入亞」的洲際平衡，達成其銳意發展的目標：<sup>53</sup>一、抗衡中、日兩國在東亞的勢力；二、制衡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三、拓展歐洲市場、爭取及鞏固歐洲資金進駐；<sup>54</sup>四、透過東亞及歐洲經濟力量的銜接，影響全球事務、提高東協發言權及國際地位。

亞歐諸國之所以願意拋棄彼此間的芥蒂，召開涵蓋亞歐二十五國的高峰會議，其實都有各自的盤算。除區域內的經濟整合外，提升自身國際影響力和發言地位，也是雙方刻不容緩的目標。就國際現勢來看，擺脫美國霸權的陰影，是雙方合作最大的公約數，同時將世界經濟版圖劃分為東亞、北美、歐洲，三足鼎立的新架構。東協也由原先的區域安全組織，慢慢轉型為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平台。此外，亞歐會議的召開，也使得東協「洲際平衡」與「大國平衡」的路線頗具成效。再者，東協主義者運用亞太及東亞主義間的矛盾，取得該區域的利益及發展空間，同時提高自身戰略地位與價值。總之，東協主義者經常在經濟上，聯合東亞主

---

<sup>52</sup> 李文志，〈後冷戰時代亞太安全體系發展與台灣戰略的思考〉，收錄於蕭全政編，《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台北：業強出版社，民 85，頁 71。

<sup>53</sup> 同註 23，頁 217。

<sup>54</sup> 歐盟向來是東協第三大國際資金來源者，因此如何繼續鞏固歐洲資金，不至於過度流入中、東歐新興國家，對東協來說是相當重要的發展策略。這也促使東協必須採取更積極的作為，持續鞏固歐洲國際資金的進駐。參見：郝培芝，〈亞歐會議形成的結構性動力與意義：從新區域主義的觀點分析〉，頁 133。



義以對抗亞太主義；不過在敏感的安全議題上，則是利用亞太主義來平衡東亞主義。運用上述的手段及方法，除了為自身取得絕佳的戰略位置外，也能突顯其主體性及自主性。

### 三、東亞主義(East-Asianism)

東亞主義其實是延續海洋與大陸霸權的互動，東亞地區由於其特殊的地緣形勢—海陸的相對地理位置，使得從二次大戰以來即形成海陸分屬不同國際陣營和殊異的政經發展策略。在冷戰期間，海陸交鋒的形勢更加尖銳：大陸的東亞主義，附著在以蘇聯、中國為主的社會主義集團；而海洋的東亞主義，則是依附在以美、日為首的資本主義集團羽翼下。兩集團的對峙、海陸間的交鋒，直到蘇聯解體後，才由兩極體系的競逐戰，慢慢趨向「區域利益」的戰略攻防。中國和日本則分別利用與東協或亞太各國間的關係，發展其自主性及主體發展。在海陸交鋒的結構下，中國和日本分別強調不同內涵的東亞主義，以為其逐鹿「中原」、爭取區域霸權的依據。

#### (一)、大陸的東亞主義—中國勢力

在這其中，中國代表著傳統的東亞大陸勢力。近代歷史上中國影響力的高峰，即為「朝貢國制度」(Tributary State System)的展現。在改革開放、經濟成長快速之際，中國積極參與東亞區域相關組織。此外，中國在亞洲金融風暴後，宣布人民幣不貶值、提供經援，以及倡議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除欲贏得東協諸國的信任與合作外，若能因而擴大其在此間的影響力，更是中國的發展目標。到今天為止，東協部份國家對中國還是有所疑懼，但是馬來西亞前總理 Mahathir 在一場會後記者會上講的一番話，已漸成東協諸國的共識。他指出：歷史上中國不曾侵略或殖民他國，因此無須在這方面有所疑懼；其次，中國做為東南亞國家的近鄰，

愈加富強，週邊國家就更能受益。他說，「中國不會是個威脅而是機會」。也許正是因為這樣，中國與東協的關係才會愈走愈密切。

55

中國作為一個「準」區域霸權，除與鄰邦交心外，理應有一番作為。中國除了對內銳意發展經濟外，對外則以提升國家之「綜合國力」為重要方針。<sup>56</sup>此外，中國更積極參與國際及區域組織的活動與區域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中國對東協諸國釋出極大的善意：首先是對於南海問題，中國提出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南海的政策方針，再加上「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宣言」的簽署，使得東協與中國間因南沙群島的紛爭，暫時劃下休止符，共同致力「拼經濟」的願景；為進一步減輕東協國家對「中國威脅論」的疑慮，中國也同意與東協進行集體協商，一同面對南海爭議。其次是針對亞洲金融風暴的處理，中國先宣布人民幣不貶值、接著提供經援、最後更倡議籌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上述的作為都刻意地強化與東協國家間的關係，也使「大陸」的東亞主義與東協主義逐漸匯流。

還有一個值得觀察的動向，那就是中國大力支持的「博鰲亞洲論壇」(Boao Forum for Asia, BFA)。博鰲亞洲論壇於二〇〇一年由二十六個國家發起成立，現有各類會員一百一十七個。該論壇是中國主導設立的非官方（亞洲）經濟論壇，其成立宗旨在整合亞洲各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博鰲亞洲論壇提供了東亞、中亞，以及南亞等亞洲國家（含澳大利亞）一個屬於「亞洲人」的舞台，同時藉由非官方的型態，促進產官學界的交流和互動，有助於區域間的整合及跨區域之制度網絡思維的形成。博鰲亞洲論壇其後續發展，尤其是中國在其間扮演的角色，都值得密切注意。延續

---

<sup>55</sup> 梁東屏，〈簽署三條約 中共東協空前密切〉，《中國時報》，<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5+112003100900069,00.html>，民 92.10.09。

<sup>56</sup> 有關「綜合國力」的內涵及解釋，請參見本章第三節、第「貳」部分：綜合國力說明。

冷戰時期海陸爭霸的格局，「大陸」的東亞主義，由於地緣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比較偏向東協主義的行動思維。

## （二）、海洋的東亞主義—日本勢力

另一股東亞主義的「勢力」，則為日本。日本代表著傳統的東亞海洋勢力，近代歷史上日本影響力的高峰，即為「大東亞共榮圈」(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的推動。此外，日本自二次大戰後受制於和平憲法，導致其成為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局面。日本要在東亞稱雄，勢必要與鄰邦交心，不過日本始終不願意對二戰時期的暴行道歉，造成日本即便大幅對東協國家投入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但是得到的尊重與其投入的資金不成比例。

日本在一九五七年西歐簽署羅馬條約，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後，隨即著手推動及倡議東亞地區類似的合作組織。不過，礙於冷戰時期美國東西對抗下的全球主義策略，加上東協諸國對外來政經強權的疑慮，日本的構想難以實現。由於日本在二次大戰後，傾全國之力發展經濟，其經濟地位在世界上舉足輕重，再加上東亞的經濟結構亦朝著「雁行理論」(the “Flying Gees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的路徑發展，即便日本在政治上備受「委屈」，但是在經濟實力方面，則是不容置喙。所以，在各方的折衷、妥協下，於一九六七年成立「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 PBEC)。該組織為民間企業領袖推動，旨在促進經濟發展，負責商議及研究有關區域性經貿、技術等合作事宜。此外，為因應一九七〇年代兩次石油危機，以及西方國家的新保護主義風潮，東亞區域內各國均有強化經濟合作的意願。於是在一九八〇年，經日本及澳洲的積極推動下，成立了以產官學為溝通渠道的「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來提高「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PBEC)的位階

與運作管道。<sup>57</sup>

除了非正式、非官方的論壇及組織外，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日本首相三木(Miki)也曾經倡議「太平洋自由貿易區」(Pacific Free Trade Area, PAFTA)的計畫，但是「只聞樓梯響」沒有成功，<sup>58</sup>不過該項倡議在數年後的亞太經合會中得到突破。一九八〇年代末期，由於東西冷戰的結束及烏拉圭回合談判的失敗，直接導致亞太經合會的成立。亞太經合會雖由澳洲總理 Bob Hawke 推動，但是日本在背後的助力甚多。<sup>59</sup>

另一方面，日本因為亞洲金融風暴的關係，經濟大國地位受到動搖。而且在經援紓困東協方面，不若中國來得積極。雖倡議東亞自由貿易區，不過初期僅與新加坡簽署雙邊協定。但是，卻因為中國的積極參與東亞區域整合，使得日本不得不跟進，對東協國家釋出更多的善意。二〇〇三年十月間東協高峰會議在峇里島舉行時，由於中國與印度都已與東協簽訂「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東協要求日本也加入，但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拒絕東協的提議。不到兩個月，到了該年十二月小泉已改變主意，同意加入該條約。不過日本十分勉強，實際上將來難免要遭遇困難，因為日本的外交其實是半獨立外交，另一半繫於美國。友好合作本來應是各方心甘情願的事，但日本卻是被情勢所逼，擔心東協完全倒向中國而不得不如此。其實，東協是日本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出口區，她與東協的貿易額遠超過中國之對東協。但由於姿態過高、再加上早不示好，待有失落危機時方伸出友誼之手，這對於日本欲充當區域整合領導者和重回昔日經濟霸權的美夢，失去先機、且越來越遠了。<sup>60</sup>

---

<sup>57</sup> 同註 23，頁 208。

<sup>58</sup> Hyun-Seok Yu, op. cit., p. 269.

<sup>59</sup> See Yoichi Funabashi, *Asia Pacific Fusion: Japan's Role in APEC*.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5.

<sup>60</sup> 國際瞭望專欄，〈日本與東協「友好合作」的障礙〉，《中國時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4+112003121300054,00.h>

此外，日本內部對於與霸權間的互動，也有不同的聲音。支持與霸權維持良好關係者，也可以稱為親美派；主張與霸權保持距離、獨自發展者，又可稱為亞洲派。不過，在權衡其國家利益後，親美派佔上風，認為與美國緊密合作至為重要，美日間的安保關係，對於東亞區域安全發揮了重要的作用。<sup>61</sup>所以即便日本在一九九一年七月，於東協舉行的擴大外長會議(ASEAN-Post Ministerial Conference, ASEAN-PMC)中，積極鼓吹將該會議從經濟層面擴大到政治與安全的對話；<sup>62</sup>又於一九九二年到九三年間發表了「宮澤主義」，嘗試建立一區域安全體系，減少東協國家對日本的疑慮。這些作為還需經由美國的事後「背書」，其成效往往大打折扣。更甚者，日本在亞洲金融風暴時，欲成立「亞洲貨幣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 AMF)拯救東協諸國困境時，此一構想也被美國駁回。<sup>63</sup>所以，日本及其欲推展之「海洋」的東亞主義，自身主導性有其侷限性。「海洋」的東亞主義，由於地緣政治與經濟上的差異，思維比較偏向亞太主義，再加上日本自二次大戰以來的外交政策，皆以美國馬首是瞻，所以嚴格來說「海洋」的東亞主義也可以算是銜接美國亞太主義的一部分。

#### 四、區域發展及整合趨勢

東亞地區的政經發展，已經從過去由美、日主導，以全球主義或亞太主義為主的運作方向，逐步發展成為以東亞主義甚至國家主義為主的力量，試圖牽引或吸納全球主義與亞太主義。這其中又因為大陸的東亞主義與東協主義合流，使東亞區域主義產生了不同以往的結構和變化。學者 Hyun-Seok Yu 將東亞新舊區域主

---

*tml*，民 92.12.13。

<sup>61</sup> See Yoichi Funabashi, "Japa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91-1992, pp. 58-74.

<sup>62</sup> 同註 51，頁 240-241。

<sup>63</sup> Hyun-Seok Yu, *op. cit.*, p. 273.

義作了相關的比較：

表 2-2：東亞新舊區域主義之比較

	舊亞洲區域主義 (Old Asian Regionalism)	新東亞區域主義 (New East Asian Regionalism)
區域範圍	亞太地區	東亞（東北亞加上東南亞）
美國的角色	決定性角色(Crucial)	幕後的角色 <sup>64</sup>
主要目標	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	特殊區域經濟合作：包含東亞自由貿易區及區域金融合作
主要運作制度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東協加一、東協區域論壇(ARF)以及博鰲亞洲論壇(Boao Forum) <sup>65</sup>
區域領導國家	美國、澳洲及日本	中國、東協及日本 <sup>66</sup>

附註：本表在新東亞區域主義部分略作修正，與 Hyun-Seok Yu 的觀點有所不同。

資料來源：Hyun-Seok Yu, “Explaining the Emergence of New East Asian Regionalism: Beyond Power and Interest-Based Approaches,” *Asian Perspective*, Vol. 27, No. 1, 2003, p. 275.

新的東亞區域主義，嘗試建立起「亞洲認同」(Asian Identity)。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道路並不平順，冷戰時東協主義者依附於美國為首的集團羽翼下；冷戰後，又受制於美歐國家的「干涉內政」。所以東亞國家在面對美歐國家概念下的「自由經濟區域主義」(Liberal Economic Regionalism)時，總是以「亞洲價值」(Asian Values)來回應。<sup>67</sup>一九九七、九八年間的亞洲金融風暴，是促使東亞國家真正願意合作的契機與轉捩點。也由於亞太經合會在風暴中沒有任何作為，如此也喪失了該組織在區域整合上重要的角色扮演。<sup>68</sup>

<sup>64</sup> Hyun-Seok Yu 在其文章表格中的標示為：無(None)。本論文對其標示持不同的立場，美國在其間的角色「退居第二線」。美國除影響日本為主的海洋的東亞主義外，也遊走於大陸的東亞主義與東協主義間，所以美國應為「幕後的角色」(隱藏性角色)。

<sup>65</sup> Hyun-Seok Yu 在其文章表格中的標示為：ASEAN+3, AMF, Boao Forum。筆者以為東協加一的整合速度較東協加三來得快和具體，且亞洲貨幣基金(AMF)力道不足，所以本文在表格上的標示作些許調整。

<sup>66</sup> Hyun-Seok Yu 在其文章表格中的標示為南韓和東協，本論文對其標示持不同的立場。筆者認為新的東亞區域主義中的領導國家，應該是以中國、東協以及日本為主，南韓是居於次要的角色。

<sup>67</sup> Hyun-Seok Yu, op. cit., p. 263.

<sup>68</sup> Tun-jen Cheng, “APEC an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 Lost Opportunity for Institution-Building?”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 No. 2, Dec., 1998, pp. 21-32.

東亞新一波的區域合作與整合，著重在區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尤以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為主要軸心，漸次成為整合東亞區域的火車頭。為因應如同亞洲金融風暴的情況，於二〇〇一年五月的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年會時，同意建立一項區域貨幣換匯支援體系(Network of Currency Swap Deals)。<sup>69</sup>雖然東亞區域主義當中，大陸的東亞主義與東協主義有合流的趨勢，並不表示亞太主義即失去「市場」。即便是美國在Clinton 主政時期，對東南亞的外交政策過於放任和紊亂；不過隨著全球反恐的嚴峻氣氛，東協諸國與美國間的安全議題合作必不可少。這也形成了東協在經濟議題上，與中國合作；但是在攸關國家安危的安全議題上，仍舊選擇美國為合作夥伴的情況。所以，以美、日為中心之海洋的東亞主義，雖然在新一波區域整合略居下風，但是日本依附美國外交政策的走向，也成為東協主義者制衡中國的一盤好棋。<sup>70</sup>換句話說，東亞區域主義依舊是三股勢力的交會，三者間兩兩彼此間的合作和競爭，牽動著東亞政經局勢的發展。「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推動與發展，無疑是開啟了新一波東亞區域主義之「潘朵拉的盒子」。

## 第二節 國際合作的觀點

有關國際合作的部分，首先，從國際體系（社會）加以說明，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間的合作應該從何下手；其次，國際合作牽涉到國家的「獲益」多寡，國家在何種情況下才會敞開合作大門；另一方面，在本節的討論中，將以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的觀點為主，輔以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的說法，作有系統的說明。

---

<sup>69</sup> 同註 48，頁 66。

## 壹、國際體系與行為者

在探討國際體系的狀態方面，新現實主義者認為國際體系（社會）為一無政府狀態(Anarchy)，<sup>71</sup>國家為國際間之單一行為者，維持該體系的穩定是相當重要的。此外，新現實主義者已承認國際間還有其他行為者的存在，不過在制定國際規則時仍以國家為主體；另一方面，新自由制度主義者承認國際社會仍屬於無政府狀態。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對外行為以追求和增進國家利益為主，所以在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國家本著理性的考量，評估各項利害損益，選擇對國家最有利的目標與行動，以期增進及滿足國家利益。<sup>72</sup>雖然新自由制度主義者承認國際社會仍屬於無政府狀態，不過他（她）們強調秩序面的重要性，因此新自由制度主義者認為國際社會的合作，應該要建立在國際間的規範和制度的整合上。

相較於新現實主義者對無政府狀態的描述，新自由制度主義者嘗試利用「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概念，來探討國際合作的可能性。根據 Keohane 與 Nye 的定義：相互依存即是相互依賴(Mutual Dependence)，國際社會中的相互依存，主要是指不同國家和行為者間，對彼此相互的影響。<sup>73</sup>在相互依存的情境中，國內事務與對外事務間的界限，變得模糊難辨。例如，在一九九七、九八年間的亞洲金融風暴，導致世界商品的價格大幅下滑。不過，這對於美國來說卻有助於經濟持續成長，而且美國不需採取抑制通貨膨脹的措施。所以，相互依存使得國內事務與對外事務混雜、交織在一起，產生比過去更為錯綜複雜的合作與衝突形式，同時

---

<sup>70</sup> 國際瞭望專欄，〈東協成為亞洲三鼎足之一〉，《中國時報》，民 93.02.20，版 A11。

<sup>71</sup>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9, p. 88.

<sup>72</sup>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9, p. 6.

<sup>73</sup>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89, pp. 8-9.



也使得利益分配與以往不同。<sup>74</sup>

此外，相互依存並非與無政府狀態呈相反的狀態，兩者彼此相互獨立，各自涉及不同的層面。換句話說，國際合作在無政府狀態中是正常的，而且彼此存在。另一方面，Keohane 與 Nye 在探討國家在國際規範下的互動過程時，提出了「複合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的觀點，主要論點如下：一、社會間的聯繫是多管道(Multiple Channel)的，國際上的行為者彼此間的互動也日趨頻繁，在互動的過程中彼此聯繫及相互依存的程度也漸趨緊密；二、外交政策的產出及相關議程的設定，都因為國際間行為者的互動頻繁、國際與國內問題的界線也逐漸模糊，使得相關議題的層級難以劃分。換句話說，昔日將軍事安全列為對外政策首要目標的做法，面臨政策轉變的考驗。此外，由於議題間的相互連結，在處理國際事務時會影響到國內政策的產出，所以國際間行為者通常需要合作來解決問題，如此也有助於國際合作的達成、國際規範的形塑；三、對國家來說，在全球相互依存、經濟整合、技術流通的情況下，有助於國際社會進一步的合作。同時，權力不再是國家對外行為的唯一目標，且武力也絕非對外政策的萬靈丹。不過，這並非意味著國家完全無用武之地，其實在某些議題上權力還是有運作的空間。<sup>75</sup>

## 貳、國際合作與國家獲益

瞭解國際體系及行為者後，本文進一步探討國際合作及國家獲益。新自由制度主義者認為國家處在無政府狀態下，必須提防他國無所不用其極的欺騙行徑，且還要算計錯綜複雜的利益，要合作談何容易。不過解決方式還需經過制度的建立、規範的確認，

---

<sup>74</sup> 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New York: Longman, 2003, pp. 198-199.

<sup>75</sup> *Ibid.*, pp. 25-28.

防止欺騙等手法，同時將彼此間的資訊公開、透明，國際合作才可行；此外，在新現實主義者的觀點，國與國之間猜忌、欺騙是常態，並非僅建立制度就可以達到國際合作。而導致國家間合作不順遂的原因，主要有三：欺騙、「相對獲益」(Relative Gains)，以及國家拒絕功能性的專業化等因素。所以在合作與否間，「獲益」(Gains)多寡、「相對獲益」還是「絕對獲利」(Absolute Gains)就變得很重要了。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在合作時所關心者，即是用國家利益等同於權力的觀點來看，所以應朝「相對獲益」的目標及方向來努力。而新自由制度主義者認為國際社會的合作，是基於「絕對獲益」而非相對獲益而合作的。<sup>76</sup>

此外，國際合作與國際道德無關，無須帶有價值規範的涵意與判斷。<sup>77</sup>Keohane 告訴我們合作(Cooperation)並不同於和諧(Harmony)。換句話說，當兩國利益處在和諧的狀態時，雙方即沒有合作的必要，維持現狀反而是最佳的選擇；若是兩國的利益處於衝突的局面時，在沒有合作意願的情況下，合作不可能發生；此外，合作需要透過談判的方式，若僅只有共同利益而沒有後續的行動策略，仍然無法達到合作的目的；再者，合作是有條件的，而且相關合作的國家又以國家利益為依歸，若無助於國家利益的增進，即便彼此間的利益重疊，也難產生合作的契機。所以，合作需經過談判的方式，即經由政策相互協調(Policy Coordination)，使國際間處於非和諧狀態下的行為者，藉由談判及協調的過程，讓彼此間的政策產出趨於一致。經由政策協調的過程，當行為者將其行動調整到能夠適應其他行為者的偏好時，合作就有發生的可能。所以，政策協調過程的結果，若足以使一國遵循的政策，讓他國認為能夠促進彼此的發展目標時，合作的大門就會敞開。換言之，當行為者經由政策協調，使自己的對外行為及政策，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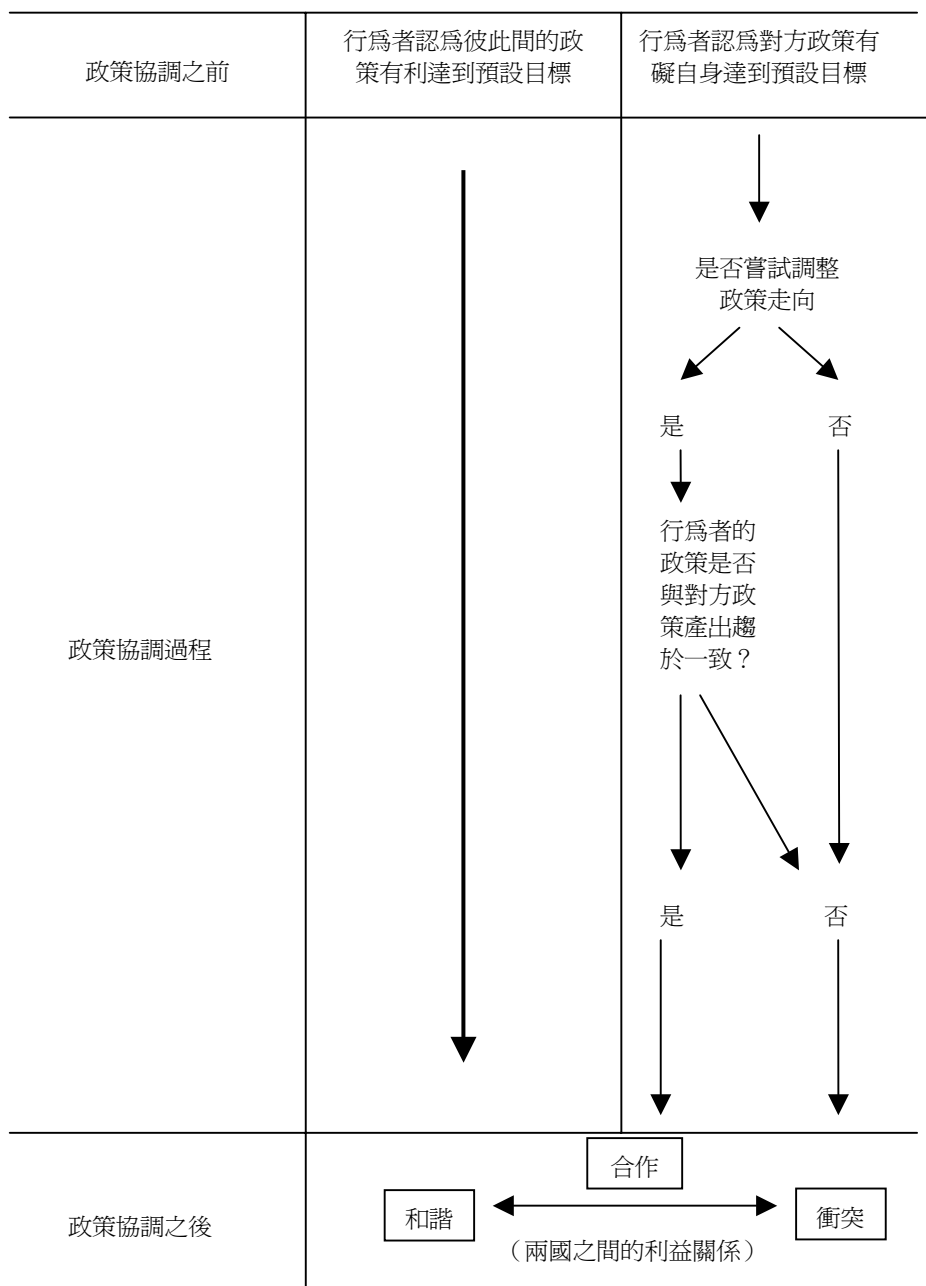
---

<sup>76</sup>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Dec., 1988, pp. 380-381.

<sup>77</sup> Ibid.

夠「適應」其他行為者的實際願望或預期偏好時，合作才會開始進行。<sup>78</sup>最後，本文將上述說明，以圖 2-1 表示之：

圖 2-1：和諧、合作與衝突



資料來源：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53.

<sup>78</sup>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op. cit., pp. 51-52.

## 參、小結

在國際合作相關論點的探討中，本文首先從國際體系與行為者作一說明。其次，針對國家在國際合作時的「獲益」問題，可將之應用、討論於中國與東協在針對自由貿易區之形成，以及整合運動的過程時，彼此間的互動及攻防上。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對外行為以追求和增進國家利益為重，所以在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國家本著理性的考量，評估各項利害損益，選擇對國家最有利的目標與行動，以期增進及滿足國家利益。<sup>79</sup>在東亞區域主義的結構下，中國與東協就彼此間自由貿易區成立過程，不時上演攻防與合作。在東協主義與大陸的東亞主義匯流的同時，相互間對外策略思維也暗潮洶湧。本論文以東亞區域主義為探究雙方合作過程的框架，運用本節引用的國際合作相關理論，嘗試說明兩造整合的互動過程。

### 第三節 國家利益與綜合國力說明

國家的對外行為，大抵都是在內部評估之後做成的行動。從接收到各方面的資訊，再經國內政黨、官僚，以及利益團體間的議價(Bargaining)後，最後製成政策並加以落實。從現實主義者的角度來看，國家的對外行為是經由縝密的考量之後，以符合國家最大利益為大前提，終至拍板定案。不過，從 Nye 等新自由制度主義者的角度來看，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的達成仍需輔以相關之配套措施，若僅只是以國家自身的考量、再加上對外權力及影響力的行使，其成效必打著折扣。至於在綜合國力的部分，由於現今國家的發展策略不再侷限於軍事國防上的武力展示，國家

---

<sup>79</sup>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op. cit., p. 6.

的整體發展亦涉及到經濟、資源等現象的探討。本節旨在通過國家利益與綜合國力的討論，進一步做為分析及探討的角度，針對中國及東協間對外政策的互動，做為應用及說明的工具。

## 壹、國家利益探究

### 一、國家利益的發展

有關國家利益的概念脈絡，最早可追溯到西元前五世紀希臘史學家 Thucydides 的思想理念。他流傳千古的不朽名著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潛移默化歐洲中世紀後期人文社會思想的重塑與發展。歐洲中世紀後期 (文藝復興時期)，在整個歐洲大陸瀰漫著政教衝突的氛圍下，造就了主張以權、術、勢手腕治國的 Niccolo Machiavelli。Machiavelli 的著作頗豐，其中以 *The Prince* (君王論) 影響國際政治學者甚鉅。該書以權力 (Power) 為中心探討的哲理，對於後來國家利益、權力平衡 (Balance of Power) 之觀點，都有相當的啟發。<sup>80</sup> 十七世紀初，讓法國雄據一方的首相兼主教 Cardinal de Richelieu，追尋 Machiavelli 的腳步，以其首相身份，排除渠應具有的道德理念 (主教神職身分)，主張透過非道德的手段，遂行國家利益至上的治國方針。<sup>81</sup>

另一方面，從 Jean Bodin 的現代主權理論，到一六四八年的威斯特伐里亞 (Westphalia) 會議，國家主權的觀念日漸興盛。威斯特伐里亞會議中最主要的精神價值即是：在國家領土範圍之內，國家主權是至高無上的，不允許任何外力的干涉。<sup>82</sup> 經由以上相關歷史發展之演變，國家利益的內涵及深度得以茁壯、發展。值得

---

<sup>80</sup> 王逸舟，《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 88，頁 7-11。

<sup>81</sup> 林添貴、顧淑馨譯，Henry A. Kissinger 著，《大外交》(Diplomacy)。台北：智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民 87，頁 60-73。

<sup>82</sup> Jessica T. Mathews, "Power Shift," in Richmond M. Lloyd et al, eds., *Strategy and Force Planning*. Newport, RI: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1997, p. 79.

一提的是，Thucydides 無遠弗屆的穿透力量，深深地影響、啟發當代國際政治學—新現實主義學派。<sup>83</sup>

現今國家利益觀念，深受二次大戰後興起的現實主義(Realism)之影響。現實主義者從權力的角度來界定國家利益，所以國家利益即在追求權力，任何增強國家權力的政策都符合國家利益。現實主義大師 Hans J. Morgenthau 認為，國家利益的概念包含兩重因素：一重因素是邏輯上所要求的，在其邏輯意義上必不可少的；另一重因素則是由環境所決定的，是可變的。因此，前者有相對永恆存在之必要性，後者將依環境而改變。<sup>84</sup>所以，國家利益應該明確的包含三個面向：國家領土完整、主權制度以及文化的完整。<sup>85</sup>換言之，國家首要利益就是求國家的生存，至少需要有維護國家疆域完整的能力，還需保障其政治制度運作及文化認同不受他國的侵犯。

針對國家利益的範圍大小，Morgenthau 主張國家利益應該與國家能力（實力）成正比。大部分的國際政治學者都主張，國家生存應該居於國家利益之首，因為其他利益都必須伴隨「國家生存」而達成。以 Alexander George 和 Robert Keohane 為例，渠等認為國家利益有以下三個指標：一、**實質的生存(Physical Survival)**，是指全體國民的生存，並非一定要達到維護領土或主權的層次；二、**獨立自由(Autonomy)**，一國人民有能力選擇自己政府的運作方式，個人權利經由法治程序而落實，同時獲得國家的保障；三、**經濟財富(Economic Well-Being)**，國家盡力擴大經濟福祉。<sup>86</sup>

---

<sup>83</sup> 同註 81，頁 10。

<sup>84</sup> 陳漢文，《在國際舞台上：西方現代國際關係學淺說》。台北：谷風出版社，民 76，頁 28。

<sup>85</sup> See Hans J. Morgenthau, "Another Great Debate: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6, No. 1, Dec., 1952, pp. 961-988.

<sup>86</sup> 李登科、林文程、林正義、劉德海與鄧中堅，《國際政治》。台北：國立空中大學，民 85，頁 69-85。

## 二、Donald E. Nuechterlein 的觀點

Donald E. Nuechterlein 以美國國家利益作為其分析的基礎，他認為國家利益有變與不變兩個主要因素。不變的部分可以形成美國的持續性利益，我們可將之稱為基本利益。這包含國防(Defense of Homeland)：保衛美國及其所施行的憲政制度；貿易(Economic Well-Being)：增加國家經貿利益，同時增進美國產品的銷售、推廣；世界秩序(Favorable World Order)：創造有利美國的世界秩序（國際安全環境）；以及意識形態(Promotion of Values)：推廣美國的民主價值，及推展自由市場的體系等四個部分。<sup>87</sup>

此外，他又利用四個不同程度的國家利益判別標準，對國家的外交情勢做出判斷。當一個迫切、具大規模毀滅性的威脅，波及本國安危時，國家的生存利益(Survival Interest, Critical)即在十萬火急的關頭。這些危機基本上十分容易辨識出來，因為都有明顯的戰鬥行動，或是一國對另一國發動攻擊的行為。換句話說，就是敵人的軍事行動，使國家的生存受到威脅。<sup>88</sup>所以，判斷生存利益的標準在於：當事國是否遭遇明顯而立即的危險。

再者，任何嚴重影響國家的政治、經濟和人民之福祉，且最主要是對國家的安全有影響者，均可視為國家的緊要利益(Vital Interest, Dangerous)。危及國家緊要利益的引爆點是潛在性的，甚至是有可能發生的，但並非表示這是迫切的危機。在上述情況下，提供政策制訂者有機會和盟國協商、與敵人議價，利用政經活動扭轉情勢的發展。或從事武力的展示，警告敵人勿因此而引發戰爭。<sup>89</sup>生存利益和緊要利益兩者最大的不同，主要在時間的輕重緩

---

<sup>87</sup> Donald E. Nuechterlein, "America Recommitted: United States National Interests in a Restructured World," in Richmond M. Lloyd, ed., *Strategy and Force Planning*. Newport, RI: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1997, p. 97.

<sup>88</sup> Ibid., pp. 98-99.

<sup>89</sup> Ibid., pp. 99-100.

急上。<sup>90</sup>

第三個是**主要利益**(Major Interest, Serious)，認定標準為：該利益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尚未達到決定性的攤牌時刻。此類利害關係大都需要國家間彼此磋商的議題，甚至會危及國家在海外的國家利益（通常是以美國而言）。但是，政策制定者通常會利用妥協、交涉、採取折衷的辦法做出決策，取代帶有火藥味的對峙和不切實際的盼望。<sup>91</sup>大多數的國際問題都可能涉及國家的主要利益，其衡量的標準在於：國家的經濟利益、政治穩定，以及人民福祉等相關課題是否受到影響。不過，設若對手國不願以談判方式解決相關的衝突時，這類的問題就有可能升高，成為該國必須面對的緊要利益。

最後，為國家的**周邊利益**(Peripheral Interest, Bothersome)，該利益並不會嚴重到撼動一國的整體運作及福祉，通常大多為跨國性投資和經貿事項，以及相關的民間文化交流，比較不屬於政治層面的範疇。<sup>92</sup>

### 三、國家利益的發展趨勢

#### (一) Nye 對國家利益的詮釋

目前國家利益的發展，除先前相關的論述之外，也有較為新穎的發展。Nye 認為在一個民主國家中，國家利益乃是公民們在經過適當考量後所提出來的。<sup>93</sup>這是一個新的趨勢，民主國家人民當家作主的局面，將會衝擊到以現實主義為中心、國防軍事為重，

---

<sup>90</sup> 林碧炤，《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 88，頁 197-224。

<sup>91</sup> Nuechterlein, op. cit., p. 100.

<sup>92</sup> 同註 90，頁 209。

<sup>93</sup> 蔡東杰譯，Joseph S. Nye, Jr. 著，《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台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 91，頁 269。



並將價值觀（人權、民主價值）與對外政策之利益（「重大利益」等等）脫鉤的傳統思考模式。換句話說，價值成為權利的重要泉源，而民主因素成為國家利益重要的成分。<sup>94</sup>如此，將較上述 Nuechterlein 所定義之四個國家利益判別標準，範圍更廣泛和多元。Nye 同時認為國家利益是一個「變化萬千」的概念(A Slippery Concept)，難以確切定義的概念。<sup>95</sup>此外，要遂行一個國家之國家利益，權力也是一項很重要的因素。與現實主義者不同的是，Nye 將權力分為兩類：一種稱之為「剛性權力」(Hard Power)，指一國可以利用其軍事或經濟力量，迫使他國順從本國利益考量之權力；另一為「柔性權力」(Soft Power)，該種權力主要來自我們的價值觀，例如人權、環保、民主等等議題。柔性權力即是一國用文化或思想等力量，循序漸進地影響他國的決策，使他國的對外政策符合本國利益。Nye 認為在現今資訊發達的時代，柔性權力的運用將易於剛性權力，且更為有效。<sup>96</sup>

另一方面，Nye 參照其他學者的觀點，把美國國家利益受威脅的程度，分為 A, B, C 三個等級：A 級是會危及到國家生存的，例如前蘇聯在冷戰時期與美國間的對立；B 級是對美國國家利益產生威脅，但不會威脅到國家生存，例如北韓及伊拉克問題；C 級是偶發事件，會間接影響到美國國家安全利益，譬如科索沃、波士尼亞，及盧安達等紛爭。<sup>97</sup>Nye 同時認為在現今的美國內外情勢發展，C 級會越來越重要，而且逐漸取代傳統對於 A 級或是 B 級的關注。除了因冷戰結束、隨著蘇聯瓦解，使 A 級的重要性下降外，傳播媒體的蓬勃發展也是 C 級問題日漸重要的原因。傳媒形塑一項議題，利用聲光影像的效果，十分容易撼動、影響人民的關注焦點，如此也會造成政府決策上的壓力。<sup>98</sup>因此，民主國家

---

<sup>94</sup>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 92，頁 339。

<sup>95</sup> Joseph S. Nye, Jr., "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op. cit., p. 22.

<sup>96</sup> See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No. 80, fall, 1991, pp. 153-171.

<sup>97</sup> Joseph S. Nye, Jr., "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op. cit., p. 26.

<sup>98</sup> See Joseph S. Nye, Jr. and William A. Owens, "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2, Mar./Apr., 1996, pp. 20-36.

著實應正視媒體所帶來的影響，其重要性足以影響一國之重大外交政策，甚至達成出兵之舉。這不僅考驗民主國家政治人物的智慧，也牽動國家的運作，吾人不可不體察此一問題的重要性及嚴重性。

## (二) 比較及綜合論述

從表 2-3 中，可比較 Nye 的三個國家利益受威脅之等級，與 Nuechterlein 提出的四個國家利益之判別標準，兩者間的類似性與異同：

**表 2-3：Nuechterlein 與 Nye 國家利益判準之比較**

Nuechterlein	生存利益	緊要利益	主要利益	周邊利益
	“Survival”	“Vital”	“Major”	“Peripheral”
國防	■■■■■	■■■■■	■■■■■	■■■■■
經濟	(Nuechterlein 國家利益判準由左而右重要性漸弱)			
世界秩序	(Nye 認為的國家利益判準由左而右重要性漸強)			
意識形態	■■■■■	■■■■■	■■■■■	■■■■■
Nye	A 級威脅	B 級威脅	C 級威脅	
	“A list”	“B list”	“C list”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由於處理的事務及出發點的差異，使 Nuechterlein 與 Nye 的觀點不盡相同。雖然 Nye 認為 A 級威脅因為冷戰結束而不復重要，但是國家安全依然是一個維持國家利益的重要指標。換個角度來看，其實這也是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彼此間的糾葛與相異的地方。前者仍強調權力的運作，後者則是強調經由「迂迴」的方式得到該國所想要的。

透過上述國家利益的探討，使吾人可以較清楚地了解眾多學者對於國家利益的觀點與看法。本文從 Thucydides 的觀點出發，探訪 Machiavelli、de Richelieu 的思想領域，到了一六四八年威斯

特伐里亞會議的召開，開啟當代民族國家國家利益之「意識」。就等現實主義大師 Morgenthau「拍板定案」，國家利益成為現實主義者的「主義圖騰」之一。學者 Nuechterlein 用四個變動和不變的因素，較完整地呈現國家利益的基本概念。Nye 則依尋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觀點，輔以柔性權力和剛性權力，交織出新的發展趨勢。經由上述不同觀點的匯集，本文可進一步分析東協各國及中國她們在著重區域整合的重要外，仍不忘自身國家利益的維護與爭取。換言之，若能在區域整合的架構下，取得彼此多方間的利益協調與妥協，方能有助於東亞區域整合的推展。

## 貳、綜合國力說明

一個國家之綜合國力，最重要的就是反應一個主權國家的國家利益。所以，綜合國力是一個主權國家生存與發展所擁有的全部力量、權力（實力，包含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及國際影響力的總合。因此，綜合國力的定義包含以下幾個基本內容：一、綜合國力是一個主權國家所擁有的權力，它是實際存在的綜合力量，在實質上它包含生存力、發展力和國際影響力；二、國家對內、對外的基本動機，主要是體現其國家利益。而國家利益的核心目標主要體現在，關係著國家命運的生存力、發展力和國際影響力等三個面向上；三、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強弱大小必須和其他國家相互比較，特別是和主要的競爭國家相比較，才能得知本國在國際上所處的地位和作用；四、綜合國力的實質面為高科技的競爭，而競爭的手段還是要透過軍事力量，所以軍事力量仍將是綜合國力中的一個重要因素。黃碩風在整合中西方學者的觀點後認為：綜合國力是個龐雜的系統，它不僅隨時間的推移和世界形勢的變化而變化，而且通過科學技術、經濟、外交活動與國際環境進行相互交換，呈現出開放及動態的系統。<sup>99</sup>

---

<sup>99</sup> 黃碩風，《綜合國力新論—兼論新中國綜合國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民 88，頁 5-6, 70。

綜合國力的構成要素，主要可依「要素性質」、「具體要素」，及「權力的型態」三者作區分。第一項「要素性質」，以 Ray S. Cline 為例，他將國力分為物質要素與精神要素兩大類。前者包含基本實體(Critical Mass, C)、經濟能力(Economic Capability, E)，及軍事能力(Military Capability, M)；後者包含戰略意圖(Strategic Purpose, S)及國家意志(Will to Pursue National Strategy, W)。<sup>100</sup>第二項「具體要素」方面以 Morgenthau 為例，他將國力構成要素分為八項：地理：自然資源、工業能力、軍備狀況、人口、民族特徵、國民士氣、外交質量。Morgenthau 後來又增加政府質量這一項要素。至於，用「權力的型態」做為綜合國力構成要素的區分標準，可以 Nye 為代表說明之。他認為衡量一國實力的標準分為剛性權力和柔性權力兩種型態。剛性權力是指支配性的權力(Command Power)，包含基本資源、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和科技力量；柔性權力是指合作的權力(Coaptive Power)，包含國家凝聚力、文化被普遍接受的程度和參與國際機構的程度。Nye 同時認為剛性權力和柔性權力都具有相同的重要性。<sup>101</sup>黃碩風則認為構成綜合國力的要素，涉及層面很廣，不過劃分上要遵循以下四個準則：(一)具有與國家利益目標的一致性；(二)具有其他要素的不可替代性；(三)具有長期的穩定性；(四)具有國際比較性。按照上述四個準則，綜合國力的構成要素可以分為：政治、經濟、科技、國防、文教、外交、資源等七個面向。這七個面向包含了一個國家所有的存在與發展機能，構成了一個有內在聯繫關係的動態大系統。<sup>102</sup>

---

<sup>100</sup> See Ray S. Cline, *World Power Trends and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80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1. 以及 Ray S. Cline, *The Power of Nations in the 1990s: A Strategic Assessment*.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4.

<sup>101</sup> Joseph S. Nye, Jr.,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in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Eugene R. Wittkopf, eds., *The Global Agenda: Issue and Perspectives*. New York: McGraw-Hill Company, 2001, p. 96.

<sup>102</sup> 同註 99，頁 10-13。

如前所述，Cline 的綜合國力方程式為  $Pp = (C + E + M) * (S + W)$ 。運用該計算的方式，統計結果排序前二十名的國家為：前蘇聯、美國、巴西、前西德、日本、澳洲、中國、法國、英國、加拿大、印尼、台灣、韓國、埃及、南非、越南、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西班牙、印度等等。運用 Cline 的公式，再加上一九九〇年新增的補充數據，<sup>103</sup>其結果製成表 2-4：

表 2-4：綜合國力統計表[  $Pp = (C + E + M) * (S + W)$  ]

國家	S	W	(S+W)	(C+E+W)		(C+E+W)*(S+W)		綜合國力排序	
				1978	1990	1978	1990	1978	1990
前蘇聯	0.7	0.5	1.2	382	367	458	440	1	1
美國	0.3	0.4	0.7	434	454	304	318	2	2
日本	0.6	0.8	1.4	77	118	108	165	5	3
中國	0.4	0.2	0.6	139	137	83	82.2	7	8
印尼	0.5	0.4	0.9	61	74	55	67	11	10
台灣	0.8	0.9	1.7	29	29	49	49	12	14
南韓	0.7	0.7	1.4	33	38	46	53	13	12
越南	0.8	0.2	1.0	39	47	39	47	16	15
菲律賓	0.5	0.3	0.8	30	33	24	26.4	24	27
泰國	0.6	0.4	1.0	20	24	20	24	34	31
馬來西亞	0.4	0.3	0.7	7	12	5	8.4	65	60
緬甸	0.2	0.1	0.3	13	15	4	5	67	67
新加坡	0.6	0.5	1.1	2	2	2	2.2	74	73

資料來源：王涌芬主編，《世界主要國家綜合國力比較研究》。湖南出版社，民 85，頁 441-444。轉引自：黃碩風，《綜合國力新論—兼論新中國綜合國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民 88，頁 260-263。

經由上述國家利益及綜合國力的說明及討論，本文將適時地以兩者作為分析及探討的「工具」，應用於中國及東協間的互動過程中。運用國家利益及綜合國力這兩項「工具」，來討論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之形成。另一方面，將國家利益的概念置於中國與東協兩造間的互動過程，進一步了解雙方的往來及攻防。換句話說，雙方間互動的虛實，仍不脫離追求國家利益的核心思維，依

<sup>103</sup> 此部分我們僅列出部分重要國家、東亞國家以及東協諸國。此外，由於相關統計資料缺乏汶萊、寮國、柬埔寨三個東協國家的資料，所以表 2-4 中尚未列出。

然是現實主義的傳統。所以，本節主要目的在說明兩者的意義與內涵，以期對後文提到「國家利益」與「綜合國力」兩名詞時，有助瞭解文章的內涵及脈絡。

## 第四節 結語—東亞區域主義之變遷

在冷戰結束後，國際社會的互動已漸漸由政治、軍事上的衝突，轉移到經濟、貿易上的合作與競爭。本文將後冷戰的國際政治格局、全球化下的國際政經局勢，視為當前國際社會之現況、背景。在此一國際大環境下，國與國之間為了因應當前的政經局勢，從區域主義延伸出的多項區域整合運動及機構，做為在此一趨勢下、區域主義間競合的自保及應變之道。另一方面，區域整合始於五〇年代的歐洲，到了六〇年代則有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開發中國家間的整合運動。七〇年代在東南亞地區，該區域的國家也因為安全上的需要籌組東協，進行「功能性」的區域整合。在八〇年代，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成立，帶動另一波區域整合的高潮。部分國家為盡快達到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先從地緣上相近國家間的合作開始，簽署區域貿易協定(RTA)以及籌組自由貿易區(FTA)。

至於，在東亞地區潛藏著三大「品牌」的區域主義，主要有以美國為首的亞太主義、中國與日本相互競逐影響力的東亞主義，以及東協主導的東協主義。三者彼此間的互動及交會，也可視為國際社會政經局勢發展的延續。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明顯受到國際政治、經濟，以及歷史變遷的制約。冷戰時期，在東西雙方壁壘分明、相互對峙下，東亞的區域主義不是在反映美蘇強權的制約，就是顯示出南方國家的無奈。隨著冷戰的結束及外來影響力的減弱，東亞各國的自主性逐漸提高，較有能力抗拒區域外先進國家的支配，也更有能力推動利己的區域主義。

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道路並不平順，必須時常以「亞洲價值」來回應西方國家的各種不同觀點。在冷戰時期，東協主義者依附於美國為首的集團羽翼下。隨著後冷戰時期的到來，東亞地區的政經發展，已從過去美、日主導，以全球主義或亞太主義為主的運作趨勢，逐步發展成以東亞主義甚至國家主義為主的力量，試圖牽引或吸納全球主義與亞太主義。這其中又因大陸的東亞主義與東協主義合流，使東亞區域主義產生不同以往的結構性變化。新的東亞區域主義，嘗試建立起新的「亞洲認同」，以形塑東亞區域主義的「在地化」認同，嘗試排除外來力量的約束。

另一方面，東亞三大區域主義彼此間的攻防和互動，也牽動著三大「品牌」間的合縱連橫。以東協主義來說，面對來勢洶洶，以亞太經合會為中心的亞太主義，東協主義者除表現出抗拒前者正式化、建制化外，同時不斷加強自身的發展和東協自由貿易區的設立。除此之外，東協國家的集體力量為進一步奠定主導東亞事務的地位，首先必須排除美國在其間的影響力，所以分別從「洲際平衡」與「大國平衡」兩方面積極部署。<sup>104</sup>亞歐會議的召開讓東協產生莫大的鼓舞，因為就東協對此一安排的戰略面而言，東協有意藉由推動「引歐入亞」的洲際平衡，達成其銳意發展的目標。<sup>105</sup>

除此之外，有一個重要因素，深深地影響東亞區域整合藍圖的擘畫：一九九七、九八年間的亞洲金融風暴，是促使東亞國家真正願意合作的契機。由於代表亞太主義利益的亞太經合會在亞洲金融風暴中沒有任何作為，如此喪失了該組織在區域整合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先機。<sup>106</sup>東亞新一波的區域合作與整合，著重在自

---

<sup>104</sup> 同註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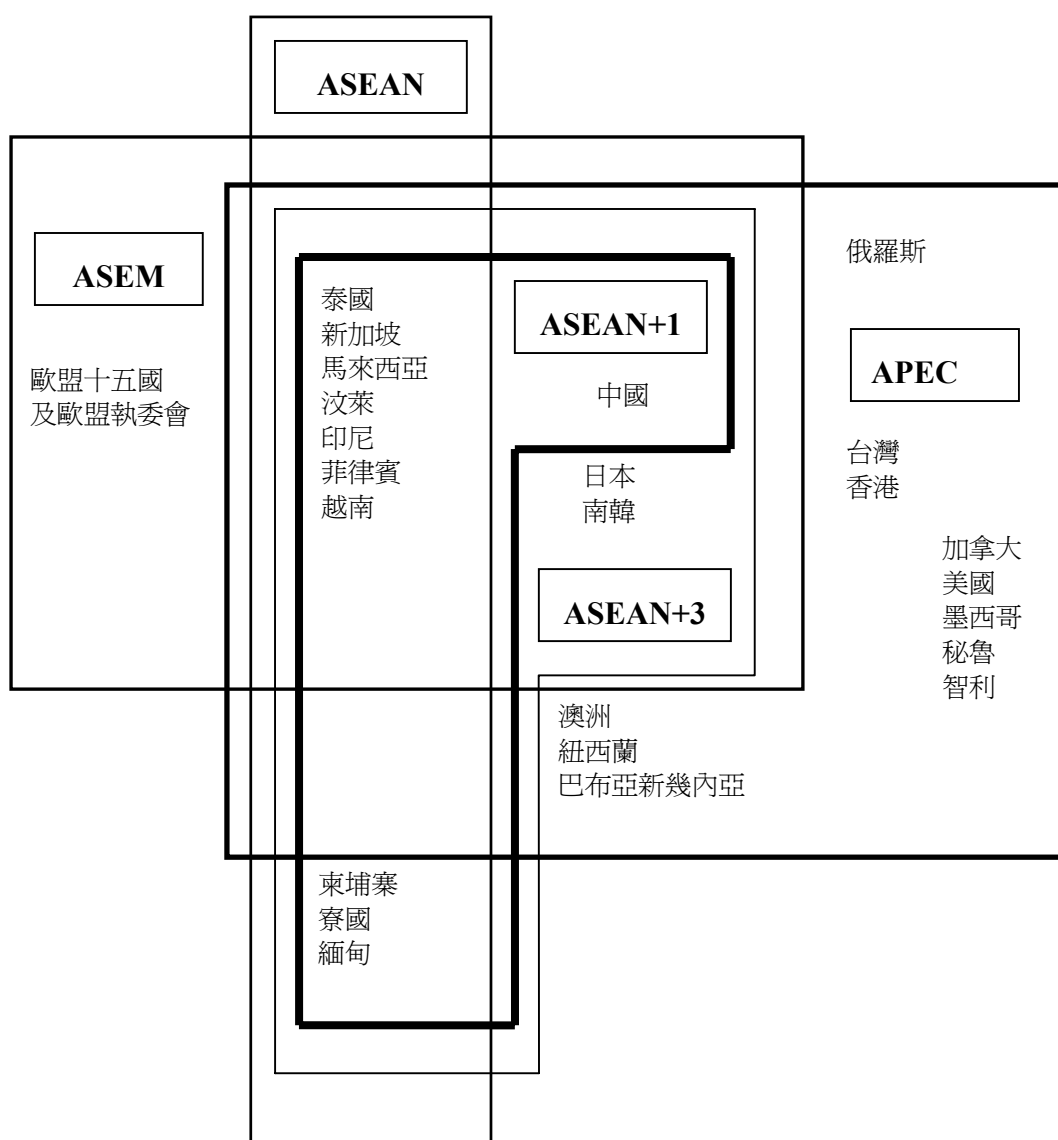
<sup>105</sup> 同註 23，頁 217。

<sup>106</sup> Tun-jen Cheng, op. cit., pp. 21-32.

由貿易區的建立，尤以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為主要核心，該自由貿易區已為東亞區域整合的火車頭。

本文僅就在東亞三大區域主義交會與變遷下，主要國家間的互動及參與相關組織的「歸屬」關係，如圖 2-2 所示：

圖 2-2：東亞區域主義結構下主要國家間的互動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如上圖（圖 2-2）所示，右邊為美國為首亞太主義所倡議之亞太經合會的成員，亞太經合會為美國與東亞聯繫的主要橋樑，美國同時「獨攬」此一管道，排除歐盟勢力在此間的影響；左邊則為東協主義倡議、與歐盟通力合作的亞歐會議，在該架構下東協與歐盟初步排除美國的加入，兩造在「各取所需」的先決條件下相互合作，逐步壯大各自的聲勢與需求；中間的區塊部分，則為東亞主義的海陸爭霸。以中國為主的大陸的東亞主義，在東亞區域整合上由於東協加一先行推動，暫時取得先機；日本為主的海洋的東亞主義由於延續亞太主義的政策思維，雖在區域整合議程上落後中國，不過日本以「鴨子划水」之姿，逐步與東協諸國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再加上美日安保條約在軍事安全上的「加持」，仍有未來之發展性。

在東亞三大區域主義中，大陸的東亞主義與東協主義在經貿整合上有「匯流」的趨勢，不過此一發展並不代表亞太主義失去在此間的運作空間。由於美國在 Clinton 主政時期，對東南亞的外交政策過於放任和紊亂，使美國錯過許多與東協主義者合作的契機。不過，隨著全球反恐大旗的高舉，東協諸國與美國間加速安全議題上的合作。在此一氛圍下，東亞區域主義間產生微妙的變化：東協在經貿整合議題上，與中國合作；但是在攸關國家安危的安全議題上，仍舊選擇美國為合作夥伴。所以，以美、日為中心之海洋的東亞主義，雖然在新一波區域整合略居下風，但是日本依附美國外交政策的走向，卻成為東協主義者制衡中國的策略考量。換言之，東亞區域主義依舊是三股勢力的交會，三者間兩兩彼此間的合作和競爭，牽動著東亞政經局勢的發展。筆者將延續本論文核心東亞區域主義之觀點，依此探討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之形成。



## 第三章 東協及東協加一—歷史的面向

### 第一節 東協相關發展歷程

「東南亞」(Southeast Asia)一詞的使用和稱呼，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才出現的。在一九四三年第一次魁北克會議(First Quebec Conference)中，首度由美國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以及英國首相 Winston S. Churchill 提出，<sup>107</sup>主要是為了方便同盟國對軸心國作戰，而做的區域劃分。當時英國的 Lord Louis Mountbatten 綜理同盟國聯軍之東南亞指揮部，管轄北回歸線以南的領土。<sup>108</sup>目前學術界所規範的東南亞地區主要包含下列十個國家，這些國家同時都為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Nations, ASEAN)的成員，分別是：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新加坡、汶萊、越南、緬甸、寮國、柬埔寨。前五國為東協創始國，後五國則依入會的先後順序排列。若依地理上的區分，可以將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汶萊等五國，稱為「島嶼的東南亞」(“Insular” Southeast Asia)；泰國、越南、緬甸、寮國、柬埔寨，地理上則是屬於「大陸的東南亞」(“Mainland” Southeast Asia)。<sup>109</sup>

#### 壹、東南亞地區的歷史與發展

東南亞地區的國家成員，與北方鄰邦中國—「天朝上國」—長期以來有著密切的連動關係，尤其是上述位於中南半島的國

---

<sup>107</sup> Russell H. Fifield, “The Southeast Asia Command,” in K. S. Sandhu, Sharon Siddique and Chandran Jeshurun, eds., *The ASEAN Reader*.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2, p. 20.

<sup>108</sup> 同註 1。

<sup>109</sup> Clark D. Neher, *op. cit.*, p. 5.

家。<sup>110</sup>到了十五世紀西方航海技術進步後，該地區於十六世紀初又遭受到西方國家的剝削、殖民。西方學者通常將一八七〇年代當作是東南亞西化、與世界接軌的年代，對於該等國家之前的歷史介紹都僅止於其轉運(Connection)站、商業貿易中心(Emporiums)的地緣、戰略描述。<sup>111</sup>若以外交史的角度來看，一八七〇年代堪稱是一個劃時代變動的分水嶺。在歐洲部分，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七一年之際，正值普法戰爭，同時也象徵著歐陸強權的權力轉移；<sup>112</sup>在東南亞昔日中國「藩屬」方面，厚植實力的英國控有緬甸，而重拾國家榮耀的法國則欲染指越南。<sup>113</sup>另一方面，東南亞地區雖然不曾出現一個統一全境的國家，但是該區域也有過輝煌文化和帝國的歷史。例如 Stephen Dobbs 在其文章中所提到的「扶南」(Funan)，她曾經是全東南亞最強大的航海及重要貿易強權。<sup>114</sup>

東南亞地區處於中國及印度兩強的緩衝地帶，我們可以從「印度支那」(Indo-China)這個法國人所創的名詞中發現其間的關係。隨著東南亞地區商業貿易的發達，與中國、印度及中東等地的交易也更加熱絡，從而促使文化的相互影響。對該區影響最深的就是印度文化，而所謂印度化(Indianization)就是融合東南亞本土文化和印度文化，造就出特殊的地區風情。到了十三世紀隨著可蘭經和寶劍，狂熱的伊斯蘭信仰者將其宗教傳入東南亞島嶼地區，從此也改變了當地人的信仰和生活。目前在馬來西亞、印尼、汶萊，以及菲律賓的岷達那峨島南部，主要都是信仰伊斯蘭教。至於中國對東南亞的影響，主要是在越南的文化及生活方面。<sup>115</sup>越南傳統王朝也和中國一樣獨尊儒術、設置六部，連文官制度也相

---

<sup>110</sup> 「中南半島」此一名詞是以中國的觀點來命名的，即為處在中國南方的半島。

<sup>111</sup> Stephen Dobbs, "Entrepot of Trade: Southeast Asia until the 1870s," in Patrick Heenan and Monique Lamontagne, eds., *The Southeast Asia Handbook*.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2001, p. 4.

<sup>112</sup> 蔡東杰，《西洋外交史》。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有限公司，民90，頁135-139。

<sup>113</sup>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台北：曉園出版社有限公司，民83，頁248-250, 271-286；蔡東杰，《中國外交史》。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有限公司，民89，頁103-112。

<sup>114</sup> Stephen Dobbs, op. cit., p. 5.

<sup>115</sup> Ibid., pp. 7-8.

仿。<sup>116</sup>另一方面，菲律賓由於地處該區域的邊緣，再加上其一五二一年後西班牙有計畫的傳入天主教及長期殖民，使得菲律賓的西化進展最為快速，也使其文化迥異於其他東南亞地區的國家。<sup>117</sup>

Adrian Vickers 將一八七〇到一九五七年稱為殖民時期的東南亞，從英法在「印度支那」的競逐，直到一九五七年英國將馬來半島的主權交給馬來亞的巫統黨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UMNO)，西方列強正式結束在東南亞地區的殖民事業。這近九十年的殖民歲月，其中經歷了二次大戰，日軍席捲了整個東亞，為東南亞地區播下了民族主義的種子。日本人高舉「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之旗幟，並鼓吹大東亞共榮圈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的願景。日本除了幫忙東南亞諸國推翻殖民母國，也設法建立本土過渡政權。這些「非預期」的民族國家形成前之執政準備工作，也奠定了戰後暹羅等國家獨立的寶貴經驗。不過該等國家萬萬沒料想到二次大戰之後，她們竟然還要重回舊殖民母國的懷抱。菲律賓首先發難，於一九四六年獨立。接者，印度的獨立鼓舞了東南亞區域其他國家的民族國家意識，紛紛與殖民母國以先戰爭、後議價的方式宣布獨立。<sup>118</sup>

## 貳、二次大戰後東南亞區域整合的嘗試： 從區域安全到經濟的初步合作

### 一、東南亞區域安全的起步：初試啼聲

二次大戰期間，美國迅速累積國力，使其有能力率領同盟國打贏勝戰。於此同時，紐約取代倫敦成為世界金融中心、美國成

---

<sup>116</sup> 同註 1，頁 130。

<sup>117</sup> Stephen Dobbs, *op. cit.*, p. 7-8.

<sup>118</sup> Adrian Vickers, "Imperial Frameworks: Southeast Asia from 1870 to 1957," in Patrick Heenan and Monique Lamontagne, eds., *The Southeast Asia Handbook*.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2001, pp. 12-23.

為世界兵工廠，其國力之雄厚可見一般。戰後國際社會依尋美國理想主義(Idealism)意志，成立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等相關國家間組織。在經濟方面，美國也一手主導了布萊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由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主導自由貿易，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主導貨幣、金融方面的秩序；此外，還有世界銀行(World Bank)主導國際信貸業務，這三個支柱建構美國戰後擘畫國際經濟秩序的基本藍圖。美國主要仗勢著先進科學技術發達、經濟市場規模龐大，以及強大的國防，作為其成為世界霸權(Hegemonic Power)的三大基石。另一方面，美國自美西戰爭勝利取得菲律賓之後，也將其觸角伸展到亞太地區。不過要到二次大戰後，美國在東亞才能算是取得優勢。美國除了將日本及東亞四小龍把玩在其掌間外，對東南亞諸國的政治經濟脈動也均能予以掌握。

在冷戰的氛圍下，圍堵「紅禍」成了美國全球性的戰略思維。在反共及擔心共產勢力「外溢」的情況下，東南亞諸國一切以國家生存為其國家利益的首要考量，所以在此一時期的對外方針及東南亞區域內的合作，當然以安全問題為至高無上的優勢策略。此外，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七〇年代，美國因為冷戰而施行全面的圍堵政策。在美國主導下，同時號召菲律賓、南越及泰國，於一九五四年成立東南亞公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以反共為訴求、進行圍堵政策，避免共產勢力「外溢」造成「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sup>119</sup>此一組織除了上述兩個半國家是東南亞地區內成員外，由於多屬美國的盟邦，對於促進該區域合作少有助益，且除泰國對於越南的問題威脅到其自身安全外，其他東南亞國家並沒有明顯而立即的危機。該組織於一九七七年，宣告解散。此外，還有一個反共組織，稱為「亞太委員會」

---

<sup>119</sup> John Sterling, "ASEAN: The Anti-Domino Factor," *Asian Affairs*, Vol. 7, No. 5, May/June, 1980, p. 274.

(Asia Pacific Council, ASPAC)，於一九六六年成立，但是也未獲得廣大支持，在一九七二年匆匆結束、正式解體。<sup>120</sup>

東南亞地區最早成立，且完全由該區域國家發起的區域組織為「東南亞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SA)。這個組織於一九六一年七月成立，由原本的馬來亞、<sup>121</sup>菲律賓，以及泰國共組而成，該組織成立的宗旨為強調在經濟、社會、文化、科學及行政等領域進行合作，且標榜亞洲問題應由亞洲人來解決。然而印尼一開始即指責，東南亞協會為親美、反共的組織。不過該組織於一九六三年即因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為了沙巴主權而發生衝突，<sup>122</sup>同時斷絕往來迫使該組織停止活動。一九六七年八月，東南亞協會隨著東協的成立而走入歷史。另外，為化解馬來西亞聯邦成立時的歧見與領土糾紛，一九六三年八月馬、菲、印尼三國組成「馬菲印組織」(Maphilindo)。由於該組織強調馬來族血緣關係，以致限制了其發展性。馬來西亞聯邦成立後，印尼更採取對抗政策，最後也導致該組織名存實亡。<sup>123</sup>

在冷戰期間，東南亞地區也延續著地緣政治海陸爭霸的戰略思維。如前文所述，東南亞地理上可以區分為島嶼的東南亞，以及大陸的東南亞。大陸的東南亞國家，在此一時期皆為社會主義國家，惟泰國非屬同一陣營，所以其反共黨顛覆之心急切，也較能響應美國等西方盟國的號召。在島嶼的東南亞諸國方面，由於感受「紅禍」的壓力不如泰國，所以只有曾為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響應。也由於其地理位置位於圍堵共產勢力的前線列島，所以

---

<sup>120</sup> 李國雄，〈東協的區域組織發展與挑戰〉，《問題與研究》，第34卷，第4期，民84.04，頁16-17。

<sup>121</sup> 馬來半島上的十一州於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與宗主國英國達成協議，並於該年八月三十一日舉行獨立慶典；一九六三年馬來西亞結合了原本的馬來亞，再加上沙巴和沙撈越，合組馬來西亞聯邦，為君主立憲的國家。另一方面，新加坡於一九六三年加入馬來西亞聯邦，不過於一九六五年旋即退出。參見：林若零譯，Michael R. J. Vatikiotis 著，《東南亞政治與發展》(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台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民88，頁xvii。

<sup>122</sup> 同上註。

<sup>123</sup> 吳祖田，〈「東南亞國家協會」組織之發展與回顧〉，《問題與研究》，第37卷，第8期，民87.08，頁36-37。

菲國加入了反共集團的行列。以功能主義的角度來說，依安全議題尤以反共為主軸的區域組織，在東南亞地區的「市場」尚未打開，也未能取得認同。同時因為絕大部分東南亞國家均屬剛獨立國家，在國家內部事務百廢待舉之時，著實無暇他顧。此外，彼等組織的對象只有半個（島嶼的）東南亞，此時大陸的東南亞國家，仍在推動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結合的試煉運動。東南亞國家要等到區域內部紛爭暫時告一段落，共同目標明顯一致後，合作的意願就會提高，而這個時間點就在一九六七年。

## 二、東南亞國協(ASEAN)的成立：

爲了安全再次結合、爲了經濟初步合作

任何組織的成立，都有其成立背景、時空因素，以及其存在的結構性制約。東南亞國協(ASEAN)基本上承襲了東南亞協會(ASA)及馬菲印組織(Maphilindo)的精神，區域內合作的方式，以及組織形式等發展。雖然區域內國家因為彼此間領土的爭端，而破壞區域組織的發展，不過東南亞地區的確有區域組織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區域外國際情勢的轉變，也影響著區域內行動思維的方向。一九六五年，美國加入越戰；同年九月印尼親共的 Sukarno 政權在一場流產政變後下台，由 Suharto 接掌政權，同時改採務實、親美路線，對鄰邦尤其是馬來西亞採取睦鄰政策，區域內部緊張局面大為和緩。一九六七年八月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以及新加坡等五國，在美國的協助下成立了「東南亞國協」。除加強區域內經濟、文化和社會方面的合作外，主要的出發點還有：因各國深受國內共黨勢力叛變之苦，同時中南半島上又因越戰的擴大而更加不安。所以東協的成立，顯然同時兼具了安全和政治的考量。<sup>124</sup>附帶說明的是，中國對於此一組織的成立，始終將其視為美國帝國主義驅使下的區域安全組織。<sup>125</sup>

---

<sup>124</sup> 陳治萍，〈東協國家的區域性政經發展〉，碩士論文，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民 82，頁 33-40。

<sup>125</sup> Shee Poom Kim, "China and the ASEAN States: From Hostility to Rapprochement," in Chun-Tu



關於東協發展軌跡的階段性分類，學者的看法頗為類似。<sup>126</sup>主要的時間點，本文將之歸納為：一、一九六七年八月東協的成立—隨著「曼谷宣言」(Bangkok Declaration)的提出，標誌著東南亞區域合作的新里程；二、一九七六年二月第一屆東協高峰會議(ASEAN Heads of Government)—除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與「東協和諧宣言」(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ord)外，在該次會議中也決定在印尼雅加達設立常設秘書處。一九七七年東協將部長級會議提升至高峰會議(領袖會議)，上述東協制度化的過程，均有助於東協區域整合與合作的推動；三、越南在一九八九年自柬埔寨撤兵—象徵著東協區域內部的安全問題大致解決，同時整體國際情勢則慢慢步入後冷戰時期；四、冷戰結束—後冷戰時期，東協逐步邁向經濟議題導向的合作。除了第四項將留待本節第「叁」部分詳加探討外，前三項其實仍著重在區域安全的範疇，這也是本節分類的依據所在。本文將延續上述重要時間點，依序說明東協區域整合在安全方面的相關歷程：

#### (一) 東協之開創、內部整合期(1967-1976)：

##### 漸次朝向制度化的區域組織

一九六七年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以及新加坡等五國在曼谷集會，八月七日簽署曼谷宣言，八日東協正式成立。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間(東協之開創、內部整合期)，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區域內的和解，亦即緩和東協各會員國間，因獨立時所引起的領土糾紛和主權爭執。針對上述目標而言，印尼在自我克制上是成功的。印尼肯如此是因為她需要一個團結的東協，來

---

Hsueh, 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New Perspectives*. New York: Praeger, 1982, p. 73.

<sup>126</sup> 參見：李國雄，〈東協的區域組織發展與挑戰〉，頁 12-27；吳祖田，頁 35-48；以及金榮勇，〈東亞金融風暴對東協組織的影響〉，《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2 期，頁 88.02，頁 56-58。

幫助其達成提高自我身價和獲得西方世界額外資金的雙重目的。<sup>127</sup>而各國也默認印尼居於「許多平等中的首位」(First among Equals)之基礎上，由印尼來扮演領導者的角色。如此也使得印尼表現出節制及協調溝通的意願，有助於東協各國以容忍和磋商，包容彼此間的歧見和衝突。<sup>128</sup>

不過，在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五年這九年當中，東協幾乎是處於空轉的局面，具體成就非常有限。一九六九年美國總統 Nixon 提出越戰越南化的構想，並持續表示進入談判代替對抗的政策，以期早日解決陷入膠著的局勢。英國也隨之於一九七一年，宣布放棄遠東防務。在國際大環境的氛圍下，東協國家為求自保便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發表「和平、自由及中立區」(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 ZOPFAN)宣言，該宣言揭褻了追求東南亞和平、自由，以及中立的目標。一方面爭取大國保證區域的中立化，期望排除任何形式的強權干預；另一方面，實行與大國間的「等距外交」策略，使大國間產生相互制衡力量。<sup>129</sup>該宣言雖然排除列強在東南亞的任何特權，但實際上該宣言並無任何約束力，只是表明各國普遍的期望。其目的在使東南亞不再成為外來勢力的競技場，讓區域內各國自己掌握政治命運。但是，當各國高舉中立旗幟的同時，區域內成員國依然與西方列強維持密切且依賴的軍事關係，如此仍突顯出東協內部對於區域自主性的矛盾與分歧。<sup>130</sup>不過，隨著一九七五年越南的變天，讓東協諸國有了危機意識，也大幅縮減第一屆東協高峰會議的醞釀期。

###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第一屆東協高峰會議（峇里島高峰

---

<sup>127</sup> Dewi Fortuna Anwar, *Indonesia in ASEAN: Foreign Policy and Regionalism*.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4, pp. 59-61.

<sup>128</sup> 同註 120，頁 18。

<sup>129</sup> Leszek Buszynski, "ASEAN, A Changing Regional Role," *Asian Survey*, Vol. 27, No. 7, 1987, p. 782.

<sup>130</sup> 李國雄，〈東協安全機制的演變與區域秩序〉，《問題與研究》，第 34 卷，第 9 期，民 84.09，頁 25。

會，Bali Summit Meeting) 在印尼峇里島召開，與會各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及「東協和諧宣言」。這兩項文件表達了東協朝向確保區域和平及穩定、促進經濟及社會成長，以及加強與所有愛好和平之國家的合作需求等意向。此外，會議中也決定於印尼雅加達設置常設秘書處，提供東協行政支援及協調組織活動。這些新的制度和規範，使東協朝向一依多邊主義架構邁進的區域整合目標—前進了一大步。

經過一九七六年二月的峇里島高峰會後，東協的運作方式及主要原則，逐漸形成兩項慣例：共識決之決策模式，<sup>131</sup>以及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sup>132</sup>在共識決之決策模式的部分，即是在尊重各個成員國組成的基礎上，於決策過程中尋求一致性。同時，以馬來人的文化實踐為基礎，經由諮商和共識所建立起的一種運作模式。所以，東協所有的決定，均必須達成共識。倘共識不能達成，各國會將其差異暫時擱置(Pigeonholed)、各自行動，並適度調整與其他會員國間的歧見。從外交層面來看，就是「**擱置衝突主義**」(Non-Confrontationalism)，讓具有爭議的部分暫時擱置，待日後再行協商，所以將不會影響到目前需要解決的重要事務。<sup>133</sup>

此外在互不干涉原則方面，一九七六年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第二條當中即規定：締約方在彼此關係上遵循「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同時基於生存的需要，皆有「避免外來干涉或壓迫」之權力。<sup>134</sup>另一方面，該條約更進一步利用此項原則，凍結東協各國現有疆界，即是以簽約時各國所實際佔有者為準。<sup>135</sup>所

---

<sup>131</sup> 「共識決之決策模式」，也就是所謂的「全體一致原則」(Musyawarah, Consensus)。

<sup>132</sup> 「互不干涉（內政）原則」，又可以稱為「東協方式」(ASEAN Way)，是由 Amitav Acharya 所提出的。See Amitav Acharya, “Ideas,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from the ASEAN Way to the Asia Pacific Way?” *Pacific Review*, Vol. 10, No. 3, 1997, pp. 319-320.

<sup>133</sup> George O. White III, “Foreigners Beware? Investing in a Jungle with Many Predators: The ASEAN Investment Area,”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No. 37, 2002, pp. 160-161.

<sup>134</sup> 陳鴻瑜譯，〈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收錄於陳鴻瑜，《東南亞國家協會之發展》。南投：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民 86，頁 234。

<sup>135</sup> Dewi Fortuna Anwar, op. cit., p. 171.

以不干涉原則基本上內外一致，區域外國家不得干涉區域國家之內政事務，而會員國間則互不干涉內政。由於東協諸國的政治型態均屬威權政體，換言之各國政府及其執政黨，均握有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的資源。當欲推動區域整合運動時，必然會與各國國內政經資源相互衝突。若碰到會員國彼此間相互利益必須因調和而有所損失時，互不干涉的大旗就會浮現，且往往都是犧牲主張區域整合的一方。也因此可以看出為何東協在對外政策上往往能口徑一致對外，但是面臨家務事、區域整合問題時，往往力不從心，必須面對複雜的互動和利益糾葛的羈絆。<sup>136</sup>

## （二）東協之發展、組織成熟期(1976-1989)：

### 面對共同的外患與經濟整合的萌芽

#### 1. 面對共同的外患

Bilson Kurus 認為東協各國政治領袖在東協成立之初，藉由彼此間的接觸、互動及摸索取得的經驗，是東協在開創、內部整合階段一項寶貴的資產。即便在該時期的成就不多，但是透過經驗的累積和意見的廣泛交流，無形間增加了東協各國彼此間的互信和運作模式，同時也是東協邁向成熟穩定的重要因素。<sup>137</sup>就如同前文所述，雖然東南亞協會及馬菲印組織的壽命短暫，但是東協基本上承襲了該等組織的精神，對於未來區域內合作的方式，以及組織形式等發展，都有長足的啟發與影響。不過真正促成東協步入新的發展階段之因，卻是由於區域內外環境的激盪與情勢的變遷。

一九七六年第一屆東協高峰會議後，東協進入了新的發展階

---

<sup>136</sup> 同註 126，金榮勇，〈東亞金融風暴對東協組織的影響〉，頁 64。

<sup>137</sup> Bilson Kurus, "Understanding ASEAN, Benefits and Raison d'Étre," *Asian Survey*, Vol. 33, No. 8, Aug., 1993, p. 827.

段（東協之發展、組織成熟期）。此一時期東協以維護內部共同安全，全力抗拒來自越南的軍事威脅、擴張為目標。東協採取了政治安定與發展經濟並進的策略，對國內採取維護政治上的安定為首要目標，對外則以促進東協各國經濟之發展來對抗共產主義集團國家的虎視眈眈。另一方面，在此一會議前，東南亞的「區域性安全與秩序」在東協公開性文件及聲明中，是處於次要地位的。不過第一屆東協高峰會議，卻是東協在它正式成為有限的安全組織之過程中，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會談結束後所發表的宣言中，東協首度將區域安全列為緊要的政治議題。這也意味著東協逐漸擺脫以往一廂情願的理想性文字宣示，開始以實際的政治途徑，尋求區域外強權在必要時的支持，以維護東協諸國的安全。隔年（一九七七年）八月三日至四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第二屆東協高峰會議。除了慶祝東協成立十週年外，與會的東協諸國認為應使東協成為強有力的區域組織，並同意以東協為主體與第三國或其他國際集團展開對話與合作，同時也與澳、紐、日等國舉行雙邊對話。<sup>138</sup>

除此之外，東協在對抗越南的擴張與威脅方面頗具成效，一方面針對柬埔寨問題訴諸聯合國將其國際化；再者，於一九八一年七月召開解決柬埔寨爭議的國際性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ampuchea, ICK)，以期形成國際性論壇的效應。該會議最終未能解決此一問題，不過強化並突顯了東協諸國在對東政策上的一致性，有助於該問題的解決；<sup>139</sup>最後，東協諸國在美國及中國的協助下，成功於一九八九年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兵。東協作為會員國集體對外政策上的「工具」角色，已日漸具備。藉由集團的凝聚力及動員力，在國際間展現東協趨向圓熟的外交手腕，國際間普遍給予正面的評價。

---

<sup>138</sup> 同註 123，頁 39。

<sup>139</sup> Bilson Kurus, op. cit., p. 822.

## 2.經濟整合的萌芽

經由上述東協軍事、安全之合作的討論，本文進一步說明東協諸國在此一時期之初步的經濟合作方案。一九七〇年代中期至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可以說是東協區域經濟合作的奠基階段。東協諸國對於國內政治局勢逐漸穩定、在「安內」之後，開始全力發展經濟。不過正當東協各國銳意拓展對外貿易之際，整個國際經濟情勢對她們來說十分不利。她們遇到兩次石油危機，以及全球經濟不景氣，對東協諸國造成了嚴重的衝擊。所以，東協自一九七六年的峇里島高峰會議後，陸續推動多項區域整合計畫，並與相關之貿易夥伴舉行擴大外長會議，欲藉由集體的力量共同面對美、歐新的貿易保護主義趨勢，進而帶動東協各國的經濟發展。

140

另一方面，在「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中，首度出現加強經貿合作的企圖。東協（五國）為了強化區域內的經濟活力與發展，於一九七七年二月簽署了「東協優惠貿易協定」(Agreement on ASEAN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 ASEAN-PTA)。在此項協議下，各國將在選擇性的基礎上，提供其他會員國貿易優惠。雖然該協議幾經修正，但是由於各國仍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只有在資源的分享上有足夠意願，但是缺乏政治意志來進行市場的分享。此外，東協為了因應廣泛的貿易議題，從一九八一年起正式開始與貿易夥伴間的對話制度(ASEAN Dialogue Partner System, ADPS)，這項制度主要提供了東協會員國與貿易夥伴間一個討論的論壇。一九八〇年代中葉以後，對話制度已漸趨常態，且通常都是在東協每年一度的外長會議後召開，稱為東協擴大外長會議(ASEAN Post-Ministerial Conferences, ASEAN-PMC)。在東協的發展過程中，擴大外長會議業已逐漸從經濟議題的交流，「外溢」到

---

<sup>140</sup> 同註 23，頁 207-208。

政治及安全的相關議題上。<sup>141</sup>

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汶萊脫離英國獨立，七日旋即加入東協，這是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於馬尼拉召開第三屆東協高峰會議前的一大喜事，使東協區域整合又向前邁進一步。這次高峰會將焦點放在經濟合作，同時也簽訂了馬尼拉宣言(Manila Declaration)，並訂定東協行動計畫(ASEAN Plan of Action)。東協各國政府首長還另行簽署四項經濟合作文件，以期藉此加強會員國間的經濟發展與合作。<sup>142</sup>此次會議還簽訂一項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修正議定書」(Protocol Amending 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of Southeast Asia)，該修正議定書開放給成員外國家簽署，<sup>143</sup>讓其他國家可以參與東協組織的活動，並同意以和平手段解決成員國家間的糾紛。除此之外，東協在面對全球區域化的情況時，東協不斷加強其區域性色彩，以增加對與北美和歐市相抗衡的本錢。一九八九年，東協諸國加入亞太經合會(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並後續提倡「東亞經濟集團」(East Asia Economic Group, EAEG)，籌組「東協自由貿易區」(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等構想，以期進一步推動區域內的經濟合作，強化東協各國的經濟力量，提升東協在亞太經濟合作的影響力。

二次大戰後東協國家從原先爭取獨立自主，到一九八〇年代末期的制度性整合，終於有了差強人意的成績單，不過對於「學步中」的新興開發中國家而言實屬不易。東協各國在面對一九六〇年代共同的敵人和威脅時，促成該組織第一次的制度化形塑，也讓東協的區域整合目標前進了一大步。最後，一九八九年東協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緩和了東南亞緊張的對峙局面。東協諸

---

<sup>141</sup> 同註 120，頁 21-22。

<sup>142</sup> 同註 134，頁 26。

<sup>143</sup> 二〇〇三年十月中國、印度，以及十二月日本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參見本章第三節、第「伍」部分：東協及東協加一：持續深化合作。

國在搬開「石頭」後，除了因外交作為讓東協國際地位大為提升外，作為東南亞地區最主要區域集團，其在東南亞事務上的發言也更有份量。雖然東協的區域安全架構尚未明確，且經濟合作也僅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情況，不過經過二十餘年的摸索，累積了豐富的協商默契，使得東協在後冷戰時期的整合，後續發展依然備受期待。

## 參、後冷戰東南亞區域整合的轉型與挑戰： 邁向區域安全、經濟議題導向的合作

一九五〇年代，東南亞國家在政治上採行「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之策略，左右游移於冷戰時期的美蘇兩強間。另一方面，在經濟上的表現東南亞國家也逐漸從原先保守的進口替代工業(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慢慢轉型到出口導向策略(Export-Oriented Strategy)的經貿走向。對東協諸國而言，一九七〇年代以來因引進外資而帶來的經濟成長，使得東協國家成為全球經濟成長極為顯著的地區。不過，隨著冷戰結束、後冷戰時代的來臨，全球區域化程度也日益加深。再加上，美國新保護主義盛行、日本泡沫經濟(Bubble Economy)破滅，以及中國經改成功帶來的競爭壓力，使得各國相對投資東協的資金明顯下降。同時，東協各國內部的投資環境未能及時因應，產業升級也不盡理想，使之競爭力有限，這些接踵而至的諸多限制，讓東協國家經濟陷入發展的困境。<sup>144</sup>東協國家為突破困境，於是起身奮力對抗貿易保護主義，努力改善投資環境、擴大貿易市場，且著手進行產業升級，以提升產業競爭力。換言之，東協企圖運用集體的力量的力量，強化對外談判的籌碼。對外運用「東亞經濟集團」(EAEG)、推動「東亞經濟會議」(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 EAEC)等議題設定，作為對抗美歐國家設下的經濟壁壘及強勢經濟干預

---

<sup>144</sup> 參見：洪淑芬，〈新興工業國家經濟發展的瓶頸〉，《問題與研究》，第36卷，第6期，民86.06，頁39-55。



的手段；對內則以區域整合的方式，透過成立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推動雙邊經濟合作，加速區域內各國的經貿發展。東協突破困境的各項措施，除了凝聚亞洲區域勢力外，同時也急欲排除西方國家對亞洲政經的制約與掌控。

延續前文關於東協發展的階段性分類，將後冷戰時期再分為兩個階段：一九九〇年到亞洲金融風暴為止；以及亞洲金融風暴後的區域整合。後者將於本章第二節再作說明，在此一部分主要討論前者提及的階段。針對後冷戰時期，從一九九〇年到一九九七、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這個階段，本文將分成四大主軸，依序說明之：

#### 一、成員擴張、組織強化

東協始終對於增加新成員有所期許，<sup>145</sup>尤其是自一九八四年汶萊加入後，一直無法在吸收成員上有所突破。在這期間也包含對緬甸及柬埔寨加入的期待，不過由於緬甸及柬埔寨在不得罪中國的前提下，拒絕加入。<sup>146</sup>整個國際局勢要到一九九〇年代才有東協抒發理念的空間，但是面對爭取越南、緬甸等歐美國家對其人權、民主「有意見」的國家時，東協擴大區域影響力的阻礙還是很大。

加入東協的最低基本條件為：需接受一九六七年曼谷宣言及一九七六年東協友好合作條約，同時亦須考量到申請國之技術、財政方面的能力。一九九二年東協開始思考，將其組織擴大成為涵蓋全東南亞的區域集團。<sup>147</sup>經過折衝妥協、抗拒歐美國家的反對後，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越南獲准加入東協。一九九六年

<sup>145</sup> 為求完整性，本論文在「成員擴張」這一部分的討論，將時間延後到一九九九年，東協第十國柬埔寨的加入為止。

<sup>146</sup> Dewi Fortuna Anwar, op. cit., p. 58.

<sup>147</sup> Leszek Buszynski, "ASEAN's New Challenges," op. cit., pp. 555-557.

十一月在雅加達首次舉行的東協非正式高峰會議(ASEAN Informal Summit)上，東協再度確認她們對於加速實現東協十國(ASEAN-10)的承諾與願景。一九九七年東協幾乎是在與美歐國家翻臉的情況下，於七月二十三日接納了緬甸的加入，寮國也同時成為東協會員。最後，於一九九九年准許結束內戰的柬埔寨入會，完成了該區域國家的入會行動，使東南亞地區的整合更趨完整。

一九九二年一月於新加坡召開了第四屆東協高峰會議，會中形成多項決議，對東協未來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一、設立東協自由貿易區；二、成立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三、東協高峰會議每三年定期舉行。此外，本屆高峰會議也強化的東協秘書長(Secretary-General of ASEAN)的角色，同時擴大東協秘書處(ASEAN Secretariat)的功能，使其能有效執行受託的任務。<sup>148</sup>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於泰國曼谷舉行第五屆東協高峰會議，該會議決議每年舉辦一次「非正式高峰會議」，使得東協各會員國領袖能夠在次數頻繁的接觸和溝通下，有效化解彼此間的歧見，有助於整合運動的推行。此外，也於本次會議中推動「東亞經濟會議」(EAEC)的構想，藉此凝聚亞洲勢力，嘗試排除美歐國家對亞洲經濟的制約與掌控。另一方面，東協除了藉由非正式高峰會議的召開接納尚未入會的緬甸、寮國、柬埔寨外，也預留伏筆。一九九七年東協更於非正式高峰會議後邀集中國、日本、南韓三國舉行「東協加三」(ASEAN Plus Three, APT)會議，針對區域問題彼此交換意見，促進區域穩定。<sup>149</sup>上述多項東協附屬機構，對於東協組織分工及新議題的設定與探討，都有實質的幫助，除了強化組織及區域內的溝通協調外，也增加了組織外、區域外的聯繫管道，諸此制度的建立使得東協組織架構更臻完備。

## 二、經濟整合、區域願景

---

<sup>148</sup> 東協秘書處直接督導經濟活動與事務，解散原來由經濟部長會議所領導的五個經濟委員會。

<sup>149</sup> 針對東協加三的討論，參見本章第三節、第「貳」部分：東協加三：一紙不完整的「協議」。

經濟上東協諸國持續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來的強勁發展，在八〇年代東協各國的平均經濟成長率為 6.4%，從一九九〇年到一九九六年間的平均經濟成長率更高達 7.6%。<sup>150</sup>東協在高速經濟成長的過程中，適逢歐盟及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立的衝擊，東協在一九九二年的第四屆東協高峰會議上，宣布在未來十五年內於二〇〇〇八年成立東協自由貿易區。另外，第四屆東協高峰會議可以說為東協區域經濟整合之發展，立下了一個新的里程碑。在此次高峰會中簽署了三項重要文件：「新加坡宣言」(Singapore Declaration)、「促進東協經濟合作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 on Enhancing 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以及「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Agreement on the Common Effective Preferential Tariff Scheme, CEPT)。上述三個重要文件中，以「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最為重要，該協定規定在未來十五年內，把所有區域內貿易的工業製成品之關稅，降低至百分之五或是零。這個計畫到後來又提前到二〇〇三年，以及二〇〇二年來達成目標。<sup>151</sup>此外，針對後來加入的會員，也給予六到十年的延後加入期限。

### 三、區域論壇、安全對話

在安全的層面上，東協為提升在亞太區域安全體系的主導地位，採取了與非東協國家間建立安全對話機制。一九九四年東協於曼谷召開了第一屆東協區域論壇(ARF)，作為溝通、處理區域安全事務的重要平台。東協區域論壇的重點在強調多邊安排和安全對話，它跟國際關係中的多邊主義所要達成的目標是一樣的，<sup>152</sup>就

---

<sup>150</sup> Callum Henderson, *Asia Falling*. New York: McGraw-Hill Press, 1998, p. 7.

<sup>151</sup> 此部分說明點出了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成立與基本政策之方向，相關較為詳盡的說明，參見本章第三節、第「壹」部分：東協自由貿易區的發展。

<sup>152</sup> 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意指兩個以上的國家，透過多邊的手段，經由長期的談判、磋商，制定普遍性的規範，解決國際間各種問題。John G. Ruggie 認為多邊主義是一種框架式(Architectural Form)的觀念，主要涵蓋有三大特性：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非歧視或普遍性原則(nondiscrimination or generalized principles of conduct)，以及擴散性互惠(diffuse reciprocity)。See John

是在建立互信、降低緊張，以及尋找解決共同問題的方法。<sup>153</sup>對東協各國來說，東協區域論壇的成立不僅象徵著是以「東協方式」(ASEAN Way)來維持亞太區域安全最具代表性的對話機制，同時也能愈加突顯東協的企圖心。東協嘗試成為一股新的區域勢力，且有與美國、中國及日本等強權並駕齊驅的實力，有資格與之共同決定和擘畫亞太安全事務。所以，從安全戰略觀之，東協即是主張透過邀請非東協會員國，參加擴大外長會議共商政經議題的氛圍下，進而掌握東協區域論壇的運作體系，主導多邊安全體系的發展方向；<sup>154</sup>另一方面，東協也在一九九三年於吉隆坡成立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Asia Pacific, CSCAP)，作為強化東協區域論壇之第二軌道的外交對話管道。

#### 四、對外發展、區際聯繫

自新殖民主義興盛以來，亞歐之間只有從屬的殖民體系，沒有國交平等的關係。亞歐彼此之間的聯繫，自從一九五七年後關係已漸行漸遠，<sup>155</sup>即便是一九八三年英國才准許汶萊獨立。在這段彼此交流的空窗期，東南亞國家逐漸從南北之間的鬥爭「覺醒」，組成東協、倡議自由貿易區，設立區域論壇等對外發展聯繫的管道。冷戰之後，一超多強的國際體系確立，給予急欲「表現」自身地位的歐盟和東協合作的契機和動力。再加上區域整合運動如火如荼的展開，也增加了區際間聯繫的急迫性。在多方因素交會下，一九九六年三月第一屆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 ASEM)在泰國曼谷召開，由亞洲十國（東協七國及中、日、韓）及歐盟十五國政府首長與會。亞歐諸國之所以願意拋棄彼此間的芥蒂，召開涵蓋亞歐二十五國的高峰會議，其實都有各自的盤算。

---

G. Ruggie,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3, summer, 1992, pp. 569-574.

<sup>153</sup> 同註 90，頁 372。

<sup>154</sup> 同註 23，頁 216。

<sup>155</sup> 詳情請參見本節、第「壹」部分：東南亞地區的歷史與發展，有關東南亞地區殖民簡史的說明。

除了區域內的經濟整合外，提升自身國際影響力和發言地位，也是雙方刻不容緩的目標。就國際現勢來看，擺脫美國霸權的陰影，是雙方合作最大的公約數，同時也將世界經濟版圖劃分為東亞、北美、歐洲，形成三足鼎立的新架構。

東協成立三十年的成績在一九九七年七月的亞洲金融風暴中遭受嚴峻的考驗，其考驗的結果是不及格的。東協中經濟發展較快、國際化程度較高的五個創始會員國，紛紛在金融風暴的亂箭中落馬，經濟均呈現負成長。災情最慘重的印尼，其個人國民所得更從一九九六年超過 1000 美元，一下跌到一九九八年的 500 美元以下，該國十年經濟發展的成果毀於一旦；泰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一九九八年個人國民所得，也跌落到一九九一年以前的水準，十年的經濟發展如同空轉、做白工。此外，災情還蔓延到政治層面，泰國總理 Chavalit Yongchaiyudh 政府下臺、印尼強人 Suharto 也掃到颱風尾，不得不下臺。<sup>156</sup>東協陷入了金融風暴的漩渦，該風暴對東協是福？是禍？

## 第二節 發展的逆流？合作的契機？

### — 亞洲金融風暴「啓示錄」

亞洲金融風暴不但一竿子打翻了東協國家先前的努力，同時也戳破了東協國家區域整合的幻境。東協運作機制在一九九八年的風暴當中，形成空轉的局面，沒有針對身陷風暴中的國家進行及時的援助和補救。這或許和東協成員國中印尼、泰國等經濟大國——身陷困境有關，不過長久以來東協引以為傲的「兩項慣例」——共識決之決策模式以及不干涉內政原則，似乎也應當在金融風

---

<sup>156</sup> 同註 126，金榮勇，〈東亞金融風暴對東協組織的影響〉，頁 58-59。

暴後加以修正和檢討。除此之外，國際貨幣基金及美國在針對東協各國在金融風暴中的援助，不若一九九四年到九五年間墨西哥金融風暴來得迅速和友善，使得該等國家對於美國及國際貨幣基金的做法頗有微辭。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策略，讓亞洲金融風暴不再擴大各國傷勢，也讓東協諸國對於與中國間進一步的合作，打開了試探之門。

## 壹、亞洲金融風暴序曲

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可以從三〇年代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提出的經濟發展「雁行理論」(the “Flying Gees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探之一二。在雁行理論的模式下，日本將其資金、技術，以及管理方式，推廣、擴散到亞洲其他國家。<sup>157</sup>在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下，再加上東南亞國家標榜的「亞洲價值」(Asian Values)，國家機器銳意發展國家整體經濟。東南亞國家依循著上述發展道路，逐漸從原先保守的進口替代工業，慢慢轉型到出口導向策略的經貿走向。在東南亞經濟發展一片欣欣向榮之際，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等機構，更針對亞洲四小虎的模範生—泰國讚譽有加，認為該國央行整體調控得宜，使泰國經濟發展突飛猛進。<sup>158</sup>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區域能夠有如此高的儲蓄率，而且將投資資金運用得如此妥當。東南亞各國能夠兩者齊頭並進，政府主導政策的角色居功厥偉。<sup>159</sup>不過東南亞諸國繁榮的景象背後，隱藏著潛在的危機，宛如茶壺中的風暴。Paul Krugman 就持不同於上述過於樂觀的看法，他認為：東亞經濟迅速發展的原因是由於

---

<sup>157</sup> Robert Gilpin,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76.

<sup>158</sup> Peter G. Warr, “Thailand,” in Ross H. McLeod and Ross Garnaut, eds, *East Asia in Crisis: From Being a Miracle to Needing One*.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8, pp. 49-65.

<sup>159</sup> 李明譯，Joseph E. Stiglitz 著，《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台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 91，頁 140。

投入大量的生產要素，透過國家機器、政策導向的動員，進而累積出經濟發展的華麗成績單。如此非基於提升生產力的運作方式，將會導致國家經濟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同時會產生資源運用的無效率，更無助於國家整體的發展。他同時認為亞洲各國除了日本之外，多數國家是靠增加投入來促進經濟成長的，這種增長步入成熟期後必然會停滯不前。<sup>160</sup>Krugman 的觀點提出後，各界對於東南亞的經濟發展，仍是一片看好。直到一九九七年，Krugman 的預言一一兌現。

自一九九七年二月起，泰銖(Baht)即有日趨疲軟的跡象，至五月八日，美國德州儀器公司宣佈撤離在泰國的資金後，泰銖便呈現一路下滑的走勢。<sup>161</sup>七月一日，泰國總理 Chavalit 還信誓旦旦地表示，泰銖絕對不會貶值。但是當天夜裡，泰國中央銀行官員挑燈夜戰，先是向各國央行示警，然後召開銀行界的重大緊急會議。在會議中，泰國正式宣布：泰銖不再緊盯美元連動採取固定匯率，即日起自由浮動。泰國政府才剛宣布泰銖採取浮動匯率，七月二日當天泰銖應聲倒地，大幅貶值。不過投資人反而大樂，紛紛搶進股市下單。這股熱潮促使當天的股市上漲 7.9%，創造了五年多來的新高。分析師及投資人對於這波泰銖貶值的評估過於樂觀，殊不知在往後的數個月裡，泰銖貶值的餘震撼動整個東亞地區，亞洲金融風暴就此蔓延開來。<sup>162</sup>

泰國在面臨金融風暴的近兩年間，其實就發生了許多警訊：貿易逆差擴大、經常帳赤字增加、外債持續增加等等。不過泰國政府所採取的策略幾乎都是治標的，包含了：提高利率、在外匯市場拋售美元以拉抬泰銖、開放其國內市場以吸引外資來填補貿

---

<sup>160</sup> Paul Krugman,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6, Nov./Dec., 1994, pp. 62-78.

<sup>161</sup> 譚瑾瑜，〈東亞金融風暴之剖析與啟示〉，《東南亞季刊》，第 3 卷，第 1 期，頁 87-101，頁 92。

<sup>162</sup> 林添貴譯，Nicholas D. Kristof(紀思道) and Sheryl WuDunn(伍潔芳)著，《東方驚雷》(Thunder from the East)。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92，頁 80-84, 115。

易及經常帳赤字。等到這些問題累積到一定程度爆發出來時，整個情況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sup>163</sup>此外，還有一個重大的問題，那就是：泰國採行了固定匯率，泰銖隨著美元連動，緊釘 25 泰銖兌換 1 美元。而泰國開啟亞洲金融風暴驚爆點(Flash Point)的主因，是由於一九九六年美元在國際市場上的表現開低走高，促使泰銖在僵硬的匯率機制下，被高估的幅度加大，從而導致其出口更加困難。<sup>164</sup>由於東協國家間的經貿往來密切，泰銖的大幅貶值旋即引發了東協貨幣市場的混亂。繼泰銖之後，菲律賓披索(Peso)也遭受投機客（炒家）的攻擊，貶幅高達 11.36%。至於其他的東協國家，亦無法置身事外。

和泰國的情況比起來，馬來西亞在亞洲金融風暴中所受到的傷害，相對來說應該會小了許多。因為馬來西亞的政治穩定度高，銀行體系也較為健全，經濟尚稱相當穩定。同時馬國的外資流入也以長期資本為主，與泰國短期資金的炒作型態不同；此外，馬來西亞經常面臨經常帳赤字增加的情況，該國政府會採取若干政策來降低赤字，這也與泰國政府坐視赤字增加的做法不同。<sup>165</sup>上述這些利多的金融環境背景，理應有助於馬來西亞抵禦金融風暴的襲擊。但是，馬來西亞政府在亞洲金融風暴的因應，似乎緩不濟急。尤其是馬來西亞總理 Mahathir 的行徑，讓馬國「禍從口出」，也身陷禍不單行的風暴漩渦中。馬元(Ringgit)從七月一日的 2.52 兌換 1 美元，貶值到十二月八日的 3.80 兌換 1 美元，貶幅高達 51%。Mahathir 始終將矛頭指向國際投機客，除了痛斥 George Soros 的不是外，他認為東南亞各國正遭逢新型態之西方帝國主義(New Form of Western Imperialism)的蹂躪。<sup>166</sup>Mahathir 更於同年九月在

---

<sup>163</sup> 金榮勇，〈東南亞金融風暴的起因、影響與展望〉，《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1 期，民 87.01，頁 6。

<sup>164</sup> See Pasuk Phongpaichit and Chris Baker, *Thailand's Boom and Bust*. Bangkok: Silkworm Books, 1998.

<sup>165</sup> 宋鎮照，《東協國家之政經發展》。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 85，頁 161-198, 225-252；李明譯，《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頁 183；金榮勇，〈東南亞金融風暴的起因、影響與展望〉，頁 6。

<sup>166</sup> Robert Gilpin,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op. cit., p. 146.



香港舉行的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銀行的聯合年會當中，嚴厲指責國際投機客不事生產、也不道德。<sup>167</sup>

很多人把 Mahathir 的指控當成笑柄，不過在這件事背後其實還有值得注意的問題：隨著國際化的日益加深，對於國內政權自主性以及政府政策選擇性，也產生了連帶的影響。<sup>168</sup>換句話說，國內政策產出與國際上的趨勢發展，是相互且緊密的關係。隨著 Mahathir 的咆哮聲，東南亞各國的經濟局勢如同骨牌效應般，一個接著一個應聲倒下。原先該區域各國股匯市的表現被視為是短期現象、短暫的困境，但是在一連串的危機出現後，全世界才真正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東協成員中的大國印尼也無法在這一次金融風暴中全身而退，而且其面臨的困境與上述國家相比，似乎有過之而不及。當國際外匯投機客看上印尼盾(Rupiah)時，印尼遂逐步放寬外匯市場買賣的幅度，並讓貨幣適度貶值。但是受到泰銖的影響，印尼盾對美金的比價一路狂瀉下跌 80%。<sup>169</sup>

一九九七年十月，東方明珠—香港為了捍衛港幣提高利率，造成股市大跌，恆生指數在四天內下跌 25%。香港重感冒也引發美國打噴嚏，十月二十七日道瓊工業指數大跌 554 點，同時也創下有史以來最大的下跌。再將焦點北移，東亞經濟大國韓國，也難逃金融風暴的摧殘，其問題的嚴重性更甚於東協諸國，韓國整個國家經濟瀕臨破產。十一月一日韓國央行信誓旦旦地表示韓圓與美元比價不會跌過 1000 比 1 的關卡，但是形勢比人強，十一月十七日韓國棄守匯市。<sup>170</sup>

韓國陷入嚴重的經濟困境，對於鄰國日本來說無疑地是雪上

---

<sup>167</sup> Callum Henderson, op. cit., p. 5.

<sup>168</sup> 秦宗春，〈國際化與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政治面初探〉，《東南亞季刊》，第 3 卷，第 1 期，民 87.01，頁 80。

<sup>169</sup> Robert Gilpin,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op. cit., p. 146.

<sup>170</sup> Ibid., pp. 147-148.

加霜。日本經過九〇年代初多年的泡沫經濟後，仍未走出陰影。此次金融危機日本雖未受到正面衝擊，但是由於其經濟結構緊密地和東亞各國結合，所以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日本同時有感於長久以來的經濟病疴，從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起，針對壞帳過高的金融機構採取自生自滅的態度，導致第十大金融機構北海道拓殖銀行(Hokkaido Takushoku Bank)、第四大證券商山一證券(Yamaichi Securities)的垮台。<sup>171</sup>另一方面，從一九八〇年代以來改革開放的中國，在其銳意發展經濟的政策下，經濟成長的成就有目共睹。在面對亞洲金融風暴時，是否該讓人民幣貶值成為中國棘手的問題。此外，面對剛回歸「祖國」懷抱的香港局勢，中國的決策就是必須挺住人民幣，除了減少香港在金融風暴中的衝擊外，對於穩定亞洲區域經濟穩定，也有一定的指標作用。最後，附帶一提的是，台灣和新加坡在亞洲金融風暴中的衝擊較其他國家來得小，雖然受到波及，不過在政府放棄外匯市場干預、回歸市場運作後，經濟發展也慢慢復原。

---

<sup>171</sup> 洪淑芬，〈亞洲金融風暴的省思及對我國的影響〉，《問題與研究》，第37卷，第6期，民87.06，頁18-20。

表 3-1：亞洲金融風暴時間點紀錄表

---

1997.07.	泰國在國際投機客的運作壓力下，宣布泰銖不再緊盯美元連動採取固定匯率，即日起自由浮動。這個政策提出後，也代表泰國的經濟面臨嚴峻挑戰，同時也觸發了金融風暴。此一餘震撼動整個東亞地區，亞洲金融風暴就此蔓延開來。馬來西亞總理 Mahathir 怒斥、指責投機客的行徑近似無賴(Rogue Speculators)。
1997.08.	國際貨幣基金同意對泰國借貸一百七十億美元。
1997.10.	香港恆生指數在四天內下跌 25%，之後又下跌 5.4%，同時促使美國和其他國家股市大跌。國際貨幣基金同意針對印尼提供 420 億美元的援助計畫。馬國總理 Mahathir 以「低能」(Moron)來稱呼 George Soros。
1997.11.	韓國受到波及、日本山一證券垮台，亞洲金融危機也使日本經濟問題浮上檯面。美國總統 Clinton 認為此危機是：邁向自由市場機制道路上的一些小障礙(A Few Glitches in the Road)。
1997.12.	國際貨幣基金同意針對南韓提供 580 億美元的貸款，來挽救該國持續惡化的經濟。這同時也是國際貨幣基金有史以來，金額最龐大的援助計畫。
1998.01.	國際貨幣基金與印尼簽訂經濟改革協議，挽救該國每況愈下的危機。
1998.04.	日本經濟持續身陷困境。於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在亞洲的表現，備受美國國會抨擊。
1998.05.	印尼的政治危機因為學生的加入而更加混亂，經濟也沒有好轉。整個政治危機，造成總統 Suharto 下台。

---

資料來源：Robert Gilpin,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43.

(本表略去亞洲以外國家，如：巴西和俄羅斯的說明)

## 貳、亞洲金融風暴起因及相關因應措施

### 一、亞洲金融風暴的起因

針對亞洲金融風暴的起因，國內外學者專家分別探討了諸多的因素和面向。Robert Gilpin 認為主要有三種解釋亞洲金融風暴的說法：一、典型的金融危機；二、「親信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

的缺陷；<sup>172</sup>三、「華爾街—財政部複合體」(Wall Street-Treasury Complex)下的犧牲者；<sup>173</sup>Paul Bowles 則引用 Miller 及 Zhang 的看法，認為主要是因為「親信資本主義」及「金融恐慌」(Financial Panic)所造成的；<sup>174</sup>譚瑾瑜認為主要可以從三方面來觀察：一、整體經濟結構失衡；二、金融體系不健全；三、政策失當；<sup>175</sup>洪淑芬認為：一、經濟基本面脆弱；二、經常帳（出口扣除進口）長期呈現逆差；三、利用外資（外債）政策失當，對外資（外債）的進入缺乏有效引導與監督；四、長期釘住美元的匯率機制存有缺陷；<sup>176</sup>另外，中國學者彭澎則認為：一、金融體制的健全；二、經濟基礎狀況不佳；三、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影響；四、國際投機客的惡性炒作。<sup>177</sup>另一方面，國內也有相關碩士論文，探討了亞洲金融風暴相關的成因。<sup>178</sup>

本文將以「國際經濟發展失衡」、「國內金融體系不健全」，以及「親信資本主義」（東亞經濟發展模式）三個部分，探討東協相關國家發生金融風暴的原因。在「國際經濟發展失衡」方面，雖然全球金融市場在美國的帶領下，長期處於興盛的榮景。但是無可諱言的是，美國的政策也種下了亞洲金融風暴一骨子裡的脆弱性。<sup>179</sup>美國 Clinton 政府時期的財政部長 Robert E. Rubin 及其副手

---

<sup>172</sup> 關於“crony capitalism”的譯法不一而足：李明譯為「特權式資本主義」—李明譯，《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頁 189；林添貴譯為「壟斷資本主義」—林添貴譯，《東方驚雷》，頁 176；蔡繼光譯為「朋黨資本主義」—蔡繼光譯，Michael Mandelbaum 著，《征服世界的理念》(The Ideas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台北：雅言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 93，頁 385。

<sup>173</sup> Robert Gilpin,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op. cit., pp. 150-155.

<sup>174</sup> Paul Bowles, “Reg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after (?)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es,” in Shaun Breslin, Christopher W. Hughes, Nicola Phillips and Ben Rosamond, eds., *New Regionalism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88-90.

<sup>175</sup> 同註 161，頁 94-97。

<sup>176</sup> 同註 171，頁 20-22。

<sup>177</sup> 彭澎，《國際政治經濟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民 90，頁 335-338。

<sup>178</sup> 關於亞洲金融風暴成因之探討，國內相關碩士論文頗多，以下謹列出部分以供參考：林承正，〈論國際化對經濟調適政策的影響：以亞洲金融風暴中的東協五國為例〉，碩士論文，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民 89.06.29，頁 29-31；林碧美，〈東亞金融危機之政治經濟分析〉，碩士論文，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民 89.07，頁 183-214；陳建昌，〈國際資金流動對東亞國家的影響—以東亞金融風暴為例〉，碩士論文，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民 90.06，頁 61-65；潘永仁，〈東協與中華經濟圈競爭或互補關係〉，碩士論文，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民 90.06，頁 56-57。

<sup>179</sup> 同註 162，頁 71。

Lawrence H. Summers，都大力推動自由市場。問題就出在於不加限制的資本移出和移入，對於經濟「體質」較差的國家來說，經濟全球化、金融自由化，若沒有針對自由進出的國際資金進行調控，往往就是金融危機發生的溫床。東協國家致力推動金融自由化以籌措發展資金，歐美國家及日本則將大量資金投入該區。日本等先進國家由於經濟成長趨緩，銀行家大舉進軍東南亞，爭取放款機會。國際金融體系尚未建立控管機制，且東協各國又沒有針對開放市場後的配套措施，最後形成惡性循環，釀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用社會科學的術語來說，亞洲金融風暴是行為逾越(Overdetermined)所導致的。<sup>180</sup>另一方面，由於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的推波助瀾，再加上美國強大的金融利益集團在背後支持，使得東協各國成為「華爾街—財政部複合體」下的犧牲者。<sup>181</sup>

在「國內金融體系不健全」這個部分，承前一部分所述，東協各國國內雖然經常帳出現赤字，由於外資及時填補，所以在該等國家的國際收支帳部份仍呈現順差的狀況。如同東協諸國，開發中國家的政治精英，在容易獲得融資的時候，往往不會居安思危，因而延宕了一些必要的政策改革措施。<sup>182</sup>此外，外資投資股市的比例偏高，以及在外資主要投注於股市和房地產的情況下，對本國的經濟發展實無助益，反而會造成泡沫經濟的發生。<sup>183</sup>另一方面，東協諸國大都採取緊盯美元的一籃通貨(A Basket of Currencies)匯率制度，這項措施同時也是該等國家吸引外資穩定加碼、使這些國家經濟持續高速成長的原因。但是，過於僵化的匯率制度，無法發揮國際收支自動調節的機能，平衡進出口貿易。從一九九五年起，美元對日圓及馬克等主要貨幣持續升值，而東協各國並未及時調整匯率走勢，以致於這些國家的貨幣跟隨美元

---

<sup>180</sup> 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67.

<sup>181</sup> Robert Gilpin,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op. cit., p. 153.

<sup>182</sup> Miles Kahler,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Debt: Explaining the Crisis," in Miles Kahler, e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Deb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2.

<sup>183</sup> 同註 161，頁 95。

升值，造成貨幣幣值被高估的情形。<sup>184</sup>這些缺乏彈性的政策走向，再加上東協國家產業結構偏向勞力密集和低技術工業，出口產品又因僵化的匯率而缺乏競爭力，在種種內在因素的情況下，外來的壓力使得金融風暴一觸即發。

另外，按照西方所謂的「親信資本主義」來說明，東亞這類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東協諸國在其發展歷程中，始終潛藏著自我毀滅的種子(the Seeds of Its Own Destruction)。被西方嘖嘖稱奇的東亞經濟發展模式，促成東協諸國在經濟發展及工業化上，有著驚人的成就。不過，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卻又成為眾矢之的。國際貨幣基金及美國財政部都將金融風暴的罪魁禍首，轉嫁到「親信資本主義」上。「親信資本主義」主要有以下幾個缺點：(一)當地的政客、銀行，以及工業之間，形成十分緊密的關係網絡；(二)經濟發展的財源主要是仰賴銀行的支持，而非依靠股市的融資；(三)政府支持的企業和銀行間的往來是不透明的(Nontransparent)。在這種由政府控制的政經網絡下，鼓勵了投資者對於某些特定經濟部門過度的投資。這是因為政府與該等企業間不透明的連動關係，間接鼓舞了投資人資金加碼上的信心，投資者認為政府與企業間的緊密關係，等於暗示並保證他們的投資不會有風險。<sup>185</sup>這樣的發展趨勢，就會進一步造成導致金融危機的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問題。<sup>186</sup>

## 二、國際貨幣基金(IMF)的因應措施與受援國的觀感

---

<sup>184</sup> 同註 171，頁 22。

<sup>185</sup> 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p. cit., p. 330.

<sup>186</sup> 道德風險指的是：投資人在進行經濟風險行為時相信，一旦出差錯，有人會來營救；換句話說，某些特定的金融保障機制會鼓勵投資人行動、增加投資，而這些行動的結果很可能帶來損人利己的情形。美國在一九九四年介入墨西哥的金融危機後，投資人對於東南亞等新興市場的信心大為加強。美國政府拯救墨西哥成功了，卻製造出道德風險，鼓勵投資人在亞洲得以進行更龐大規模、更具風險的投資。See Robert Gilpin,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op. cit., p. 361. 中文部分請參見：林添貴譯，《東方驚雷》，頁 69-70；林碧美，〈東亞金融危機之政治經濟分析〉，頁 196。

國際貨幣基金(IMF)成立於一九四四年，是二次戰後美歐國家為因應國際金融秩序，避免重蹈二次大戰前覆轍的重要貨幣調節機制。國際貨幣基金做為布萊頓森林體系的一環，也可以說是美國成為世界霸權的重要基石。國際貨幣基金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主要在於其「制約條件」(Conditionality)。換言之，就是用基金的要求項目和談判條件，作為債務重新融資或重新訂定償債時間的依據。國際貨幣基金同時也將債務國的調整計畫，作為其他雙邊支柱的條件。在實際的做法上，國際貨幣基金要求尋求資金融通的開發中國家，調整其總體經濟政策，甚且派遣專家前往該等國家檢視政策執行的成效。所以，當一國尋求國際貨幣基金援助時，必會受到國際貨幣基金的制約，國家自主權當然也就相對減弱了。<sup>187</sup>

國際貨幣基金在此次亞洲金融風暴中，不同以往消極的因應，而是扮演較為積極的角色。除了要求東南亞受援國家經濟政策上改變外，更要求她們做「結構性調整」(Structural Adjustment)，改善其經濟體質。由於經濟結構等問題已非短期暫時性方案，而是長期的改革計畫，可見國際貨幣基金的角色已從消極轉趨積極。<sup>188</sup> 印尼及泰國在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方案時，國際貨幣基金要求這兩個國家必須關閉信用不良的金融機構，不過當印尼遵從此一建議關閉十六家銀行後，徹底動搖印尼人對於本國貨幣的信心，同時還引發資金大量外移。一時之間印尼國內金融秩序大亂，印尼盾大幅貶值導致崩盤，政經情勢雪上加霜。國際貨幣基金的誤判之所以陷入困境，甚至還引發東南亞國家政治社會上的動盪，其主要原因有二：一、對於面臨不景氣威脅的東亞國家來說，問題的癥結不在於超額需求，而是「需求不足」。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的做法卻是縮減需求，反而使情況更加惡化；二、在企

---

<sup>187</sup> 同註 168，頁 85。

<sup>188</sup> 秦宗春、譚瑾瑜，〈國際機制與東南亞金融危機救援方案：新自由主義之挑戰〉，《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第 8 期，民 88.08，頁 54。

業高度舉債的情況下，就算只是短期內提高利率，都可能形同對許多廠商宣判死刑。這對於整體經濟來說亦是如此，但是國際貨幣基金卻背道而馳。國際貨幣基金在事後坦承了多項錯誤，包含了：財政政策、印尼銀行重整、貿然推動資本市場自由化，以及低估區域內鄰近國家經濟相互影響的程度。不過國際貨幣基金始終不承認其在貨幣政策上的缺失，Joseph E. Stiglitz 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的計畫所以會如此失敗，其實與其傲慢的心態脫離不了關係。<sup>189</sup>

國際貨幣基金以往在援助經濟發生危機的國家時，所採取的短線做法一直備受爭議。在一九九七、九八年間的亞洲金融風暴時，更為東亞各國所詬病，認為國際貨幣基金援助的出發點僅是在確保借貸能夠收回，完全不顧受援國經濟受創的程度。通常國際貨幣基金的紓困貸款，都附帶極為嚴苛的條件，這包含了受援助的國家必須實施緊縮性貨幣及財政政策，同時要求提高利率、降低國內支出，使得受援國家的財經政策缺乏彈性。所以許多國家非到情況嚴重惡化，不願輕易向國際貨幣基金提出借貸要求。<sup>190</sup>多數民族主義意識較強的國家領導人，例如馬來西亞前總理 Mahathir，更認為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無疑是喪失國家經濟主權。他們甚至認為國際貨幣基金是美國霸權主義的工具和延伸，同時認為國際貨幣基金考慮先進工業國家的利益，踐踏發展中國家的策略目標。在此民族主義的觀點下，國際貨幣基金成了美國的幫兇，其政策是要迫使該等國家開放市場、撤除保護政策，要求受援國家加入全球化下的自由貿易體系，等到該等國家受到國際投機客的襲擊不支倒地後，國際貨幣基金再送上嚴苛的「菜單」迫使該等國家買單。受援國如此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尤其視國際貨幣基金為國家經濟主權的終結者。<sup>191</sup>

---

<sup>189</sup> 同註 159，頁 158, 191。

<sup>190</sup> “The IMF and Asia,” *Economist*, Nov. 22, 1997, pp. 16-17.

<sup>191</sup> “No Thanks, IMF,” *Economist*, Nov. 1, 1997, pp. 31-32.



另一方面，國際貨幣基金針對受援國家並非是在事前對可能出狀況的國家提出建言，讓在風暴中的國家能夠預先防範，並減輕事態擴大的疑慮。相反地，國際貨幣基金都是在危機發生之後，才「出招」提出要求及配套措施。所以，在這一次亞洲金融風暴後，日本及東協等相關國家才有倡議金融預警機制的建議。<sup>192</sup>其實，國際貨幣基金有條件的借貸，主要是針對暫時性的需求，所以比較適合對財政貨幣政策做出修正的國家。<sup>193</sup>換言之，將這種借貸方式運用於亞洲金融風暴的國家時，由於該等國家都是經濟基本面急須長期調整的國家，結果當然事與願違。如上所述，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 Martin Feldstein 更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以及附加的干預措施是促使亞洲金融風暴急速惡化的重要原因。<sup>194</sup>

### 三、亞太經合會(APEC)及東協的作為

#### (一)「無為而治」：亞太經合會的作為

處於亞洲金融風暴的國家，大多屬於亞太經合會(APEC)的成員，而且美國是在亞太經合會的龍頭地位。亞太經合會若針對此次金融風暴做出回應，採行若干預警措施，提供成員事先防範機制，將有助於美國在此間全球化及貿易自由化的推動，甚者對於美國所主導之亞太主義均有增加影響力的效果。不過，在亞洲金融風暴後首次召開的亞太經合會，針對金融危機的相關作為及反應，卻出奇的冷淡。一九九七年底亞太經合會於溫哥華，召開第九屆部長會議以及高峰會議。該次會議的決議，美國對於亞太經

---

<sup>192</sup> 關於詳細的配套措施，請參見：本章第三節、第「貳」部分：東協加三：一紙不完整的「協議」，該部分有金融預警機制的說明。

<sup>193</sup> Charles Lipson, "International Debt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Miles Kahler, e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Deb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33.

<sup>194</sup> Martin Feldstein, "Refocusing the IMF," *Foreign Affairs*, Vol. 77, No. 2, Mar./Apr., 1998, pp. 20-33.

合會是否應積極介入此次金融風暴，始終持保留的態度。同時也認為亞太經合會的定位應該限定在會員間的對話與凝聚共識之場所，無須成為取代現有國際組織的正式經濟論壇。美國同時不願意支持在亞太經合會的架構下，設立新的金融援助及應變機制。<sup>195</sup>由於美國對於此次金融風暴的態度，使得該組織成員會轉而向其他組織尋求支援，抑或是另起爐灶。此外，美國在亞太經合會所致力推動的全球資金、貿易自由化，以及經濟成長的目標，其正當性及必要性也會受到相關國家的質疑。<sup>196</sup>長遠來看，美國及其主導的亞太主義，對於東亞區域的影響力有可能降底，同時也損及亞太經合會在此間的重要性。

## （二）「信心喊話」與「紙上談兵」：東協的作為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六日，第二十九屆東協經濟部長會議於馬來西亞召開，在其聯合聲明中指出東協將繼續推動既有之各項自由化與合作項目，亦強調東協有信心能克服此次金融危機，同時將積極改進內部弊端、強化金融體質，並推出「東協投資區」(ASEAN Investment Area, AIA)來增進東協競爭力、吸引外資，以化解金融危機資金外流的窘境。<sup>197</sup>無奈亞洲金融風暴持續擴大，使得東協國家不得不積極向國際社會求援。同年十二月一日，東協財政部長舉行特別會議，商討當時尚未減緩的金融危機。會中除痛批短期、投機性基金流入所造成對經濟發展的不穩定外，亦認為應促使金融市場透明化，同時仿效 G7 成立同儕監督(Peer Surveillance)的區域監督機制，加強區域經濟技術合作、採取相關

---

<sup>195</sup> Se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Ninth Ministerial Meeting Joint Statement, [http://www.apec.org/apec/documents\\_reports/annual\\_ministerial\\_meetings/past\\_meetings.html](http://www.apec.org/apec/documents_reports/annual_ministerial_meetings/past_meetings.html), Nov. 21-21, 1997. And APEC Economic Leaders Declaration: Connecting the APEC Community, [http://www.apecsec.org.sg/apec/leaders\\_declarations/1997.html](http://www.apecsec.org.sg/apec/leaders_declarations/1997.html), Nov. 25, 1997.

<sup>196</sup> Stephen S. Rosenfeld, "Free Trade Can't Be the Cure for Everything,"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 22, 1997, p. 8.

<sup>197</sup> Joint Press Statement of the 29<sup>th</sup> ASEAN Economic Ministers Meeting, <http://www.aseansec.org/1887.htm>, Oct. 16, 1997.

措施來配合國際貨幣基金的對策。<sup>198</sup>

東協除了對內部的信心喊話之外，也急欲尋求「外力」來協助解決金融風暴的善後工作。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東協於吉隆坡舉行第二屆非正式高峰會議，同時為慶祝成立三十週年、促進區域和諧與良性互動，於非正式高峰會議後主動邀集中國、日本、南韓加入會談。該次會議圍繞的主題仍是以金融議題為核心，共同尋求解決及因應之道。在會中，中國、日本以及南韓承諾支援東協，但與東協的期待形成極大的落差：南韓僅承諾針對教育及技術方面提供支援，以道義上表示支持；日本則是宣布在「未來」五、六年之內，將成立一個總值 180 億美元的信貸基金，用來提供參與東協基礎建設的日商，以利重整東協的經貿發展。同時，日本也提供兩萬名東協人民赴日受訓的機會，發展人力資源；相形之下，中國在會議中的表現似乎較有誠意。中國保證人民幣絕不貶值的政策，避免為東協國家帶來更大的金融動盪。此外，中國亦願意提供 40 至 60 億美元，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計畫。<sup>199</sup>由於該次會議並未如東協原先預期借「外力」來解決內部問題，而且並無相關的因應措施，僅止於會議桌上的冠冕堂皇，形式大於實質、無益東協國家的善後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東協在此次高峰會議後，發表了原本為慶祝三十歲生日的「二〇二〇東協願景」(ASEAN Vision 2020)宣言。這其實應該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宏觀計畫，不過東協諸國受到亞洲金融風暴之苦，缺乏信心面對此歷史性的一刻。該宣言強調：東協在未來仍將秉持其和平、自由、非核區的發展方向，用和平方式解決領土爭議；運用東協區域論壇持續推動信心建立、預防外交及衝突解決機制；以東協之集體力量，推動亞太區域和平與現

---

<sup>198</sup> 陳欣之，《東南亞安全》。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 88，頁 234。

<sup>199</sup> 宋鎮照，〈東方與西方價值保衛戰—吉隆坡東協高峰會之政治經濟意涵〉，《海峽評論》，第 85 期，民 87.01，頁 21-22。

代化的進展。同時，展望東協未來之目標：發展夥伴關係、增進區域內經貿合作、促進東協內部經濟整合，以及提高國際競爭力等計畫。<sup>200</sup>

東協運作機制在一九九七、九八年的風暴當中，形成空轉的局面，沒有針對身陷風暴中的國家進行及時的援助和補救：首先，受制於金融風暴中的東協國家，被迫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的建議；其次，東協之相關組織流於形式，除了召開一系列會議、發表聲明之外，實際作為少之又少，也令人懷疑其有能力化解其內部發展差異、完成其區域貿易與金融的合作目標。綜觀東協諸國在亞洲金融風暴時期，僅由各國自行謀求解決之道，在這期間東協相關組織之運作似乎只有「信心喊話」的辭語以及「紙上談兵」的文件。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力挺人民幣不貶值的策略，讓亞洲金融風暴不再擴大各國的傷勢，使東協諸國對於與中國間進一步的合作，打開了試探之門。

### 參、亞洲金融風暴對東協區域整合的影響

東協各國在九〇年代一帆風順的經濟成長，伴隨而來的是區域內整合呈現停滯的局面。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間的亞洲金融風暴席捲了東南亞諸國，不但帶走了各國戮力積累的財富，也帶走了高估的經濟榮景。此外，東協運作機制在金融風暴中「當機」，並沒有針對身陷風暴中的國家進行及時的援助和補救措施。為了因應「東協方式」(ASEAN Way)在亞洲金融風暴時的缺憾，東協將其調整為經過修正的東協方式，<sup>201</sup>欲在東協基本架構下運作，利用東協內部凝聚力和整合運動的推動，以迎接東協未來更嚴峻的挑戰。另一方面，東協在經濟合作上開始轉變，其作風不再那

---

<sup>200</sup> ASEAN Vision 2020, <http://www.aseansec.org/5228.htm>, Dec. 15, 1997.

<sup>201</sup> Jurgen Ruland, "ASEAN and the Asian Crisis: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Consequences for Southeast Asia Regionalism," *Pacific Review*, Vol. 13, No. 3, 2000, pp. 429-430.

麼保守，改採「先同意、再談判」(Agree First, Talk After)的積極原則。<sup>202</sup>對內積極進行區域內的整合，對外則與中國、日本等國家進行多項經濟合作，進一步推動貿易自由化，促進區域內的貿易交流，同時也急欲提升東協在全球政經體系中的角色與定位。

亞洲金融風暴，也使中國改變原先對區域主義的觀點。自從中國改革開放到亞洲金融風暴的二十年間，中國始終站在主權國家的角度發展自身及對外雙邊經貿關係。中國對於區域經貿整合，基本上興趣不大，而且是持反對的立場。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在經濟發展初期的工業產品，無論是品質和價格上的競爭力都無法與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相比。中國在此一時期是以吸收外資、逐漸建立起具國際競爭力的經濟體系，對內則是國有企業的改革，並無多餘的能耐參與區域整合計畫。不過，亞洲金融風暴非但席捲了區域大多數國家，其影響之廣度和嚴重程度超乎想像，也給予東亞諸國領袖重新思考未來經濟發展的機會。儘管全球化的趨勢已是東亞國家追求經濟成長所不可迴避的國際環境，如果不能有效降低金融風暴的風險，該等國家極可能採取放緩金融及經濟自由化的腳步作為因應；此外，尋求「區域聯防」，藉由建立一個自由貿易區或共同市場，抑或在貨幣及匯兌上建立合作機制，都是值得東亞國家考慮的努力方向。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在一九五〇年到七〇年代痛苦發展的經驗，也讓中國了解到如果要維持每年7%以上的經濟成長率，不能僅靠自身達成。如果說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中國則應以更積極的態度面對此一國際環境。中國必須持續地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即便這可能面臨諸多外界的經貿影響及更大的經濟波動。<sup>203</sup>

中國及東協各國在這些觀念上的轉變，有助於彼此間建立良

---

<sup>202</sup> John Ravenhil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Changing Incentives," *Asian Survey*, Vol. 35, No. 9, 1995, pp. 850-866.

<sup>203</sup> 金榮勇，〈亞洲金融風暴與東亞經濟安全體系之建立〉，《問題與研究》，第39卷，第1期，民89.01，頁2, 8-9。

好的互動機制，尤其是在亞洲金融風暴後，雙方意識到在經濟互賴下，一國經濟危機的發生有可能「外溢」到區域或是全球，造成國際性的大災難。所以，必須透過與他國間的經濟合作來獲得具體保障。二〇〇一年，雙方的合作契機似乎成熟了。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於該年十一月六日在汶萊出席第五次東協加三非正式高峰會中，中國與東協彼此同意在十年內成立全球最大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China-ASEAN FTA)，雙方未來主要將在五個領域內進行合作，包括農業、信息通訊、人力資源開發、相互投資及湄公河開發等。這個自由貿易區成立之後，將涵蓋中國和東南亞地區十七億的人口，GDP 達 2 兆美元，總貿易額 1 兆 2300 億美元，估計自由化後，將增加 50%，其影響之大可見一般。東協秘書長 Rodolfo C. Severino 認為該自由貿易區形成後，將為東協出口到中國的總值增加 48%，中國出口至東協各國的總值增加 55%；同時，將使東協的 GDP 增加 0.9%，中國則增加 0.3%。<sup>204</sup>

延續著東亞區域主義的交會與變遷，新的東亞區域主義，嘗試建立起「亞洲認同」(Asian Identity)。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大陸的東亞主義與東協主義，在經濟議題上逐漸「匯流」。東亞國家在面臨此一風暴後，除了更強化其「亞洲認同」及「亞洲價值」外，亞洲金融風暴也促使東亞國家真正願意合作的契機與轉捩點。同時，也由於亞太經合會在金融風暴中沒有任何作為，除了使亞太經合會喪失在東亞區域整合上重要的角色扮演，也使得美國主導的亞太主義「聲譽下墜」。<sup>205</sup>所以，這一波東亞區域主義的變遷，除了強化及注入「亞洲認同」與「亞洲價值」的新元素外，區域經濟整合的列車也將在不久後粉墨登場。

---

<sup>204</sup> 張惠玲，〈中共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之戰略考量評析〉，《共黨問題研究》，第 28 卷，第 7 期，民 91.07，頁 5。

<sup>205</sup> See Tun-jen Cheng, op. cit., pp. 21-32.

### 第三節 東協加一

#### 一 東亞區域整合之醞釀與雛型

一九五〇年代，東南亞國家在政治上採行「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之策略，左右游移於冷戰時期的美蘇兩強間。另一方面，在經濟上的表現東南亞國家也逐漸從原先保守的進口替代工業，慢慢轉型到出口導向策略的經貿走向。學者估計到公元二〇〇〇年後的未來，渠等國家可以進入新興工業化國家(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NIEs)的行列。不過，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間的亞洲金融風暴打亂了學者的預測以及該等國家的願望。亞洲金融風暴後使得東南亞國家除了整頓財政和金融外，也開始朝區域整合的目標邁進。此外，在風暴中屹立不搖的人民幣，也使得東南亞國家有更強的意願與中國合作，重新拓展經濟及貿易往來。<sup>206</sup>

#### 壹、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的發展

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的倡議，源自於一九九二年一月在新加坡召開的第四屆東協高峰會議。不過，東協國家對於工業合作的意願及構想，則是於一九七六年二月第一屆東協高峰會議時萌芽。除此之外，為強化東協區域內的經濟活力與發展，東協諸國同意藉由投資、貿易及生產機會等合作方式，賦予成員國彼此間享有更多的貿易優惠和較低的關稅，同時希望透過區域內貿易的推展，進一步保障東協國家的利益。所以，東協區域經濟整合的初步行動，在一九七七年二月簽署「東協優惠貿易協定」(ASEAN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ASEAN-PTA)後開始起跑。雖然該項

---

<sup>206</sup> 同註 3。

協議大多適用於基本的商品與東協工業協定的產品，且各國差異大、加上減讓幅度小、效果不大，不過這終究開啟了東協諸國間貿易協商的大門。這項協議在一九八〇及一九八二年進行了修正，到一九八四年五月時，取得優惠關稅之產品已經高達 18000 種。在如此亮麗的成績單背後，其實還隱藏了每個國家條列的一長串排除名單。例如在一九八二年所列舉的 9000 項優惠產品清單中，僅佔一九八一年東協內部總貿易額的 2%，<sup>207</sup> 由此可發現優惠貿易協定施行成效未盡理想。換言之在此一階段，東協諸國間的整合效果只是雷聲大雨點小。

由於東協國家的產業結構類似，所以每個會員國所生產或預估要生產的產品都十分相似，因此國與國之間的互補性極為有限。加上當時各國主要採取進口替代的工業政策，主要以開發國內市場為優先選項，所以各國間相互貿易的機會不大。優惠貿易協定原本就是以最惠國待遇為基礎，不過東協各國對於國內產業的保護程度頗高，在不願意大幅降低關稅的情況下，導致優惠貿易協定成效不彰。

在工業合作方面，東協諸國也簽訂若干協議及計畫，希冀促進各國間的分工，以獲得貿易擴張的利益。主要的協議及計畫，依序如下：一、東協工業計畫(ASEAN Industrial Projects, AIP)：在一九七六年第一屆東協高峰會議後，各國開始研議進行若干工業合作計畫。利用東協（當時成員有五國）每一國所分配到的「第一線」工業計畫進行合作，同時也分配若干「第二線」的工業計畫。在東協工業計畫(AIP)的架構下，該計畫將獲得跨東協區域的優惠銷售待遇，也就是各國都保有保證購買的額度。不過，由於東協各國理念的不同，該計畫仍舊窒礙難行；<sup>208</sup> 二、東協工業互

---

<sup>207</sup> M. K. Chng, "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Current Status," in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ed., *Southeast Asia Affair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5, p. 33.

<sup>208</sup> Basic Agreement on ASEAN Industrial Projects, <http://www.aseansec.org/6373.htm>, Mar. 6, 1980.



補計畫(ASEAN Industrial Complementation, AIC):該計畫始於一九八一年,主要是基於資源集中與市場分享的原則。東協工業互補計畫的第一項試驗,就是「東協汽車」(ASEAN Car)的發展計畫。東協汽車的發展計畫主要就是將汽車的不同生產階段作「垂直」分割,由區域各國來分攤部分流程,以達經濟規模的效果。此計畫立意良善,對於東協整體經濟及競爭力都有所幫助,但是在各個國家仍與外國汽車公司有合作的情況下,該計畫效果甚差。<sup>209</sup>值得稱許的是,鑑於東協工業互補計畫(AIC)的缺失,東協諸國改以「品牌互補計畫」(Brand-to-Brand Complementation, BBC)來因應。這項計畫得到跨國公司的青睞,因為此舉有助於降低生產成本,而各國生產的零組件可以進行相互轉換。<sup>210</sup>這項計畫最後在東協老大哥印尼不願加入的情況下,經濟規模的效益大為降低;三、東協工業合資計畫(ASEAN Industrial Joint Venture, AIJV):該項計畫始於一九八三年,主要在鼓勵區域內民間投資者的投資合作。東協工業合資計畫(AIJV)最大的獎勵措施為關稅減讓,東協會員國通常只對該計畫下的產品,課徵一般關稅的 1/10。<sup>211</sup>但是該計畫實施成效依然有限,主要是因為申請程序繁瑣,加上推廣不力,造成東協的工業合作上,再抹上一筆缺憾。上述相關計畫的試驗效果不盡理想,東協各國尚未敞開追求各自國家利益的心胸。東協在經過六、七〇年代的嘗試之後,在邁入九〇年代時,開始有了成立自由貿易區的構想及概念。

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構想是由泰國提出,在一九九二年一月於新加坡召開的第四屆東協高峰會議中形成共識。在初步的規劃中期望在十五年內,也就是於二〇〇八年成立東協自由貿易區。在

---

<sup>209</sup> Basic Agreement on ASEAN Industrial Complementation, <http://www.aseansec.org/6377.htm>, June 18, 1981.

<sup>210</sup>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rand-to-Brand Complementation o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under the Basic Agreement on ASEAN Industrial Complementation (BAAIC), <http://www.aseansec.org/6382.htm>, October 18, 1980.

<sup>211</sup> Basic Agreement on ASEAN Industrial Joint Ventures, <http://www.aseansec.org/6378.htm>, Nov. 7, 1983.

這個規劃及遠景下，針對現存關稅的問題，主要是透過「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CEPT)的安排，將所有區域內貿易的工業製成品之關稅，降低至5%或是0。四年之後（一九九六年），東協諸國簽署了「東協跨國工業合作計畫」(ASEAN Industrial Co-operation, AICO)，該計畫主要是針對東協自由貿易區下之「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所做的配套措施，旨在促進技術密集產業的投資。由於「東協跨國工業合作計畫」(AICO)的出現，取代及終止原先的「品牌互補計畫」(BBC)與「工業合資計畫」(AIJV)。<sup>212</sup>「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及「跨國工業合作計畫」，後來成為東協邁向自由貿易區的兩大支柱。

「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於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開始實施，規定在十五年內區域內各國的產品必須降至5%以下至0。這個計畫之後提前到二〇〇三年，以及二〇〇二年來達成目標。此外，針對後來加入的會員，也給予六到十年的延後加入期限。換言之，原先東協六個創始會員國應於二〇一〇年達成貿易自由化時程，而越南、緬甸、寮國及柬埔寨等四個新加入的會員國，應於二〇一五年達成貿易自由化的目標，同時也設定二〇〇二年將區域內的合作，擴大建立成自由貿易區。

另一方面，東協自由貿易區的計畫，為了因應國際情勢及經濟發展的變化，做了三次的調整：一、一九九四年九月召開的第二十六屆東協經濟部長會議中，決定加快東協自由貿易區的進程，將原先一九九二年規定的十五年期限縮短為十年，即在二〇〇三年成立東協自由貿易區；二、一九九七、九八年間的亞洲金融風暴，使整個東亞地區經濟成長急遽下降，東協諸國也遭受了極大的打擊。對此，在一九九八年於河內召開第六屆東協高峰會議，會後發表「河內宣言」(Declaration of Hanoi)及「河內行動計

---

<sup>212</sup> Basic Agreement on the ASEAN Industrial Cooperation Scheme, <http://www.aseansec.org/6385.htm>, Apr. 27, 1996.

畫」(Hanoi Plan of Action)，決定將自由貿易區的時程再提前一年，也就是東協六個創始會員國於二〇〇二年形成自由貿易區，新會員中則是越南於二〇〇三年、寮國和緬甸於二〇〇五年，先後達到5%至0的關稅目標；三、二〇〇二年一月，鑑於世界經濟情勢與東協成員面臨的實際困難，成員中僅有新加坡及汶萊達成既定的減稅目標。東協國家遂決定將原來預計於二〇〇二年將成員國間的關稅稅率調降至5%以下的期限順延一年。<sup>213</sup>

由於大部分東協國家，從一九八〇年代即積極採取「出口擴張政策」，所以關稅原本就比其他開發中國家為低，所以自由貿易區的進展也較為順利。不過，促成貿易自由化的推力，主要還是來自外在環境的變遷：首先，由於歐盟及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形成，加速全球經濟「區塊化」的進展，東協為求自保必須加速其整合時程；其次，冷戰結束之後，東協也有所警惕，深怕外資從東亞抽手、轉移到東歐或其他新加入自由市場體制的國家；<sup>214</sup>再者，中國在東南沿海陸續設立的經濟特區、印度也漸次開放經濟，再加上越南與美國和解，都使得東南亞各國警覺到，在此一全球化的氛圍下，唯有加強區域整體的競爭力，才有生存的機會。此外，東協國家的貿易主要是與區域外國家進行，區域內的相互貿易不大。東協自由貿易區若要成功，必須加強區域內各國的經濟互賴與相互合作。東協國家間的互動型態，大致上是依產品價值的高低，從較高的發展國家將其生產活動向較低的發展國家移動。所以東協國家彼此間的經濟合作要能成功，還是需要做出一番心理上的調適及妥協，尤其是面對利益分配不均的問題。<sup>215</sup>

## 貳、東協加三：一紙不完整的「協議」

---

<sup>213</sup> 宮占奎、孟夏與劉晨陽，《中國與東盟經濟一體化：模式比較與政策選擇》。北京：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民92，頁55-57。

<sup>214</sup> 東協在亞歐會議的安排及佈局上，多少與東歐國家爭取歐盟資金的策略有關。參見：郝培芝，頁133。

<sup>215</sup> 林欽明，〈東協區域經濟整合〉，《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25卷，第7期，民91.07，頁66-68。

東協距離真正區域整合的目標，路途其實還很漫長。早在一九九二年即被倡議的東協自由貿易區，也因為較難克服內部成員保護主義的傾向，基本上只能視為是在世界貿易組織規範下之「法律上的存在」(Legally Exists)，對於區域內之經濟貿易往來效果有限。<sup>216</sup>此外，東協在東協自由貿易區以及跨國工業合作計畫(AICO)的架構下，已經沒有足夠的議題可以帶動區域內的互動，加上國際環境的變差，對東協的貿易和投資都有負面的影響。<sup>217</sup>所以，東協國家為突破區域內產業相似的瓶頸，急需要擴大區域合作對象，藉由經濟整合的方式，發展產業上的互賴性。除此之外，也要引進先進科技並垂直整合產業，透過科技轉移產生區域經濟整合的外部效果，提升東協國家整體經濟實力。<sup>218</sup>

「東協加三」(APT)的發展要從一九九〇年開始，該年馬來西亞總理 Mahathir 提議將東協與東亞幾個經濟體結合起來，成立「東亞經濟集團」(EAEG)。不過美國認為如此會將美國勢力排除在東亞區域外，再加上倡議者 Mahathir 長期向美說「不」的反美政策，美國自然會強烈反對。美國甚至認為這是一種種族主義的歧視，一如在太平洋上劃一道線，硬要區分彼我。<sup>219</sup>一九九一年十月在東協召開經濟部長會議時，決議將東亞經濟集團改稱為「東亞經濟會議」(EAEC)。一九九四年七月在曼谷召開第二十七屆東協部長會議期間，邀請了中、日、韓三國外長進行非正式的午餐會，同時討論「東亞經濟會議」的相關議題，這是東南亞與東北亞間首次的部長級會議。一九九五年也延續這個模式進行，一九九六

---

<sup>216</sup> 洪財隆，〈中國與東協建立 FTA 背景分析：兼論我國經貿策略應變之道〉，《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27 卷，第 1 期，民 93.01，頁 117。

<sup>217</sup> 侯真真，〈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與對我國影響〉，《東南亞經貿投資研究季刊》，第 14 期，民 90.12，頁 3。

<sup>218</sup> 林雅慧，〈「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之形成對我國經貿之影響：可計算一般均衡分析〉，碩士論文，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民 92.06，頁 14。

<sup>219</sup> Mohamed Jawhar bin Hassa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Major Powers," *Pacific Review*, Vol. 8, No. 3, 1995, pp. 508-517.

年東協部長會議達成協議，將中、日、韓三國納入未來東協部長會議的所有計畫內。<sup>220</sup>

一九九六年三月第一屆亞歐會議(ASEM)在曼谷召開，該次會議是一個絕佳的合作機會。在該次會議中不但使東協「引歐入亞」、「聯歐制美」策略奏效外，同時也促使原本被美國封殺的東亞經濟集團(後改稱「東亞經濟會議」)有了「借殼上市」的機會。這是亞洲首次以一個整體與歐盟進行對話，自此「東協加三」式的東亞集團便出現在國際舞台上。一九九七年金融風暴席捲亞洲，更讓整個亞洲國家體認到區域合作的必要性。亞洲金融風暴促使亞洲國家基於危機感及共同歷史背景，催化及加速了該等國家進一步合作的意願。在該年十二月於吉隆坡舉行的第二次東協非正式高峰會議中，邀請了中、日、韓三國領袖舉行首度的非正式會晤，「東協加三」的運作機制已略具雛型。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第二屆東協加三非正式高峰會議在越南河內舉行。與會各國元首均肯定會議的重要性，同時也將定期舉行東協與中、日、韓三國領袖間的會議。一九九九年於馬尼拉召開第三次東協加三非正式高峰會議，會後十三國政府代表發表了「東亞合作聯合宣言(聲明)」(Joint Statement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該宣言(聲明)是東協首次與中、日、韓三個對話夥伴，共同發表的聯合宣言(聲明)。<sup>221</sup>該宣言揭櫫了東亞合作的重點主要在經濟、貨幣、金融、人力資源、科學、文化以及資訊等面向，並承諾強化東亞國家政經之協調與合作，促進東亞和平與繁榮。除此之外，為加強東協各國的對外競爭力、吸引外資流入本區，以及加速經濟復甦與重建工作，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及汶萊等六國進口關稅自由化時程由二〇一五

---

<sup>220</sup> Terada Takashi, "Constructing An 'East Asian' Concept and Growing Regional Identity: from EAEC to ASEAN+3,"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2, 2003, pp. 261-262.

<sup>221</sup> Santha Oortjitham, "From Our Correspondent: ASEAN+3 = EAEC," *Asiaweek*, <http://www.asiaweek.com/asiaweek/foc/2000/03/15/>, Mar. 15, 2000.

至再提前至二〇一〇年實施；而越南、寮國、緬甸及柬埔寨等四國則由二〇一八年提前至二〇一五年。

在亞洲金融風暴後，日本原先提出了亞洲貨幣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 AMF)的構想，不過遭到美國以已有國際貨幣基金為由「駁回」。在此情況下，為了因應對未來金融風暴的處置，二〇〇〇年五月於東協加三財政會議中，日本再度提出了「清邁倡議」(Chiang Mai Initiative)，欲建立東亞地區的「換匯協定」(Region-Wide Currency Swap Arrangement)，<sup>222</sup>來促進區域貨幣的穩定。除了彌補亞洲貨幣基金(AMF)夭折的缺憾外，也缺補了現有國際架構之不足，期待能防止金融風暴的再度發生。另一方面，日本也開始擘畫東亞地區的區域整合。這個構想於一九九九年形成，於二〇〇〇年趨於成熟。相對於其他國家的熱切，日本似乎為此感到焦慮，因為日本政府憂心的還是其國內經濟的疲軟不振。除了國內龐大農業利益團體強力阻止農產品納入自由貿易範圍外，農林水產省(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MAFF)也加入戰局反對部分水產、花卉的進口。日本在農業部門的強烈抗議下，遲遲無法開放國內市場。日本最後僅願意與新加坡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在批評東協貿易自由化腳步不一的聲浪中，拒絕了日本與東協間自由貿易區設立的建議。<sup>223</sup>

「東協加三」的整合平台，最先是以前經濟合作為重點，金融合作為先導。不過因為日本一直不願意東協國家的農產品，隨著「東協加三」之運作機制進口到日本市場，這也導致「東協加三」的發展，不若「東協加一」來得順暢。「東協加三」面臨著諸多立即的強勁競爭對手，且其代表的並非東亞地區直接利益。即便如

---

<sup>222</sup> 「換匯協定」(Region-Wide Currency Swap Arrangement)，也可以稱為：區域貨幣換匯支援體系(network of currency swap deals)，參見：第二章，第一節、第「參」部分的「四、區域發展與整合趨勢」。

<sup>223</sup> Young Jong Choi and Nae Young Le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d the Americas," *Asian Perspective*, Vol. 26, No. 3, 2002, pp. 186-188.

此，Richard Stubbs 還是對其未來充滿希望，認為「東協加三」仍然可以成為區域或國際上的主要行為者。<sup>224</sup>不過，以短期來看，「東協加一」還是發展得較為完整。下一段的內容，本文將探討後來居上的「東協加一」。

## 參、東協加一：醞釀期

中國與東協的關係僅能溯及一九九一年七月，當時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應馬來西亞之邀，參加了第二十四屆東協外長會議 (ASEAN Ministerial Meeting, AMM) 的開幕式。結果錢其琛趁著那次的機會，表達了中國願意與東協開展各方面合作的意願。東協當時對中國的意願作出相當正面的反應，於是開始就雙方關係進行一連串的協商。<sup>225</sup>一九九二年錢其琛應邀至馬尼拉參加東協外長會議，並於會中表達支持東協「和平、自由、中立區」，以及東南亞無核區的主張。對於會中通過的「(東協)南海宣言」(ASEAN Declara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僅表示接受部分內容，同時強調「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立場。該次會議是中國與東協國家，首度面對南海問題交手。<sup>226</sup>

一九九三年，東協秘書長 Dato Ajit Singh 率團赴北京與當時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唐家璇會談，確定成立經濟貿易合作、科學技術合作 (ASEAN-China Joi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 JSTC) 兩個合作委員會，這是中國正式與東協建立關係的濫觴，自此雙方高層互訪頻率增多。一九九四年七月在曼谷舉行的第二十七屆東協外長會議，中國成為東協的「磋商夥伴」(Consultative Partner)，並獲得加入東協區域論壇。一九九五年三月東協外長發

---

<sup>224</sup> Richard Stubbs, "ASEAN Plus Three: Emerging East Asia Regionalism?" *Asian Survey*, Vol. 42, No. 3, May/Jun., 2002, p. 455.

<sup>225</sup> 一九九一年六月，中國官員首次以私人身分，參加東協所舉辦的亞太安全研討會。參見：黃奎博，〈冷戰後中共與東南亞國協之政治合作〉，《國際關係學報》，第 15 期，頁 89.12，頁 206。

<sup>226</sup> 同上註。

表聲明，呼籲與南海問題有關之當事國有所節制，遵守「南海宣言」。同年四月中國首度同意與東協國家召開雙邊對話，即杭州會議，以暫時緩和中、菲兩國針對美濟礁(Mischief Reef)事件所帶來的區域緊張關係。此外在會議中，中國也同意將南海問題提到東協區域論壇中討論。該年七月在第二屆東協區域論壇中，中國也針對南海問題對東協做出多項妥協，包含了一改過去只與東協個別國家進行雙邊會談的立場，同意與東協進行集體協商；同時也不再堅持過去片面處理南海問題的方式，中國宣稱將依照國際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以及相關法律規定，妥善解決南海問題；此外，中國也願意維護南海地區航道的暢通與安全，但也主張應排除美、日等非南海地區國家介入南海主權爭端。<sup>227</sup>在雙方都有意進一步合作的情況下，中國對東協做出了極大的讓步，而東協因為南海問題的暫時擱置也暫時放下「中國威脅」的疑慮。中國與東協彼此解開南海主權爭議的心結後，代表著阻礙雙方合作的「石頭」暫時移除，有利於彼此間更緊密的互動和結合。

一九九五年，中國與東協「資深官員（高官）會議」(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SOM)正式成立，尤其是針對涉及安全的議題，提供雙方很好的時機展開接觸和公開對話。一九九六年七月，東協部長會議正式接納中國成為正式「對話夥伴」(Dialogue Partner)，當時的中國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率團與會，是中國第一次正式參加東協會議。<sup>228</sup>一九九七年二月中國和東協宣布成立「**合作委員會**」(ASEAN-China Joint Cooperation Committee, ACJCC)，作為確認共同利益之匯整與協調的平台。此一平台主要針對四個平行機制，做一協調及彙整的聯繫：**資深官員會議**、**經濟與貿易合作委員會**、**科學與技術合作委員會**，以及**北京委員會**。同時，為顯示支持雙方對話過程，中國設立七十萬美元的「合作

---

<sup>227</sup> 同註 23，頁 217。

<sup>228</sup> 同註 55。



基金」(ASEAN-China Cooperation Fund)，方便「合作委員會」運作，促進合作計畫的推動。同年（一九九七年），在馬來西亞舉行中國與東協領導人非正式會晤，雙方發表了聯合聲明，提出建立「睦鄰合作友好關係」(ASEAN-China Cooperation Toward the 21<sup>st</sup> Century)。隨後由於中國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作為，更贏得東協國家的好感。之後，中國與東協間的關係更提升到—「邁向二十一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係」(Foreign Closer ASEAN-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sup>229</sup>

## 肆、東協加一：「初登板」

二〇〇〇年舉行東協加三非正式領袖會議時，南韓總統金大中(Kim Dae Jung)提出由東協及日、韓、中合組更緊密經濟合作集團的建議，<sup>230</sup>而中國則提出由東協與中國大陸成立自由貿易區的計畫。一般認為這兩項計畫可能平行進行，但僅隔一年，中國的十加一計畫竟然快速地得到肯定，南韓的計畫未被採納，這原因或許是因為中國的條件較適合東協國家的利益。其實，所謂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構想，是二〇〇〇年時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於新加坡與東協國家領袖舉行的會晤中，首度提出的建議，用以加強雙方的投資及貿易聯繫。在朱鎔基的建議下，成立彼此間的「**經濟合作專家小組**」(ASEAN-China Experts Group on Economic Cooperation)，負責研商中國加入世貿，以及與東協間進一步的經濟合作事宜。

在此之前，區域內所談的是「東亞自由貿易區」，意即東協十國加上中國、日本、南韓，可是朱鎔基顯然對日本及南韓的興趣不大，所以在二〇〇〇年就直接提出「東協加一（中國）」自由貿

---

<sup>229</sup> Foreign Closer ASEAN-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http://www.aseansec.org/newdata/asean\\_chi.pdf](http://www.aseansec.org/newdata/asean_chi.pdf), Oct., 2001.

<sup>230</sup> Hyun-Seok Yu, op. cit., p. 275.

易區。在中國強勁的經濟成長領軍之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因此後來居上，原先倡議的「東亞自由貿易區」，反而變得沒有急迫感了。<sup>231</sup>另一方面，從東亞國家在亞洲金融風暴時的作為，也可以嗅出中國出線的可能。在金融危機中，日本由於經濟上的長期蕭條、日圓疲軟，無力有效支援東協各國，使得亞洲經濟缺乏一股安定的力量。雖然日本對東協的經濟援助超過中國的承諾，但是卻未受到相稱的尊重，原因出在日本以日圓大幅貶值的方式來振興其經濟，使得東亞地區的國家對於日本這種「以鄰為壑」的做法深感失望。<sup>232</sup>再加上日本倡議的亞洲貨幣基金又為美國「駁回」，這對於一直企圖在東亞扮演政治大國角色的日本，失去了展現實力的機會。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六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於汶萊出席第五次東協加三非正式高峰會議時，與東協達成在十年內成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共識。雙方未來將在五個主要領域內進行合作，包含農業、信息通訊、人力資源開發、相互投資及湄公河開發等。此一自由貿易區成立後，將涵蓋中國和東南亞地區十七億的人口，GDP 達 2 兆美元，總貿易額 1 兆 2300 億美元，估計自由化後，將可增加 50%。除此之外，「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將為雙方的出口帶來 50% 的增長，並將使東協國家的經濟成長率提高 1%，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率提高 0.3%。

此外，為支持東協國家縮小內部發展差距，中國將適時向東協國家中三個經濟發展較緩的成員—寮國、柬埔寨、緬甸提供特殊優惠關稅待遇。另一方面，針對「東協加三」的合作問題，朱鎔基也表示，這種合作應保持開放性，適時探討與其他區域合作機制建立聯繫的方式。他同時表示，應促進「東協加三」與「東

---

<sup>231</sup> 梁東屏，〈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 前途多艱〉，《中國時報》，<http://www.future-china.org/fcn-tw/200111/2001110703.htm>，民 90.11.7。

<sup>232</sup> 周大慶，〈日本以鄰為壑的底線在哪？〉，《聯合報》，民 87.06.15，版 15。

協加一」的協調發展。這個構想中的（東亞）自由貿易區，最終將包含日本及韓國。東協領導人在此次的高峰會議期間，也與中、日、韓三國領袖進行了非正式會晤，目的就是為未來的自由貿易區定下基調。<sup>233</sup>另外，中、日、韓三國領袖也同意將三國非正式會議改為例行的年度高峰會議，加強彼此間經貿與資訊科技的交流。

二〇〇二年五月十四日召開「中國—東協資深官員會議」，中國與東協雙方就建立自由貿易區的目標、原則、內容，以及時間框架進行討論；十五至十六日則是於北京舉行第一次「中國—東協（貿易）談判委員會」會議，會中具體討論了自由貿易區的相關問題。在六月二十七日於印尼雅加達，舉行「中國—東協談判委員會」之會議。會議中，中國與東協進行了關於「架構（框架）協定」的討論。該項協議草案包含了自由貿易區的目標、貨物、服務和投資的便捷化（自由化）安排等內容。該會議的召開，算是為該年年底做暖身的會前會，主要目的就是要起草「架構協定」，待於高峰會議中定奪。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四日，於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第六次中國—東協高峰會議。朱鎔基與東協各國領袖共同簽署了中國與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架構（框架）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arat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決定於二〇一〇年建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對於東協新成員國越南、緬甸、寮國及柬埔寨，考慮到其經濟發展程度的問題，將給予特殊和差別待遇，允許有五年的寬限，計畫到二〇一五年完成該自由貿易區的整合。該「架構協定」是未來自由貿易區的法律

---

<sup>233</sup> 本報訊，〈中國—東協十年內將共組自由貿易區〉，《華僑新聞》(Overseas Chinese News)，<http://www.ocn-miami.com/OCN/285/html/ml/ml02.htm>，民 90.11.6；以及梁東屏，〈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 前途多艱〉，《中國時報》，<http://www.future-china.org/fcn-tw/200111/2001110703.htm>，民 90.11.7。

基礎，共有十六款、四個附件，附件的部分主要涉及「早期收割（收穫）」方案(Early Harvest Programme)。根據該「架構協定」的規定，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將包含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和經濟合作等內容。其中貨物貿易更為自由貿易區的核心內容，除了涉及國家安全、人類健康、公共道德、文化藝術等世貿允許例外的產品、以及少屬敏感產品外，其他全部產品的關稅和貿易限制措施，都應逐年逐步消除。另外，根據「架構協定」中國與東協間的貨物貿易談判，將從二〇〇三年初開始，二〇〇四年六月三十日結束，<sup>234</sup>並從二〇〇五年一月開始啟動雙方的關稅減讓計畫。在「早期收割」部分，規定了HS編碼在協定前八章中的所有產品（農產品為主），不應晚於二〇〇四年一月一日開始實施。同時，將於二〇〇六年完成第一批廢除關稅計畫，約有六百項農產品，佔「早期收割」全部項目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服務貿易和投資也將逐步便捷化，關於服務貿易和投資的談判也將從二〇〇三年開始進行。在經濟合作方面，中國與東協將以農業、資訊通訊技術、人力資源開發以及湄公河流域開發(Greater Mekong Sub region, GMS)等為重點，逐步拓展其他合作領域。最後，「架構協定」也針對未來自由貿易區之貿易規範，如爭端解決機制等內容，做出原則性的規定。<sup>235</sup>

此外，在該次會議中，中國與東協秘書處還簽署了「農業合作諒解備忘錄」；同時，中國也和與會的東協領袖共同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以及中國與東協「非傳統安全問題合作聯合宣

---

<sup>234</sup> 經過數十回合的會議及談判，中國與東協間針對成立自由貿易區的談判，可望比預定進度提前完成。原本這項談判預定在二〇〇四年六月三十日結束。參見：大陸新聞中心，〈大陸、東協 FTA 協商達共識〉，《中國時報》，<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5+112004052200085,00.html>，民 93.05.22。

<sup>235</sup> 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arat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www.aseansec.org/13196.htm>, Nov. 4, 2002.

言」。依據「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宣言」表示：各方承諾保持自我克制，不採取使爭議複雜化、擴大化和影響和平與穩定的行動，包括不在現無人居住的島、礁、灘、沙或其他自然構造上採取居住的行動，並以建設性的方式處理簽署國之間的分歧。<sup>236</sup>東協諸國對此宣言表現了高度的正面評價，認為該宣言不但緩和了一度緊張的南海局勢，同時也為爭端解決，提供了政治基礎和保證。<sup>237</sup>換言之，雙方都希望以和平的方式，緩和及化解彼此間對於主權的衝突。如此，也有助於彼此間進一步的合作。

## 伍、東協及東協加一：持續深化合作

### 一、「峇里第二宣言」：東協共同體的願景

二〇〇三年十月七日東協領袖在印尼峇里島舉行高峰會議，並簽署了「峇里第二宣言」(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ern II, Bali Declaration II)，東協十國在宣言中承諾建立公平、民主、和諧的環境，不僅彼此要和平相處，也要與全世界和平相處。「峇里第二宣言」主要在於設立能夠容納五億人口及年度總貿易量 7200 億美元的單一市場，來對抗來自印度與中國等經濟大國崛起，大幅吸走外商對東南亞國家投資資金的威脅。東協這份協議還承諾將在東南亞設置自由貿易區，並設定調降關稅與旅遊限制的期限，最終目標冀望在二〇二〇年之前，能夠仿效歐洲整合成歐洲共同體的模式，成立東協經濟共同體。更重要的是，該宣言揭櫫了將建立包含「東協安全共同體」(ASEAN Security Community, ASC)、「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以及「東協社會、文化共同體」(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 ASCC)在內的「東協共同體」(ASEAN Community)之方向。在建立安全共同

---

<sup>236</sup> 參見：陳鴻瑜譯，〈東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海華與東南亞研究》，第3卷，第1期，民92.01，頁119-121。

<sup>237</sup> 本報訊，〈越南海軍船隻載客赴南沙旅遊 中國保持最大克制〉，《國防知識報》，<http://jczs.sina.com.cn/2004-05-01/1126196285.html>，民93.05.01。

體方面，東協要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全盤解決區內的安全及治安問題，而非主張締結協防條約或建立軍事同盟。不過，這還是說明了東協已經從以往強調經濟發展的基本路線跨出一步；在建立經濟共同體方面，東協諸國同意在將在二〇二〇年以前成立無關稅與無非關稅障礙的單一市場，實現經濟整合。同時，建立歐洲式的經濟共同體，人員、服務、資金移動便捷化（自由化），以及縮小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差距；至於在建立社會、文化共同體方面，各國決定在愛滋病、SARS 等傳染病的防治方面加強合作，同時致力保存文化遺產及增進彼此間的交流。<sup>238</sup>

## 二、中國與東協更加緊密合作

在東協簽署「峇里第二宣言」後的隔日，登場的戲碼是中國與東協間持續的發展規劃。十月八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印尼峇里島，與東協十國領導人簽署「邁向（面向）和平與繁榮戰略夥伴關係聯合宣言」，雙方宣布建立邁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這是中國首次和一個國家集團簽署戰略夥伴關係的文件。溫家寶在簽字儀式前表示，宣言是對雙方關係成果的一個總結，將為中國與東協關係在新世紀全面、深入、穩定、持久的發展上，提供重要指導。經由該宣言的簽署，象徵著雙方關係進入了新的階段，也是雙方關係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該宣言指出，「邁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的目的，主要是透過在二十一世紀全面深化和拓展雙方的合作關係，培育睦鄰友好，加強互利合作，為該地區的長期和平、發展與合作做出更多的貢獻。同時，宣言也表明這種關係是非結盟性、非軍事性以及非排他性的，不影響各自全方位發展的對外友好合作。另一方面，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也於同日與東協十國外長簽署文件，宣佈中共正式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中國成為東南亞地區以外第一個加入該條約的國

---

<sup>238</sup> 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ern II, <http://www.aseansec.org/15159.htm>, Oct. 7, 2003.

此外，在這一次的高峰會議中，中國與東協很快就達成一項特殊關稅減讓計劃的協議，這項為期三年的計劃，中國將對東協國家的農產品及製造業關稅減讓，讓東協國家實際受惠，作為雙方建立世界最大自由貿易區的基石。總計，十月八日在印尼召開的東協會議中，中國與東協成員簽定了包括「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邁向（面向）和平與繁榮戰略夥伴關係聯合宣言」，以及「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之補充議定書」在內的三份文件，透過上述文件的簽署，中國實質上已經成為東協的「第十一國」。

### 三、「東協加一」持續發展：日本「芒刺在背」的焦慮？

隨著中國與東協間緊密的合作發展後，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東協與日本在東京舉行兩天的高峰會議。日本試圖在此次會議中深化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同時也有反制中國在亞洲日增之政經影響力的味道。這個東協與日本間的領袖峰會，係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二〇〇二年訪問東南亞後提議舉行的，是東協各國領袖首次在境外召開的高峰會議。日本在東南亞面臨中國挑戰日增，認為和東協舉行高峰會議是提升日本在東南亞政經地位的良機。在會議中，日本承諾和東協各國交涉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同時也同意和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展開自由貿易談判。日本首相小泉表示，基於時代需要，日本必須加強與東協的經濟關係。

240

---

<sup>239</sup> 王玉燕，〈中共東協簽署戰略夥伴宣言〉，《聯合報》，<http://udn.com/NEWS/WORLD/WOR1/1608553.shtml>，民 92.10.9。

<sup>240</sup> 陳宜君，〈東京宣言 十年內打造東亞共同體〉，《自由時報》，<http://www.libertytimes.com.tw/>，民 92.12.13。

隔日（十二月十二日），日本與東協十個成員國結束兩天的高峰會議，並簽署共同聲明「東京宣言」，將致力於擘建「東亞共同體」，並謀求在二〇一二年底之前成立日本與東協的自由貿易區。東京宣言強調，日本及東協將盡最大努力，從二〇〇五年初展開全面經濟夥伴關係的談判。同時也考量東協諸國經濟水準及敏感的產業部門後，雙方會再行磋商，期望最快在二〇一二年底之前設立自由貿易區。雖然東協與日本在區域整合方面落後「東協加一」的進程，但是日本仍是東協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及投資者（僅次於美國），且日本也是昔日東亞經濟的「雁頭」，東協與之進行更緊密的合作，對彼此的發展都有正面且積極的作用。此外，日本也承諾將持續把東協國家列為其「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的首要對象。還另行發布文件，表示將提供三十億美元經援，其中約半數將幫助東協進行人力資源發展，剩下約十五億美元將在未來三年內，用於開發涵蓋柬埔寨、寮國、緬甸、泰國與越南的「大湄公河流域」經濟發展計畫。<sup>241</sup>東協目前接受的外國經援中，約六成來自日本；而日本編列的海外援助預算中，約有 30% 用於東協各國。另一方面，日本外相川口順子也代表日方簽署加盟東協互不侵犯協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意向書。中國及印度已經在稍早（二〇〇三年十月）加入該條約，日本是亞洲國家第三個簽署該條約者。<sup>242</sup>

日本尋求自由貿易協定或自由貿易區的簽署，主要還是以經貿來考量其國家整體利益，是基於經濟因素，所以日本較重視能

---

<sup>241</sup> 日本準備提供湄公河各項開發計畫更多援助，以建立所謂東西經濟走廊，即一條連接越南峴港，泰國穆克達哈，和緬甸毛淡棉的公路，及一條連接越南胡志明市，柬埔寨金邊及泰國曼谷三地的公路。參見：霍達文，〈東京宣言 日與東協籌設東亞共同體〉，《聯合報》，

<http://udn.com/NEWS/WORLD/WOR3/1733093.shtml>，民 92.12.13。

<sup>242</sup> 潘勳，〈日本東協東京宣言 致力擘建東亞共同體〉，《中國時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4+112003121300053,00.html>，民 92.12.13。



由上述兩者中取得實質的貿易與投資利益。另一方面，日本追求東亞地區自由貿易協定或自由貿易區的簽署，其實是基於情勢所趨不得不為。其中，包含為減低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區，「區塊化」後對國際貿易上的負面影響，同時也為提振及活絡日本的經濟。但是，日本在提倡及追求自由貿易協定或自由貿易區時，對內也必須擺平農業部門對開放市場的反彈聲浪。早先東協國家期待日本在東亞經貿整合（東協加三），扮演火車頭角色時，日本即因國內部門的反對而「婉拒」。當時日本的出發點是以經濟面向的國家利益為優先順序，尤其是針對國內農業部門的反對而作罷，並非是以政治考量、總體經濟的角度來看待「東協加三」。不過，當「東協加一」發展迅速之後，日本著實進退失據、悔不當初。日本除了要重新審視整體經濟觀點對整合的利弊之外，也必須考量政治方面的因素，同時對東協做出更多的妥協。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日本在二〇〇三年十月間在峇里島召開的高峰會議上，拒絕與東協間「友好合作條約」的簽署。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二〇〇三年十二月），日本改變主意同意加入條約。

#### 第四節 結 語

在關於東協及東協加一之歷史面向的討論，本文細分為兩條路線：一條為「東協路線」，主要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九七、九八年間的亞洲金融風暴前後；另一條則為「東協加一路線」，主要是從一九九七年到現在的發展。一九九七、九八年間的亞洲金融風暴可以視為東亞區域整合運動更積極推動的催化劑，而且「東協路線」到後來有與「東協加一路線」匯流發展的趨勢。

任何組織的成立，都有其成立背景、時空因素，以及其存在的結構性制約。此外，區域外國際情勢的轉變，也影響著區域內行動思維的方向。一九六七年八月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

賓以及新加坡等五國，在美國的支持及協助下成立了東協。除了加強區域內經濟、文化和社會方面的合作外，主要的因素還有各國國內共黨勢力的叛變，以及越戰擴大所帶來的不安。換句話說，東協的成立顯然同時兼具了安全和政治的考量。不過，中國對於此一組織的成立，始終將其視為美國帝國主義驅使下的區域安全組織。<sup>243</sup>所以，在冷戰期間，東南亞地區也延續著地緣政治海陸爭霸的戰略思維。而中國與東協則是分屬共黨與反共兩大陣營，在冷戰的氛圍下，彼此接觸與互動相當稀缺。

相較於成立時的風光，在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五年這九年當中，東協幾乎是處於空轉的局面，具體成就非常有限。在此一時期，東協採取中立、不結盟政策，一方面爭取大國保證區域的中立化，期望排除任何形式的強權干預；另一方面，實行與大國間的「等距外交」策略，使大國間產生相互制衡力量。<sup>244</sup>一九七六年召開第一屆東協高峰會議，與會各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及「東協和諧宣言」。上述兩項文件顯示東協朝向確保區域和平及穩定、促進經濟及社會成長，及加強與所有愛好和平之國家的合作需求等目標及意向。此外，在該次會議中也決定於印尼雅加達設置常設秘書處，提供東協行政支援及協調組織活動。這些制度及規範，促使東協朝一依多邊主義架構邁進的區域整合之目標一前進了一大步。

東協諸國在九〇年代經歷快速的經濟成長後，伴隨而來的是區域內整合呈現停滯的局面。一九九七、九八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不但席捲該等國家的財富，同時也戳破東協國家區域整合的美夢。東協運作機制在金融風暴中空轉，並沒有針對身陷風暴中的國家進行及時的援助和補救。再加上國際貨幣基金及美國針對東協各國在金融風暴中的援助不力，使東協諸國對於二者的做法不

---

<sup>243</sup> Shee Poom Kim, *op. cit.*, 1982, p. 73.

<sup>244</sup> Leszek Buszynski, "ASEAN, A Changing Regional Role," *op. cit.*, p. 782.

以為然。於此同時，由於中國允諾人民幣不貶值的策略，使金融風暴的影響不再擴大，也讓東協與中國有進一步合作的空間。所以，東協在經濟合作上開始轉變，其作風不再保守，改採「先同意、再談判」的積極原則。<sup>245</sup>對內積極進行區域內的整合，對外則與中、日等國家進行多項經濟合作，進一步推動貿易自由化，促進區域內、外的貿易交流，同時也企圖強化東協在全球政經體系中的角色。

另一方面，如同前文所述，<sup>246</sup>依照 Andrew Hurrell 對於區域主義的觀點及說明，他將區域主義分為五個不同的「範疇」，分別為：一、區域化(Regionalization)；二、區域意識與認同(Regional Awareness and Identity)；三、區域國家間合作(Regional Interstate Co-Operation)；四、國家推動的區域整合(State-Promoted Regional Integration)；五、區域凝聚力(Regional Cohesion)。<sup>247</sup>在東亞區域主義的交會與變遷下，目前的進展應該是朝向 Hurrell 所言之「國家推動的區域整合」的部分；這是一個國家推動區域整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連帶會要求各國政府針對商品、服務、資本及人員的相互往來，制定特別的政策，其目的就是要減少或取消相關的互動障礙。在推進到此一範疇之前，東協在一九七六年第一屆東協高峰會議後，從「區域化」的過程慢慢游移到「區域意識與認同」形塑的階段。區域意識或是區域認同，主要就是對某一區域所產生的歸屬和認同感。而新的東亞區域主義，正嘗試建立起「亞洲認同」(Asian Identity)。就如同「認知的區域」(Cognitive Regions)，或是所謂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這些都是經由人們的認知過程，而逐漸形成的概念。至於，在「區域國家間合作」的部分，東協從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九七、九八年間的金融風暴，可以歸類在此一範疇中，即便東協在這個時期的

---

<sup>245</sup> John Ravenhill, *op. cit.*, pp. 850-866.

<sup>246</sup> 詳細內容請參見第二章，第一節、第「壹」部分：區域主義的理論觀點。

<sup>247</sup> Andrew Hurrell, *op. cit.*, pp. 39-45.

整合成效不佳，相關合作議程多為紙上談兵。

亞洲金融風暴無疑是促成東協及東亞諸國深刻反省的催化劑，她們開始進一步接觸與合作，更培養出整合所必須的「區域認同」，<sup>248</sup>同時也加速東協與中國、日本等國家間的經濟合作關係。而中國適時主動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的策略行動，帶動了東協與日本、南韓，甚至是印度間的合作，同時亦深化東協經濟整合的層次。東亞地區正以東協為核心，建立起一個區域經濟整合的網絡。在東協加速自身內部的經濟整合速度和層次的同時，其也欲藉由外力來縮小東協內部發展差距，中國是東協現階段的首選和夥伴。附帶說明的是，日本對於東亞區域整合的態度與立場，顯示出日本欠缺一個長遠的戰略規劃，<sup>249</sup>因此喪失先機與在東亞舞台表現的機會。日本原先對於東亞區域整合、甚至是與東協間創立自由貿易區的态度並不積極，等到中國與東協正式宣布成立自由貿易區之後，才又重新積極布局與區域內國家進行貿易談判。目前日本是以與個別國家簽訂雙邊貿易協定，作為其主要的策略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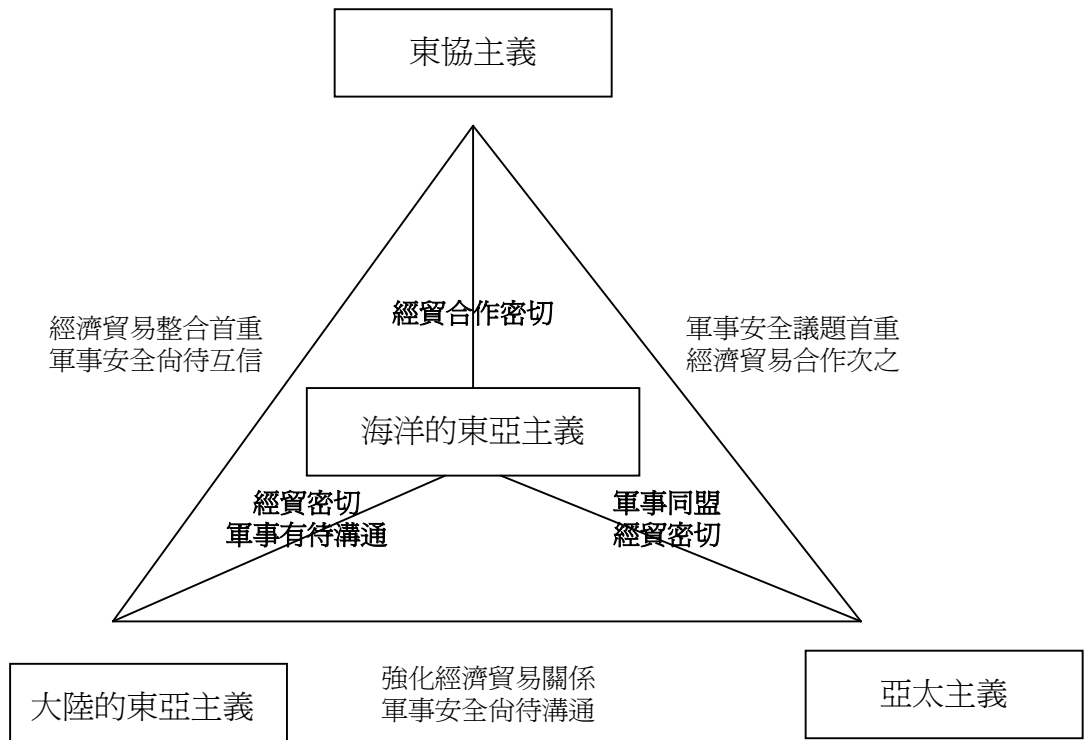
茲就東亞三大區域主義目前之現況與整合，圖示如下：

---

<sup>248</sup> Terada Takashi, op. cit., p. 266.

<sup>249</sup> Kevin G. Cal, “The ASEAN-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East Asian Regional Group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5, No. 3, 2003, p. 399.

圖 3-1：東亞三大區域主義之現況與整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延續本論文核心之東亞區域主義的概念，東協與中國間雖率先成立自由貿易區，且中國也展現極大誠意一連簽署包含「南海行為準則宣言」、「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等多項國際規範，讓東協暫時放下心中的石頭，歡喜與中國成為友善鄰邦。不過，東協在軍事、安全議題上，與美國因國際反恐大業而合作，東協的「等距外交」、「多邊主義」策略思維充分表現在對外政策上。所以，東亞三大區域主義在此間的交會，並沒有因為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成立而讓其中一方失利。換句話說，東協主義者掌握現實主義者縱橫擺闔的決策方式，把「期待」（經濟發展）的部分與大陸的東亞主義進行整合，同時也把「怕受傷害」（軍事安全）的部分讓亞太主義來分憂。



## 第四章 中國與東協間之互動與

###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之形成

#### 第一節 政治與經濟的考量

自從歐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區、亞太經合會出現後，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類似的區域化運動在全球各地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東協及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也「不免俗」，相繼加入此一流行的風潮。在全球區域化競爭態勢底定的結構下，區域整合可以視為國家實力展現及國家政、經安全的追求。一方面強調區域經濟貿易的整合，同時用來牽制其他區域整合運動的威脅；二方面則是藉由區域整合運動，減緩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與考驗。<sup>250</sup>此外，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說法，如果涉及國際的政治、經濟或是金融等不確定因素增加時，會提高對區域整合的需求。因為隨著市場與交易範圍的擴大，必須承受負面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的成本也會提高，而區域規範與政策間的和諧、穩定，將有助於降低這些成本，進一步得到好處。<sup>251</sup>而且，在一九九七、九八年間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點醒了東協諸國合作的必要性和急迫性。除此之外，由於中國政治、經濟的快速崛起，也給予相關國家在市場以外的制度面上，加緊合作的動機。<sup>252</sup>在本節中，本文首先探討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形成之整合動機（誘因）；其次，就中國與東協間的互動，尤其是政治與經濟的考量，嘗試說明兩造合作的動機與現實考量；最後，提出本節之分析、

---

<sup>250</sup> P. Cook and C. Kirkpatrick, "Globalization, Regionalization and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Regional Studies*, Vol. 31, No. 1, 1997, pp. 55-66.

<sup>251</sup> See Walter Mattli, *The Logic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Europe and Beyon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sup>252</sup> 例如：東協加三的倡議和推動、東協與美國、日本等國家間的自由貿易談判等等。

探討，作為「政治與經濟面向」之互動關係的結論。

## 壹、區域整合動機（誘因）及中國與東協間的經貿互動

前文提及 Bela Balassa 認為區域整合可依其整合程度的高低，分為五種不同的層次，由低而高依序為：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關稅同盟(Customs Union)、共同市場(Economic Market)、經濟聯盟(Economic Union)，以及完整的經濟聯盟(Full Economic Union)。<sup>253</sup>除此之外，Jeffery A. Frankel 及 May T. Yeung 等學者的觀點，則是將「優惠貿易安排」(Preferential Trade Arrangements)排在國家間整合過程的首位。「優惠貿易安排」是與主要貿易夥伴關係中，最為鬆散的安排與結合。假如優惠貿易的安排是單方面的讓步，可以將此關係稱為「優惠貿易安排」；若是雙方面、相互的讓步，則將此關係稱為「優惠貿易區」(Preferential Trade Area)。至於，該等學者對於區域整合程度的排續則為：優惠貿易安排、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以及經濟聯盟。<sup>254</sup>

從理論的觀點來看，一個自由貿易區的成立，有助區域內成員提高其競爭力、生產力，同時也可使會員國增加貿易量和投資量。不過，John Wang 及 Sarah Chen 則認為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成立，會使東協與中國雙方都會付出短期調整成本(Adjustment Cost)。對東協來說其傷害甚大，因為東協與中國兩造同屬開發中國家（新加坡除外），且出口之商品同質性亦大。長期來說，彼此間的競爭性會大於互補性。<sup>255</sup>另一方面，東協國家著眼於亞洲金融風暴所暴露出經濟上的脆弱性，希冀經由與中國間的整合，除可藉區域整合所帶來的資金回流「紅利」外，同時亦

---

<sup>253</sup> Bela Balassa, op. cit., p. 2.

<sup>254</sup> Jeffrey A. Frankel, *Regional Trading Blocs in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pp. 12-17. And May T. Yeung, Nicholas Perdakis, and William A. Kerr, *Regional Trading Blocs in the Global Economy*.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1999, pp. 18-19.

<sup>255</sup> See John Wang and Sarah Chen, op. cit., pp. 507-526.



可以減少及避免東南亞地區在全球化浪潮下，被埋沒的機會。<sup>256</sup>為降低東協國家對於成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疑慮，中國做出多項正面回應，同時也一再保證雙方成立自由貿易區的長期利益。例如，為支持東協國家縮小內部發展差距，中國將適時向東協國家中三個經濟發展較緩的成員—寮國、柬埔寨、緬甸提供特殊優惠關稅待遇；中國願意較東協提早五年開放本國市場；以及中國將出資 500 萬美元協助湄公河清除污泥以利通航等等具體措施。<sup>257</sup>

### 一、區域整合的動機（誘因）

區域整合的出發點其實是「政治」的，主要著眼於政治上的需要，譬如在安全上的需求或是強化其議價的空間。<sup>258</sup>至於，推動區域整合及整合的動機（誘因），基本上也是政治上的著力點大於經濟方面的效益評估，主要有以下幾點說明：<sup>259</sup>首先，推動區域整合主要是藉由整合的推動，來強化及鞏固和平與區域安全。東協草創初期，主要也是著眼於安全方面的考量，然後漸次朝經濟區域整合的目標邁進；其次，「團結力量大」，藉由整合帶來國家間對外談判的籌碼。東協在對外政策上，藉東協十國的力量，採取集體行動的團體作戰方式，擴大其經濟實力，<sup>260</sup>有助於其周旋於美、中、日等國間，爭取有利的運作空間；第三，通過區域貿易協定的簽署可使相關國家，能在該機制的運作下，經由制度面的改革和修正，建立起互信互惠的關係；第四，既得利益者

---

<sup>256</sup> Alice D. Ba, "China and ASEAN: Renavigating Relations for a 21<sup>st</sup> Century Asia," *Asian Survey*, Vol. 43, No. 4, Jul./Aug., 2003, p. 639.

<sup>257</sup> 吳福成，〈亞洲的新震撼：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25 卷，第 7 期，民 91.07，頁 50。

<sup>258</sup> Jagdish Bhagwati, Pravin Krishna and Arvind Panagariya, eds., *Trading Blocs: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Analyzing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p. 11.

<sup>259</sup> Vincent Wei-cheng Wang, "China's FTA with ASEAN Countries: Economic Statecraft of 'Peaceful Ascendancy'." Paper Presen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Global Changes and Regional Challeng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Mar. 5, 2004, p. 5.

<sup>260</sup> Kusuma Snitwongse, "Thirty Years of ASEAN: Achievement Through Political Cooperation," *Pacific Review*, Vol. 11, No. 2, 1998, pp. 183-194.

(Vested Interests)的推動，可加速區域整合的進程。其中所謂的既得利益者包含：為促成磋商談判而成立之強有力的運籌機構、或是社會上的相關部門，他們從中牽線、充當說客，欲尋求區域貿易協定的達成；最後，個別國家可藉由整合得到許多的好處，例如：河流、漁場等相關使用權的取得。中國在與東協共同籌組自由貿易區的初期，提供寮國、柬埔寨、緬甸等國優惠關稅待遇，<sup>261</sup>讓東協諸國得到整合的好處。此外，個別國家經過整合後，也可藉由整合平台的建構，能夠更有效地經由「區域聯防」的方式，共同解決難題。其實，這與東協急欲藉由整合來防止未來金融風暴再發生的出發點，是相互切合的。<sup>262</sup>

在中國與東協就籌組自由貿易區的另一個誘因，就是規模大小(Size)的問題。「團結力量大」也是推動區域整合以及整合動機（誘因）之一，所以規模大小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整合環節。東協曾嘗試運用自身力量擴張其政經影響力，但是在其內部估計下，東協諸國人口的最大量僅能提升 29%，GDP 的最大能量可提升 32%，貿易量最大能可提升 46%。不過，一但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成立後，將可涵蓋中國（十二億）和東南亞地區（五億）共十七億的人口，GDP 達 2 兆美元，總貿易額 1 兆 2300 億美元，估計自由化後，將可增加 50%，其影響之大可見一般。同時，自由貿易區也將為東協出口到中國的總值增加 48%，中國出口至東協各國的總值增加 55%；同時，將使東協的 GDP 增加 0.9%，中國則增加 0.3%。<sup>263</sup>此外，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將為雙方的出口帶來 50%的增長，並使東協國家的經濟成長率提高 1%，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率提高 0.3%。中國與東協的結合擴大彼此的「規模」，同時也可讓整合後的東協重新出發，與中國在經濟發展上共榮共存。

---

<sup>261</sup> 同註 257。

<sup>262</sup> 同註 203，頁 2。

<sup>263</sup> 同註 204。

## 二、中國與東協間經貿往來的互動

本文進一步將中國與東協國家的主要對外貿易夥伴關係，如表 4-1 所示：

表 4-1：中國與東協國家主要對外貿易夥伴（單位：%）

	汶萊	東國	印尼	寮國	馬國	緬甸	菲國	星洲	泰國	越南	中國
主要	日本	美國	日本	越南	美國	泰國	美國	馬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出口	40.3	60.2	21	26	21	31.4	26.2	17.4	19.6	15.2	21.5
貿易	南韓	德國	美國	泰國	星洲	美國	日本	美國	日本	日本	香港
夥伴	12.3	9.1	13.2	19	17.4	13	14.9	15.3	14.9	14.9	18
排序	泰國	英國	星洲	法國	日本	印度	中國	香港	星洲	澳洲	歐盟
	12.1	7.1	9.4	7.5	10.9	7.4	7.4	9.7	8	7.1	≒17
	澳洲	星洲	南韓	德國	中國	中國	台灣	日本	香港	中國	日本
	9.2	4.4	7.2	5.3	6.5	4.7	5.8	7.1	5.4	6.6	14.9
	美國		中國		香港		星洲	中國	中國	德國	東協
	8.1		5.1		5		5.7	5.5	5.3	6.5	≒7.1
	中國		台灣					台灣	馬國	星洲	南韓
	6.4		4.2					4.9	4	5.5	4.8
主要	星洲	泰國	日本	泰國	日本	中國	日本	馬國	日本	南韓	日本
進口	30.6	24.8	14	59	16.9	27	21.6	18.2	23	12.7	18.1
貿易	日本	星洲	星洲	越南	星洲	星洲	美國	美國	美國	中國	歐盟
夥伴	21.5	16.9	13.1	12.3	15.9	19.5	18.6	14.3	9.6	12.2	≒13
排序	馬國	中國	美國	中國	美國	泰國	星洲	日本	中國	日本	台灣
	17.4	12.1	8.5	7.9	15.5	12	7.8	12.5	7.6	12.1	≒12
	英國	香港	中國		中國	馬國	南韓	中國	馬國	星洲	東協
	6.1	10.9	7.8		7.8	9.1	7.5	7.6	5.6	11.8	≒11
		南韓	南韓		南韓	台灣	中國	台灣	星洲	台灣	南韓
		5.5	5.3		5	6.3	5.7	4.6	4.5	10.6	9.7
			台灣		台灣	南韓	香港	泰國	台灣	泰國	美國
			5.1		4.7	5.3	4.5	4.6	4.4	5.4	9.2
							台灣				4.1

附註：中國對外貿易夥伴部分之數據業經修正，所以部份數據為約略估計值。

資料來源：Vincent Wei-cheng Wang, “China’s FTA with ASEAN Countries: Economic Statecraft of ‘Peaceful Ascendancy’.” Paper Presen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Global Changes and Regional Challeng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Mar. 5,

從表 4-1 中，可清楚瞭解中國與東協諸國主要的對外貿易夥伴。在對外出口貿易夥伴的部分，東協有八國與中國有密切的對外貿易往來。不過從上表中發現，其實東協諸國前三大的重要出口對外貿易夥伴排序如下：美國、日本、中國。在出口的部分，外銷到美國的比例佔東協國家最為重要的部分，日本居次在其間的角色扮演，不容小覷。至於中國，則為東協國家第三大貿易出口國；而中國對外出口首先「叩關」的對象也是美國，接著依序為：香港、歐盟、日本，以及東協，東協是中國第五大貿易出口國。

另一方面，在進口的部分，東協區域內部的交易較為活絡，針對重要的美國、日本、中國間之排序，則為：日本、美國、中國，中國仍為東協諸國第三大的進口貿易夥伴；至於中國主要的進口貿易夥伴，依序為：日本、歐盟、台灣及東協，東協為中國第四大貿易進口國。不過，若從上述中國與東協各自對外貿易夥伴的排序來看，似乎較難與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形成做一連結。因為設若以經濟規模為整合的前提，雙方最大的合作夥伴並非彼此。此外，兩造的最大出口國及進口國均為美國和日本，美國和日本其實才是中國與東協最親密的對外貿易夥伴。所以，本文有必要進一步討論東協國家與中國間的進出口概況，如表 4-2 及 4-3 所示：

表 4-2：東協國家對中國出口概況（單位：千美元）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汶萊	115.4	0.0	0.0	244.2	22,270.0
印尼	1,867,758.2	2,123,041.2	1,832,034.4	3,338,942.2	4,321,848.9
馬來西亞	1,519,935.5	1,313,812.7	1,545,082.2	4,595,865.8	6,433,437.9
菲律賓	327,921.7	244,411.6	343,682.6	2,521,925.8	2,570,611.5
新加坡	<b>3,214,704.8</b>	<b>4,195,491.8</b>	<b>4,059,714.3</b>	<b>12,718,557.3</b>	<b>16,236,398.3</b>
泰國	543,696.6	1,291,132.0	1,422,072.6	3,231,764.2	5,077,586.6
總計	7,474,132.2	9,167,889.3	9,202,586.1	26,407,299.5	34,662,153.2
佔東協總出口比例(%)	2.20	2.58	2.80	7.37	≐7.94
佔中國總進口比例(%)	5.38	6.44	6.56	15.94	≐15.01

附註：1.一九九九年及二〇〇〇年中國的資料包含香港；

2.二〇〇〇年泰國及總量數據業經修正，所以總進出口的比例為約略值。

資料來源：張惠玲，〈中共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之戰略考量評析〉，《共黨問題研究》，第 28 卷，第 7 期，民 91.07，頁 11；部分數據經過修正，參見：東協官方網站資料：[http://www.aseansec.org/trade/files/an\\_cn\\_ps.htm](http://www.aseansec.org/trade/files/an_cn_ps.htm)

表 4-3：東協國家自中國進口概況（單位：千美元）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汶萊	72,500.2	55,090.6	20,620.9	72,415.9	84,958.9
印尼	1,235,458.7	1,518,013.9	904,459.4	1,469,644.0	2,364,323.0
馬來西亞	1,719,986.8	1,916,805.4	1,685,513.6	3,358,966.0	6,572,884.9
菲律賓	676,506.8	871,565.5	1,198,911.2	2,265,960.7	1,984,916.9
新加坡	<b>4,205,358.5</b>	<b>5,808,553.0</b>	<b>4,853,367.7</b>	<b>8,878,527.6</b>	<b>10,637,225.3</b>
泰國	1,307,809.3	3,312,855.6	2,548,662.2	3,138,797.8	4,210,755.3
總計	9,217,620.3	13,482,884.0	11,211,535.0	19,184,332.0	25,855,074.3
佔東協總進口比例(%)	2.56	3.76	4.19	6.64	≐7.05
佔中國總出口比例(%)	6.10	7.38	6.10	9.84	≐10.03

附註：1.一九九九年及二〇〇〇年中國的資料包含香港；

2.二〇〇〇年泰國及總量數據業經修正，所以總進出口的比例為約略值。

資料來源：張惠玲，〈中共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之戰略考量評析〉，《共黨問題研究》，第 28 卷，第 7 期，民 91.07，頁 12；部分數據經過修正，參見：東協官方網站資料：[http://www.aseansec.org/trade/files/an\\_cn\\_ps.htm](http://www.aseansec.org/trade/files/an_cn_ps.htm)

雖然中國與東協間主要對外貿易夥伴，均以美國、日本為主，不過近年來中國與東協間的貿易量呈現快速成長。東協出口至中國的貿易額由一九九六年的 747 億美元，增加到二〇〇〇年的 3460 億美元，漲幅達五倍之多；而東協自中國進口的貿易量，從一九九六年的 920 億美元，擴增到二〇〇〇年的 2580 億美元，漲幅也有三倍之譜。若以二〇〇〇年的統計數字，中國與東協間的總貿易量高達 6000 億美元。其中，對中國出口最多的國家為新加坡，從一九九九年開始印尼、菲律賓，以及泰國對中國的出口也大幅提升。二〇〇〇年時，上述東協國家對中國的總出口量，約佔東協總出口量的 8%，從一九九六年的 2.20%，提升約 6%。對照中國而言，二〇〇〇年東協對中國的總出口量，約佔中國總進口量的 15%，與一九九六年的 5.38%相比，著實成長了三倍。至於，在東協自中國進口產品的比例部分，也從一九九六年的 2.56% 增加到二〇〇〇年的 7.05%。其中，最大的進口國仍為新加坡。同時，東協諸國在一九九九年起從中國的進口貿易額，皆有大幅的成長。換個角度來看，二〇〇〇年東協自中國進口的總貿易量，約佔中國總出口比例的 10%。從一九九六年至二〇〇〇年間，每年均有所增長。經由上述的相關數據佐證，中國與東協間的經貿交流漸趨活絡，彼此間的關係和互動也更為緊密、重要。

此外，從表 4-2 及表 4-3 所示，中國與東協間的貿易量正逐年攀升中。但是表 4-1 又顯示出不同的訊息，由於兩造的重要對外貿易夥伴均非彼此，在尋求整合的規模大小及對成立自由貿易區的急迫性來說，中國與東協間自由貿易區的形成，還有其他的考量。經由中國外經貿部長王毅的話來說明，應該可了解其中值得重視的地方：藉由自由貿易區形成的有效互補機制，可以使中國能夠減輕對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過度依賴，提升抵禦外部風險的能力。<sup>264</sup>

---

<sup>264</sup> 王毅，〈水到渠成 意義深遠—寫在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談判即將啓動之際〉，《人民日報》，<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464/6068/604840.html>，民 91.04.26。

另一方面，美國與日本在此間的經貿地位也不能忽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二〇〇三年十月，極力促成中國與東協間經貿進一步的交流與合作，並期盼能於二〇〇五年以前達到區域貿易額 1 兆美元的目標，這個目標是雙方在二〇〇一年時總量 5500 億美元的兩倍。不過，美國在二〇〇一年時與東協間的貿易量即達到 1 兆 2000 億美元，<sup>265</sup>再加上日本在此間的影響力，這場角力賽還在延燒中。延續著東亞三大區域主義間的合作與競逐，中國為主的「大陸的」東亞主義雖然與東協主義在成立自由貿易區上達成共識，並不表示東協僅止於此一規劃，東協與美國、日本均另有經貿合作的架構（框架）協定。換句話說，亞太主義與「海洋的」東亞主義在此一區域不論是政治或經貿議題，均有運作的空間。這也說明了中國與東協間自由貿易區的形成原因，還有其他非經貿的面向，本文將在後續章節中說明之。

## 貳、中國與東協間的政經利益考量

亞洲金融風暴是促成中國與東協進一步合作的關鍵，即便雙方在產業結構、人力資源等相關要素上相當類似，尤其是在貿易及產業上的相似性很高。且中國與東協國家仍屬發展中國家，彼此相互競逐外資及市場，中國甚至是與東協處於相互競爭的局面。<sup>266</sup>在金融風暴後，東南亞國家除了整頓財政和金融外，也開始深化內部區域的整合。除此之外，在風暴中屹立不搖的人民幣，使東南亞國家有更強的意願與中國合作，重新拓展經濟及貿易往來。<sup>267</sup>不過，雙方即使有強烈的整合意願，該區域整合的形成是否符合東協諸國的國家利益、東協組織的發展利益，更是該等國家考量的部分。

---

<sup>265</sup> Jane Perlez, “Asian Leaders Find China a More Cordial Neighbor,” *New York Times*, Oct. 18, 2003, p. A1.

<sup>266</sup> John Wang and Sarah Chen, op. cit., pp. 507-526.

<sup>267</sup> 同註 3。

## 一、東協的政經利益考量

針對東協就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成立，討論其主要的政經及策略考量，主要如下：<sup>268</sup>

一、在東協個別國家無法在經濟上單獨與中國交往的情況下，東協欲使用集體的力量—以十擋一。亞洲金融風暴使東協面臨經濟增長缺乏支撐點，和主導國家的困境。由於受到現今的全球與區域政經結構的制約，東協諸國對於美國及日本的依賴，基本上會持續下去。但是亞洲金融風暴的經驗顯示，在關鍵時刻美、日兩國卻未能及時提供有效的支持和援助，反倒是中國的作為穩定了東亞經濟安全的情況。另一方面，東協也充分暴露了其在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弱點，這主要包含：出口市場過份集中於美日兩國、不良債權難以消除，以及技術創新不足等缺失。東協自此體認到想要再創經濟奇蹟，唯有加速自身的經濟調整和區域經濟整合的步伐，進一步強化東亞參與國際分工、合作與競爭的能力。所以，透過集體行動的力量與中國合作，欲藉由與外在區域或經濟體的整合來帶動內部的發展，同時也可克服東協自身的脆弱性；

二、藉由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成立，東協國家可以進入中國廣大市場、參與並分享中國的「繁榮」，同時也期待部分「對外直接投資」(FDI)能回流東協。於此同時，中國表達出極大的善意，願意針對發展較緩的東協四國，給予「早期收割（收穫）」等方案的優惠措施。此外，對東協諸國來說，自由貿易區的成立有助於自身有效地融入不斷崛起、繁榮的中國生產要素與產品市場，如此可造就製造之產品與投資兩方面，能更進一步的流通。

---

<sup>268</sup> Vincent Wei-cheng Wang, op. cit., p. 12. 以及徐斯勤，〈中國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對我國非經濟層面之影響〉，《APEC 通訊》，第 51 期，民 92.12，頁 2-3；江啟臣，〈跳脫「東協加中國自由貿易區」觀察其對台灣之意涵〉，《APEC 通訊》，第 51 期，民 92.12，頁 5-6；洪財隆，〈中國與東協建立 FTA 背景分析：兼論我國經貿策略應變之道〉，頁 116-117。



另一方面，東協仍積極推動區域內經貿制度及自由化的改革，以期促成規模經濟並提升競爭力，同時避免經貿夥伴在貿易和投資方面，進一步轉向中國；

三、東協國家認為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形成，除有助於加速東協內部自由貿易區的整合，也有助於與日本、美國等重要貿易夥伴間的互動及進一步的整合。換句話說，東協與中國加強經貿結盟亦有招徠其他合作對象的考量，特別是加緊和東北亞地區的經濟合作。除此之外，延續著東亞區域主義的交會與變遷，東協主義者在經貿議題上與大陸的東亞主義合作，同時藉由經濟發展「外溢」到政治及安全的層面。此外，強化與中國間的關係，乃有利東協平衡對美、日的過分依賴。另一方面，東協也運用其「等距外交」的策略，與中國、美國以及日本保持友好關係，同時善用更大的自由度來選擇其他政經結盟的對象；

四、中國與東協藉由經濟關係的強化，必然使彼此間的互賴關係更為緊密，同時有利在其他區域性政治或戰略問題上獲得互信與溝通，進一步降低日後中國成為安全方面威脅的風險。至於，中國與東協間關於軍事與安全更深入的討論，本文將於下一節中加以說明。

## 二、中國的政經利益考量

在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整合過程中，中國的政經考量主要如下：一、首先希望解除東協諸國針對中國崛起的不信任與「中國威脅論」之疑慮，希冀該等國家轉而重視其崛起所帶來的機會。<sup>269</sup>此外，在自由貿易區談判初期，中國釋放出大幅的善意及讓步，尤其是在特定產品市場上對東協的提供，而中國的用意正是抵消

---

<sup>269</sup> 有關「中國威脅論」及崛起等相關論調，請參見本章第二節：「軍事安全的面向」。

其在稀缺資源上，對東協擠佔競爭的既有效應；二、企圖化解東協國家對於中國大幅吸走外資而逐漸升高的疑慮，中國在尋求與東協締結自由貿易區的同時，也刻意讓國內資金投入東協諸國，作為彼此間資金外流的平衡；三、欲藉與東協間自由貿易區的成立，來爭取區域主導權。中國自從改革開放、加入世貿以來，展現出龐大市場規模(Size)、高經濟成長表現(Performance)、高度開放(Openness)等特點，使中國成為東協從原先深感憂慮到積極尋求區域整合的合作對象。不過，美、日在此間的影響力依然甚大，且中國很難在短期內制衡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優勢軍力部署，故企圖利用經貿手段來達到政治戰略的目標，提高自身在亞太地區的發言權，同時亦刻意排除日本在此間的經貿影響力。除此之外，由於中國現在無法取代美國成為區域秩序的主導者及維護者，也未能不顧經濟而在軍力上與美國「對決」。所以，中國最適的策略選擇就是拉進與東協諸國的政治距離，盡量沖淡該等國家對美國的向心力；四、面對區域經濟合作和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國與東協間自由貿易區的合作，有助於因應美、歐區域經濟整合所帶來的貿易保護主義。除了可以抗拒外來競爭、抵制西方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緩和其他地區的區域經濟組織下、貿易集團化對中國市場的衝擊外，又能夠重構對中國有利的經濟分工。<sup>270</sup>

除此之外，從中國與東協間自由貿易區的整合運動來看，中國看似政治上的聯合大於經濟上的效益，不過其實不然。自由貿易區的整合給予中國下列政治經濟的重大收穫：一、有助於中國在其他地區或議題領域的談判籌碼；二、降低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同時提升中國在此間的著力點；三、穩定區域環境、共同解決區域金融危機，同時全力發展國內經濟。<sup>271</sup>除此之外，根據中國與東協間「專家小組」的研究顯示，在中國—東協自由

---

<sup>270</sup> 徐斯勤，〈中國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對我國非經濟層面之影響〉，頁2；洪財隆，〈中國與東協建立FTA背景分析：兼論我國經貿策略應變之道〉，頁116-117。

<sup>271</sup> Alice D. Ba, op. cit., p. 641.

貿易區成立之後，東協對於中國的出口將增加 48%。而中國對東協的出口則增加 55%，可見彼此間的合作潛力和空間不容忽視。另一方面，由於東協國家一直都是中國西南省份最主要的出口市場，藉由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成立、**提供自由貿易區整合的誘因**，反而可大幅帶動中國西南省份與東協國家的經貿關係，更有助於中國落實西部大開發的新世紀國家戰略。<sup>272</sup>

其實在中國與東協間各自的算計背後，彼此間還是有相當程度的合作意願和共識。Kevin G. Cai 就認為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形成，可經由以下三個決定性要素來加以說明：一、藉由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成立，可強化區域力量，特別是在全球化、區域化興盛的時代，通過區域整合擴大市場及規模，才足以應付此一情勢的變遷，更何況歐盟及北美自由貿易區正蓄勢待發；二、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成立，可使雙方在經濟上的關係能夠更加緊密。不論是中國開發西南省份的新世紀國家戰略，或是東協「帳面上」獲得較多的利益，都會因自由貿易區的成立而增進彼此間的互賴關係；三、藉由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成立，可以通過事前預防、區域聯防的方式，減低及阻絕類似「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生。<sup>273</sup>

## 參、兩軍對弈：政治與經濟的組合

**承接本論文第三章關於東協及東協加一相關歷史面向之探討，進一步說明及探討中國與東協間的互動，尤其是政治與經濟方面雙方觀點。除此之外，中國及東協雙方也必須面對國際環境及自身內部的現實考量，雖然兩造仍以國家利益（中國）、組織優勢（東協）至上為衡量標準，但是還需要考量到內外結構的制約。**

---

<sup>272</sup> 同註 257，頁 51。

<sup>273</sup> Kevin G. Cal, op. cit., pp. 387-404.

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結構環境下，國家對外行為主要是以追求和增進國家利益為圭臬，所以在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國家本著理性的考量，評估各項利害損益，選擇對國家最有利的目標與行動，以期增進及滿足國家利益。此外，國際合作與國際道德無關，無須帶有價值規範的涵意與判斷。<sup>274</sup>換言之，當行為者經由政策協調，使自己的對外行為及政策，能夠「適應」其他行為者的實際願望或預期偏好時，合作才會開始進行。<sup>275</sup>另一方面，自由貿易區是促成區域貿易發展的良帖，透過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達到締約國間市場開放、增進投資，同時經由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等實際利益，減少貿易障礙、打造公平的貿易環境。<sup>276</sup>所以，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主要牽動著雙方的合作，彼此間的討價還價也是促成進一步合作的重要過程之一。

延續東亞三大區域主義的歷史發展，東協主義無疑在區域經貿整合上，扮演重要角色及整合平台。中國所代表的「大陸的」東亞主義與日本所代表的「海洋的」東亞主義，在二十一世紀首輪交鋒後，大陸的東亞主義略勝一籌取得與東協先行組成自由貿易區的先機。

## 一、中國的考量：發展經濟、以和為貴

通過中國與東協彼此在歷史上的互動及發展歷程，本文順著其間歷史的面向，進一步來說明中國的考量。首先，中國對外政策的制定，深受國際環境與內部條件的相互制約。<sup>277</sup>若只從國際關係的角度及戰略來看，略顯不足，中國內部因素通常在對外政策上，具有相當的作用。此外，從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初中共十六

---

<sup>274</sup>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op. cit., pp. 380-381.

<sup>275</sup>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op. cit., pp. 51-52.

<sup>276</sup> P. Cook and C. Kirkpatrick, op. cit., pp. 55-66.

<sup>277</sup> Samuel Kim, "New Directions and Old Puzzle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Samuel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New Directions i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9, pp. 21-23.

大江澤民的談話內容，可探知中國近年對外政策的主要方針。<sup>278</sup>其具體的作為就是與東亞及其他國家交好，強調中國不稱霸、同時注意霸權主義和強權有新的舉動。中國也利用多邊主義架構，遊走國際間，採取合作之對外政策；再者，中國在目前的國家戰略方針是以加強經濟改革和開放為主軸之對外政策，同時在追求國家利益的前提下，追求提升綜合國力及人民的生活水平；此外，中國也加強對外開放、吸納外國投資者所帶來的經濟資源與經濟機會，戮力追求國家經濟發展。除此之外，中國亦運用博鰲亞洲論壇(BFA)作為經貿方面的溝通渠道，加強與區域內、外國家及組織間的溝通與聯繫。

再者，針對中國整體政經考量的部分，因為在全球化架構下，區域整合已成為難以抵擋的趨勢，中國除延續東亞區域主義的「鬥爭」外，也必須對東亞地區整合運動的先機予以掌握。尤其是中國雖多次主張其不稱霸的立場，但是中國已具備區域霸權的雛型，自然要掌握東亞首波整合風潮。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不啻是中國試煉的好舞台，所以中國嘗試釋出政治上的善意（南海問題擱置），也試圖利用經濟上的誘因，<sup>279</sup>促使與東協間自由貿易區之整合計畫得以實現。

## 二、東協的盤算：取得較佳的地位與利益

延續東亞區域主義支流—東協主義的觀點，東協主義擺盪在亞太主義與東亞主義間，期待找尋最佳且最有利的位址。東協透過「洲際平衡」、「大國平衡」、「等距外交」等策略，<sup>280</sup>充分運用

---

<sup>278</sup>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報告），《人民日報》，民 91.11.09，版 2 及版 3。

<sup>279</sup> 其努力的方向主要為：減少東協區域內因為發展不均所造成的整合阻礙；其具體的作法主要為：支持東協國家縮小內部發展差距，中國將適時向東協國家中三個經濟發展較緩的成員—寮國、柬埔寨、緬甸提供特殊優惠關稅待遇。

<sup>280</sup> Leszek Buszynski, "ASEAN, A Changing Regional Role," op. cit., p. 782.

其間的衝突與矛盾，大行「現實主義」的策略手法。東協針對自身生存及安全考量的部分，持續、積極地與美國在反恐及區域安全上合作，同時也在打擊危害人身安全(Human Security)的議題上與美國合作。<sup>281</sup>此外，東協也運用亞歐會議、東協區域論壇等組織，與相關國家和組織進行政治、資訊（含軍事）方面的互動。

此外，從經濟層面的考量來看，除了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成立外，東協也與他國或其他區域組織，進行經貿方面的互動及進一步整合的策略。延續著政治方面的「等距外交」策略，東協在東亞推動的區域整合尚包含東協加三，以及與日本間的經貿合作。如此，使東協能夠在中國及日本兩東亞政經大國間遊走，取得自身最佳「左右逢源」的戰略位置。

最後，針對東協整體政經之考量，東協國家主要著眼於亞洲金融風暴所暴露出經濟上的脆弱性，希冀經由與中國間的整合，獲取「紅利」與「重生」的機會。除了可藉由區域整合所帶來的資金回流外，同時也可減少及避免東南亞地區在全球化浪潮下，被埋沒及遭逢邊緣化的機會。<sup>282</sup>另一方面，東協在中國提出諸多讓步後，暫時紓解心中的疑慮。此外，東協急需「外力」協助解決其內部發展不均的（整合）問題，中國適時出線、且願意提供部分的整合誘因，均有助於東協持續之發展。不過，東協也預留日後與中國討價還價的伏筆，就是持續進行與其他國家、區域進行「等距外交」策略，讓東協的「身價」能在穩定中求成長。

### 三、綜合論述

經過上述有關中國與東協雙方經濟與政治的考量後，可以進一步瞭解中國與東協間針對自由貿易區之成立，所做出相互間不

---

<sup>281</sup> Associated Press (AP), "ASEAN to Tackle Drugs, Terrorism," *China Post*, Jan. 7, 2004, p. 5.

<sup>282</sup> Alice D. Ba, op. cit., p. 639.

同的策略思維。中國與東協間就自由貿易區的談判，也預計於二〇〇四年六月底前完成。<sup>283</sup> 透過與中國間就自由貿易區不斷協商，東協積極爭取時間並持續運用「等距外交」、「多邊主義」的手法增加其談判籌碼，<sup>284</sup> 除了要盡量縮小東協內部發展差異及關稅壁壘外，更要促進東協內部的經濟調整、改善該地區之投資環境。換言之，東協欲利用與中國間的整合，經過中國釋放出的關稅優惠等方案，帶動東協內部進一步的整合運動。同時，東協諸國經過亞洲金融風暴中的教訓後，體認到「區域聯防」的重要性。此外，因為美、日等國在金融風暴期間的作為，使東南亞國家有更強的意願與中國合作。所以，東協透過集體的力量與中國合作，欲藉由與外在區域或經濟體的整合帶動內部的發展，克服東協自身的脆弱性。

在中國方面，之所以願意提供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成立初期，對東協諸國的多項優惠措施、提高彼此間的整合動機，其實也帶有多項政治意涵、區域考量的出發點。不過，中國在這一系列的作為並非僅只政治上的考量，中國看似政治上的聯合大於經濟上的效益，不過其實不然。該貿易區的整合也給予中國在政治經濟上的重大收穫，這包含：在其他地區或議題領域的談判籌碼、策略性降低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穩定區域環境、共同解決區域金融危機，同時中國也能全力發展國內經濟。<sup>285</sup> 除此之外，根據中國與東協間「專家小組」的研究顯示，在兩造間之自由貿易區成立之後，東協對於中國的出口將增加 48%。而中國對東協的出口則增加 55%，可見彼此間的合作潛力和空間不容忽視。所以，與東協間的整合，整體來說對中國是利大於弊。

最後，由於東協國家一直都是中國西南省份最主要的出口市

---

<sup>283</sup> 同註 234。

<sup>284</sup> Leszek Buszynski, "ASEAN, A Changing Regional Role," op. cit., p. 782.

<sup>285</sup> Alice D. Ba, op. cit., p. 641.

場，藉由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成立、提供自由貿易區整合的誘因，反而可以大幅帶動中國西南省份與東協國家的經貿關係，更有助於中國落實西部大開發的新世紀國家戰略。<sup>286</sup>中國致力於推動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尤其需要一個經過整合的區域經濟體作為其平台與依託，中國似乎也是基於該策略的考量，而非僅純粹出自經濟的因素。此外，中國針對東協發展較緩的國家提供關稅優惠與經濟援助，除了有助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承擔一個大國的責任之外，當然還有其他考量，譬如在人權議題上、甚至是台灣問題上，可以得到更多國家的諒解和支持。換言之，中國的對外政策愈來愈駕輕就熟，尤其在切合其國家利益的前提下，落實在東協發展國家的關稅優惠及經濟援助，更顯理性成熟。討論中國與東協關於「經濟與政治的考量」後，本文將在下一節進一步探討彼此間合作的「單門」—軍事安全的面向。

## 第二節 軍事安全的面向

冷戰結束之後，美國及前蘇聯的軍事部署撤出東南亞地區。於此同時，由於東南亞地區沒有一個國家具有足夠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力量，成為東南亞區域安全的保證人或守護者，所以這種安全局面便引發「權力真空論」的探討。<sup>287</sup>而西方國家更加以延伸，隨之產生「中國威脅論」的聲音。不論是權力真空論、還是中國威脅論，抑或是「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的觀點，<sup>288</sup>這些看法都代表中國（綜合）國力及區域影響力都有所提升，<sup>289</sup>使美國等西方國家或是東亞地區的國家，對中國的崛起都抱持著既期待（經濟）、又怕受傷害（軍事）的雙重心理。本節從軍事安全

---

<sup>286</sup> 同註 257，頁 51。

<sup>287</sup> William J. Crowe Jr. and Alan D. Romberg, “Rethinking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2, spring, 1991, p. 124.

<sup>288</sup>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8, pp. 340, 349.

<sup>289</sup> 有關綜合國力的相關內容，請參見第二章，第三節、第「貳」部分：綜合國力說明。



的面向，通過中國與東協雙方的觀點，說明彼此對於此一面向的互動與接觸。同時，延續本文東亞區域主義交會與變遷的主軸，探究在軍事安全面向上，對於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之形成的影響。

## 壹、南中國海幽靈： 中國威脅論 VS.東協的「焦慮」

中國威脅論大約是在一九九二年，美國從菲律賓撤軍後開始出現，該年 Ross H. Munro（孟儒）在 *Policy Review* 發表文章，他指出由於冷戰結束、蘇聯崩潰，再加上中國積極自俄羅斯取得先進武器，將可提高中國在本土以外的作戰能力，且適逢美國軍事力量撤出東南亞，給予中國對外擴張影響力及強化自身國際地位，一個大好機會。<sup>290</sup>

東協國家對於中國的觀感，可以說是：既愛又恨、想進一步合作、又怕受到傷害。一方面東協諸國樂意接受中國時常站在東協這邊，並替她們打抱不平，同時東協國家也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改善中國專制體質的良方。藉由中國政體的革變，減少彼此間的摩擦，有助於區域和平的穩定；但是，另一方面，東協國家也擔心中國崛起的經濟發展，會帶來「磁吸」效應搶走她們的投資機會和市場，也不時憂慮中國在南海日益強大的軍力部署。東協處在此種兩難的氛圍，也不是第一次。Robert O. Tilman 在一九八七年時就認為：對於大多數東協領導人來說，中國既是盟友、又是敵人。<sup>291</sup> 只不過現在的中國又較十餘年前更為強大，經濟改革帶來的部分財富，已悄悄地轉移到軍力設備的汰換。東協諸國面對的已是 Napoleon Bonaparte（拿破崙）觀念中的「醒獅」，中

---

<sup>290</sup> Ross H. Munro,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No. 62, fall, 1992, pp. 10-16.

<sup>291</sup> Robert O. Tilma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Enemy Beyon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7, p. 97.

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都已具區域霸權的雛型。

一九八〇年代末期針對南海主權問題，中國與越南發生零星衝突，結局在雙方克制下落幕。不過中國已從口頭上的主權宣示，轉變到實質的入主南海，中國海軍的動向與其發展備受東亞諸國關切。為因應中國在其後的舉動，東協國家於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二日舉行的部長會議中，通過「(東協)南海宣言」(ASEAN Declara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在宣言中表達東協對南沙群島主權爭議的期望：一、強調應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地區所有主權與司法管轄權的問題，避免相關爭端國訴諸武力；二、敦促牽涉爭端之各方自制，以創造有利解決爭端的良好氣氛；三、決議在不損及對南海地區擁有直接利益國家之主權及管轄權的情況下，研究在此一地區進行關於航海與交通、海洋環境與保護、搜救協調，以及打擊海盜與毒品走私等方面合作之可能性；四、要求有關各方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中之原則，作為建立南海國際行為準則之基礎。<sup>292</sup>此次宣言的提出，是東協諸國首次以集體、國際組織的方式，針對週邊區域內之潛在安全問題做出一致的立場，雖然整體論述尚稱溫和，但是東協全體一致決的集體力量，不容小覷。<sup>293</sup>

東協國家對於中國在南中國海上的作為甚具戒心，雙方雖然在一九九二年對於「(東協)南海宣言」有了初步的了解及接觸，但是中國僅表達接受該文件部分內容。<sup>294</sup>中國針對南海問題定調是在一九七八年鄧小平提出的解決原則，主要為十二字箴言：「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所以，中國在與東協初步接觸的階段，針對南海戰略採取的是兩面手法，外表和善、實際則是寸

---

<sup>292</sup>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ed., "ASEAN Declara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9, No. 2, Nov., 1992, pp. 240-241.

<sup>293</sup> Lai To Lee,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Conflicts," *Pacific Review*, Vol. 8, No. 3, 1995, p. 539.

<sup>294</sup> 同註 225，頁 206。

土不讓。<sup>295</sup>在經過「美濟礁」(Mischief Reef)事件後，中國與東協雙方願意展開雙邊談判，以緩和區域間緊張關係。一九九五年七月第二屆東協區域論壇中，中國針對南海問題對東協做出多項妥協，一改過去只與東協個別國家進行雙邊會談的立場，同意與東協進行集體協商；此外，中國不再堅持過去片面處理南海問題的方式，宣稱將依照國際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及相關法律規定，妥善解決南海問題。<sup>296</sup>

一九九七年中國與東協在非正式高峰會議上發表聯合聲明，提出「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主張。不過，雙方其實各自都有不同的盤算：一、在針對兩造衝突及爭端解決的方式上，東協強調運用多邊主義的方式來解決衝突，中國則傾向以雙邊模式解決爭端；二、在關於南海衝突及範圍界定部分，雙方也有不同的看法，東協認為衝突範圍涵蓋整個南海，中國則將範圍侷限在南沙群島；三、在雙方合作的部分，東協主張在雙邊或多邊的情況下進行合作，但是中國僅願意共同開發；四、在關於領土現狀維持與否的部分，東協主張應停止在南沙群島礁岩上的佔領活動，中國則未提及；五、關於例行軍事活動的部分，中國認為應該禁止軍事偵察、巡邏以及演習等活動，東協則未置可否。<sup>297</sup>由此可見，中國與東協間針對南海問題的攻防仍會持續，彼此間的歧見與心結尚待解開。

另一方面，一九九三年東協區域論壇的創立，成為亞太地區多邊安全對話機制，東協充分運用此一機制，在此間發揮自身影響力。中國於隔年七月，在第二十七屆東協外長會議的場合，獲准加入東協區域論壇。<sup>298</sup>此外，東協運用綜合性安全、共同性安

---

<sup>295</sup> 參見：薛釗，〈後冷戰時期我國南海戰略之研究〉，碩士論文，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民 88。

<sup>296</sup> 同註 23，頁 217。

<sup>297</sup> 孫國祥，〈新區域主義及其對台灣發展的影響〉，《全球政治評論》，第 3 期，民 92.07，頁 95。

<sup>298</sup> 同註 225，頁 206。

全，以及合作性安全等概念，強調以擴大東協方式的安全對話。換言之，東協將中國導入東協區域論壇的對話機制，企圖利用南海問題「國際化」的方式，迫使中國在此一問題上表態和讓步；而中國則藉由參與東協區域論壇，嘗試化解中國威脅論的說法，同時取得區域安全問題上的發言權。Rosemary Foot 認為東協區域論壇是在共識決和協商的原則下進行，該組織呈現的是非制度化型式，尚無法解決任何爭端與衝突。且該組織同時給予中國發聲的舞台，可以控制或反擊對己不利的言論。中國亦可利用此一管道樹立正面的形象，傳達可接受的安全模式，運用該組織多邊安全合作的形式，成為與美國間外交角力的武器。<sup>299</sup>

除此之外，中國對外策略的改變，也有助於化解兩造間的歧見與心結。冷戰結束之後，中國的對外政策不再以共產主義為主要思維，該項轉變在一九九二年十四大時得到確認。中國領導人意識到世界是開放的，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區域化趨勢日漸增強的情況下，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閉關自守；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而世界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sup>300</sup>同時，中國以現實的經濟利益為主要考量，並銳意提升其綜合國力為最大目標。另外，中國也轉變對東協國家的外交策略，由傳統意識形態掛帥轉而追求實質的利益關係。於此同時，中國採取友好的睦鄰政策，降低相互間衝突、增加彼此間的互賴關係。另一方面，中國與東協各國於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四日，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第六次中國—東協高峰會議上，共同簽署「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sup>301</sup>釋放更多的利多，有利彼此間進一步的經貿整合，對化解中國威脅論的迷思，助益甚多。

---

<sup>299</sup> Rosemary Foot, "China 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Organization Processes and Domestic Modes of Thought," *Asian Survey*, Vol. 38, No. 5, May, 1998, pp. 427-429.

<sup>300</sup> 詹世亮，〈中國在世界重新定位：走向 21 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大國關係〉，《中國評論》，第 10 期，民 87.10，頁 5-7。

<sup>301</sup> 同註 236。

南海領土爭議，長期以來一直是阻礙中國與東協進一步發展合作關係的象徵性指標（障礙），雙方共同簽署「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宣言」，對中國與東協來說都別具意義：就中國方面，中國簽署此一宣言，代表中國願意接受國際規範的約束。中國為建立其多極化的國際格局、穩定中國經濟發展的週邊環境，急欲透過與東協間自由貿易區的成立、並簽署「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宣言」表達善意與意願。進一步強化中國與東協間關於對抗恐怖主義、處理非法移民等跨國性議題的合作。藉由這些議題的合作，展現出中國是負責的區域大國形象；<sup>302</sup>另一方面，就東協而言，東協國家經由與中國間針對「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宣言」的談判過程，給予東協諸國團結內部對南海主權立場的機會。同時，東協也可要求中國根據此一宣言所揭櫫的合作原則，「外溢」到其他領域的合作與適用。<sup>303</sup>

近來（二〇〇三年十月八日），中國與東協更簽署象徵互不侵犯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同時，中國也與東協十國領導人簽署「邁向（面向）和平與繁榮戰略夥伴關係聯合宣言」，雙方宣布建立邁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中國這些對外政策舉動和作為，無疑是要透過睦鄰友好的外交作為，降低國際間對於「中國威脅論」的疑慮。<sup>304</sup>雙方在政治、經濟、安全、社會，以及國際事務進行全面的合作，成為區域安全及穩定的重要基石。同時，中國可因此改善在亞太地區、尤其是在東亞的形象。在兩造都有意進一步合作的情況下，中國對東協做出極大的讓步，而東協因南海問題擱置爭議，暫時放下「中國威脅論」的疑慮。中國與東協彼此解開南海主權爭議的心結後，代表著阻礙雙方合作的「石

---

<sup>302</sup> Alice D. Ba, op. cit., p. 641.

<sup>303</sup> Leszek Buszynski, "ASEAN, the Declaration on Conduc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5, No. 3, 2003, pp. 350-351.

<sup>304</sup> See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Bill Gertz, *The China Threat: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Targets America*.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頭」暫時移除，有利彼此間更緊密的互動和結合。

## 貳、「相敬如賓」：

### 中國和平崛起？VS.東協的因應之道

在後冷戰東亞區域主義的趨勢，三股勢力之交會與變遷，依然牽動著東亞地區的敏感神經。雖然美國開始從菲律賓等國撤軍，但是中國的威脅卻與日俱增。東協因為在一九九二年納入越南和寮國成為觀察員、並與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暫時化解來自陸地的威脅。<sup>305</sup>但是來自海上的威脅，具體來說就是中國在南海的作為，挑動著東協諸國脆弱的防禦能力與敏感神經。如何因應中國在南海軍事力量擴張後的情勢，成為東協國家首重的課題。同時，在歷史經驗、地緣關係，以及主權爭議等問題上，都使東協諸國在心理上承受極大的威脅。<sup>306</sup>

對中國威脅的敏感也表現在對區域安全上的高度隱憂，東協展現出高度「區域聯防」的行動，形成東協陣營的安全體。<sup>307</sup>換句話說，由於以美國為首的亞太主義，因為冷戰後紊亂的東南亞政策、再加上對其國內外專注事務的轉移，<sup>308</sup>所以在此一時期，東南亞地區是呈現不對稱的權力結構。「大陸的」東亞主義與東協主義在此間的零星衝突，少了亞太主義在其間「平衡者」(Balancer)的角色。這個失衡的狀況，要到 Bush 政府上台後才得到紓緩，美國修正並強化東南亞政策，從推動民主人權與維持政經穩定兩方面著手，企圖維持並從中取得一個平衡點。<sup>309</sup>除此之外，為因應九一一所帶來的衝擊，美國順勢改變其戰略思維，以全球反恐為

---

<sup>305</sup> Richard Stubbs, "Sub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ASEAN: Military and Economic Imperatives and Political Obstacles," *Asian Survey*, Vol. 32, No. 5, 1992, pp. 397-401.

<sup>306</sup> Lam Lai Sing, "A Short Note on ASEAN: Great Power Interac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15, No. 4, 1994, pp. 451-463.

<sup>307</sup> Bilson Kurus, op. cit., p. 824.

<sup>308</sup> 同註 48，頁 54-57。

<sup>309</sup> 同註 48，頁 57-67。

對外政策主軸。加上東協區域內國家因種族、宗教等問題衍生出的衝突日增，在雙方「各取所需」的情況下，給予彼此再次合作的機會。美國與東協在區域安全與反恐等議題上進行合作，除了牽動著東亞三大主義的交鋒，也讓美國成功地重回東南亞地區，繼續發揮對該地區的影響力。

另一方面，中國「擔心」東協親密鄰邦面對崛起的中國時，會有疙瘩、不舒服，特別於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召開的博鰲亞洲論壇中，由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中國「和平崛起」(Heping Jueqi)的論調，強調中國不稱霸、遵守和平共處原則等基本立場。<sup>310</sup>胡錦濤在博鰲年會開幕儀式上，發表題為《中國的發展，亞洲的機遇》主旨的演講，他認為亞洲形勢總體趨向穩定，「和平、發展、合作」已成為亞洲前進的主流。亞洲目前依然是全球最具發展活力的地區，也持續是全球貿易的重要增長點之一。胡錦濤同時表示：中國堅持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堅持經由對話解決彼此間存在的歧見。由於今年（二〇〇四年）博鰲年會的議題，主要在建構「中國和平崛起」的論述，以對抗國際近來擔憂中國變成新興霸權的輿論。因此，胡錦濤在演說時特別強調：「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亞洲，亞洲的繁榮也需要中國」。他並揭櫫中國新的區域價值觀：中國將堅持「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希望與各國建立「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安全合作關係。<sup>311</sup>中國和平崛起的論調與中國主導的「博鰲亞洲論壇」相互輝映，目的就是以中國的觀點，藉由國際媒體「包裝」、「行銷」的手段，

---

<sup>310</sup> 「和平崛起」一詞最先是中共理論權威、前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於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三日，在「博鰲亞洲論壇」的演講。該年十二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時，首次公開全面地闡述所謂的「和平崛起」理論。「和平崛起」之理論架構宏大，內容涵蓋中國今後發展的內政、外交、文化和歷史等各種面向。換言之，就是宣稱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時機壯大自己；中國的崛起離不開世界，必須堅持開放政策，與世界友好國家發展經貿往來；中國的崛起不會妨礙別人，也不會威脅任何人，中國現在不稱霸，將來強大了也永遠不會稱霸。參見：林克，〈中國積極推銷「和平崛起論」〉，《商業周刊》，第 867 期，民 93.07.01，頁 110。

<sup>311</sup> 王銘義，〈博鰲論壇致詞 胡錦濤：中國盼與亞洲各國平等互信〉，《中國時報》，<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5+112004042500069,00.html>，民 93.04.25。

表達出中國對鄰邦國家的善意與穩定區域安全的大國作為，並極力減低「中國威脅論」在東亞地區擴散與蔓延的影響力。<sup>312</sup>

關於中國在東亞形塑的相關論點，東協諸國基本上仍有其看法及因應之道。東協「國際組織」的地位，已經被東協諸國視為一種有效的制度工具，<sup>313</sup>該等國家充分運用東協的特殊地位，操縱其對外的發展關係。同時，也可確保東協諸國在東亞地區的政經地位。東協諸國利用東協的特殊地位，搭起該等國家通往國際舞台的橋樑。換句話說，東協除了在國際舞台上展現集體的力量外，也急欲謀求東協國際地位的提升與自身國家利益的彰顯。另一方面，從把中國納入東協區域論壇開始，東協即「有計畫」地引導中國加入以東協為主的區域安全組織。<sup>314</sup>一九九四年讓中國加入東協區域論壇，給予雙方在互動及互信方面有了初步的接觸。

相較於「亞洲金融風暴」促成中國與東協間自由貿易區的整合運動，二〇〇二年十一月雙方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宣言」，不啻是東協與中國進一步合作的催化劑。該宣言將兩造在南海問題上的爭端解決，延續「（東協）南海宣言」的基調、定下了規範。同時，也將兩造當事國之南海行為，限縮在下列國際規範中：聯合國憲章、一九八二年聯合國海洋公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和平共存五原則，以及其他國際公認處理國與國關係的基本規範之國際法原則的目的與承諾。<sup>315</sup>而當中國與東協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時，除了延續「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宣言」

---

<sup>312</sup> 有關中國和平崛起的「官式」論點，可參見：中國新浪網、「中國和平崛起」網站，<http://news.sina.com.cn/z/peace/index.shtml>

<sup>313</sup> Bilson Kurus, op. cit., p. 822.

<sup>314</sup> 之所以說以東協為主，是因為東亞地區最重要的組織除了亞太經合會(APEC)外，東協及相關週邊組織便成為溝通東亞諸國歧見的溝通平台，東協區域論壇(ARF)即是顯例。亞太乃至於東亞地區的安全概念，主要依循著「共同性安全」(Common Security)以及「合作性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兩者。至於該區域的安全機制主要有：東協區域論壇及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SCAP)。前者屬官方第一軌道的溝通平台，後者則為非官方第二軌道。參見：林正義，〈亞太安全保障的新體系〉，《問題與研究》，第35卷，第12期，民85.12，頁1-18。

<sup>315</sup> 同註236，頁119。



的基本處理原則外，也讓東協先前「有計畫」誘導中國進入區域規範體系的策略成功達成。

東協對中國「計誘」的主要運作策略，就是實行與大國的「等距外交」策略，使大國間產生相互的制衡力量。<sup>316</sup>在此一交往狀態下，除可使東協自身保留對外政策的彈性外，也可進一步周旋於大國間，取得自身最有利的地位及實質利益。另一方面，在東亞區域安全議題上，東協諸國仍認為美國軍事力量駐守東南亞，是保持區域穩定不可或缺的條件，同時亦可保持美國、中國及日本間的權力平衡。在美、中、日三強中，美、日對於東協諸國不具有明顯的敵對威脅，同時又在經貿上有極大的互利關係。<sup>317</sup>所以，東協在軍事安全上持續與美國為首的亞太主義合作，運用與美國間的軍事合作，繼續與經貿大國日本交好，維持與中國間自由貿易區談判上較大的「議價空間」。而日本因急欲與東協間建立更緊密的經貿互動，看到中國與東協間積極的經貿整合，東協與日本間的貿易談判自然也會較為順利。此外，美日間又有軍事同盟的條約（美日安保條約），緊扣著東亞安全局勢。換句話說，東亞三大區域主義在此間的交會與互動，足以左右每一方、每一環節的行動與政策產出。

## 參、小結

延續前文東亞區域主義的論點，中國、東協，以及美國（含日本）三者間的互動，牽動著東亞區域間的縱橫擺盪。美國在冷戰後曾著手擘畫在亞太、甚至是東南亞地區的戰略藍圖，主要依循著經濟整合、政治民主化，以及新安全架構三大方向。<sup>318</sup>不過，美國從冷戰後一直在東南亞地區使不上力，直到九一一所帶來的

---

<sup>316</sup> Leszek Buszynski, "ASEAN, A Changing Regional Role," op. cit., p. 782.

<sup>317</sup> 有關美、日兩國與東協國家間的貿易往來，可參見表 4-1：中國與東協國家主要對外貿易夥伴。

<sup>318</sup> James A. Baker III, "America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5, winter, 1991/92, pp. 1-16.

全球反恐策略，才給予東協及美國進一步合作的空間。而中國面對美國「重回」東南亞地區的局勢，除了「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牌可以出之外，中國與東協間的經貿投資往來亦會持續加強。運用經濟上的誘因拉攏東協，同時稀釋東協國家對於中國吸引外資的不滿與恐慌，此外也可削弱美國、日本在此間的影響力。

此外，中國與東協間的關係，除了經貿上熱絡的合作之外，中國也進一步簽訂多項有助於彼此間和諧的條約，作一對外政策上的表態。首先，二〇〇二年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宣言」，為彼此間的合作釋放出更多利多消息，中國欲藉此化解雙方在南海問題上的歧見。再者，兩造更於二〇〇三年簽署象徵互不侵犯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中國如此作為有利於彼此間進一步的經貿整合，也有助於化解中國威脅論的迷思。

綜觀中國與東協在「軍事安全面向」的競合，除中國與東協間的互動之外，仍帶有美、日在其間的平衡者角色。同時，該等國家在競逐過程中，夾帶著東亞三大區域主義的互動與制衡。在軍事安全的面向，東協主義者由於歷史經驗、地緣關係，以及主權爭議等議題上的考量，<sup>319</sup>選擇以美國為首的亞太主義作為合作的對象，同時也與日本主導之海洋的東亞主義，持續維持緊密的經貿往來。東協主義者在此間的「等距外交」策略，除帶給東協諸國在安全上的保障外，也多了一重與中國就自由貿易區成立的相關談判過程，討價還價的保障和空間。而中國在軍事安全面向與東協間的互動，主要在於減低「中國威脅論」對雙方區域整合上的影響，藉由「和平崛起」等經過加工、包裝的論調，企圖縮小威脅論對彼此間合作的傷害。當然，中國在重新塑造區域形象的同時，也展現具體行動，與東協簽署「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宣言」及「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這些積極的作為，代表中國願

---

<sup>319</sup> Lam Lai Sing, op. cit., pp. 451-463.

意就與東協間針對南海問題歧見，運用相關國際法之規範和平解決爭端。如此，亦有助於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形成。此外，中國與東協間的合作也有可能因為彼此間歧見的化解，而將整合領域「外溢」到的其他部門。

### 第三節 區域結構的因素

「東協加一」或許可以視為中國與東南亞各「藩屬」間，建立的一項新關係？不過，不同的是，這一次中國一改重農抑商的傳統，改採重商主義的政策(Mercantilist Economic Policy)。而且，在建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初期，中國願意表現出大國的胸襟：首先、中國先開放市場，到若干時段後，東協再開放，讓東協先享受一段免關稅的利益，腳步站穩之後再對中國開放；其次、初期對寮國、柬埔寨、緬甸三國有更多的優惠，以便連帶解決東協內部經濟發展不均的問題。中國在在顯示出其寬大的一面，就如同「朝貢國制度」的精髓：中國的對外貿易係用以羈縻朝貢國，為大皇帝懷柔遠人的一種手段。中國在世界經濟地位中的特殊地位，及其不滿自身現狀地位的情況下，她是否會利用世界各國都急欲赴神州朝貢的心理因素，操弄把玩其掌間？一種新的國際不平等的「朝貢國制度」是否儼然形成？

#### 壹、朝貢國制度的「原型」

「朝貢國制度」(Tributary State System)是中國文化與歷史背景下的特殊產物。由於特殊的歷史與文化背景，中國一直缺乏近代意義的國際事務經驗，因而未能發展出以國際社會的存在為前提、以主權平等原則為基礎的外交關係。朝貢國制度一詞是外國學者提出的說法，這個說法說得最早、也說得最有力者，就是已故的哈佛大學教授 John King Fairbank (費正清)。在鴉片戰爭以前

(十九世紀中葉前)，中國的對外關係主軸就是如此。其表現的形式為以「天朝」自居的中國與藩屬間的上下關係。在此一關係中，只有以中國為中心形成一天下國，而沒有西方的國家觀念。藩屬對中國的義務，只有定期或不定期的朝貢，以示臣服。惟藩屬之數，常隨中國之興衰而有變化。透過朝貢國體系，中國亦將其他民族羈縻在以中國為核心之權力架構內，以求中國之穩定。所以，朝貢國制度原意是用來鞏固中國的國防，朝貢的國家就是臣服中國的藩屬。<sup>320</sup>

依照費正清的說法，朝貢國制度是儒家主張用於對外事務的一種運作及處置方式。儒家文化的世界秩序，是一種以中國為中心、具階級等差(Hierarchy)的關係結構，主要藉由強調文化與道德的高低水平，賦予統治者優勢地位之正當性。根據儒者的主張，中國皇帝行使政治權力是有倫理依據的。就如同仁君之所以能以德感召中國人民一樣，中國皇帝也必然可以吸引化外的蠻夷到中國朝廷來朝貢。以儒者的角度觀之，若處於邊陲、未開化的部落族群，不能欣賞中國文化的優越性，同時進一步企求享受中國文明所帶來的好處和利益時，這是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此外，外國一但承認中國天子至高無上的地位後，皇恩與臣屬間的互動關係就表現在繁文縟節的禮儀形式上：正式的賞賜與獻禮。獻禮朝貢成為中國朝廷的一項禮節，此也象徵著中國接納「夷狄」來沐化中華文化。這是中國皇帝賜與的恩典與特權，並非恥辱。所以藉由中華帝國的影響力，將此種朝貢關係擴散到東亞其他各地的同時，朝貢關係、朝貢國制度的禮儀觀就發展成一種手續、「規範」。<sup>321</sup>在以華夏文化為中心、以中國為核心的天下（區域結構），欲加入的外（番）邦，藉由朝貢的禮儀形式，取得一定的地位。

---

<sup>320</sup> 王曾才，《中國外交史要義》。台北：經世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82，頁25-27；梁伯華，《近代中國外交的巨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民80，頁6,1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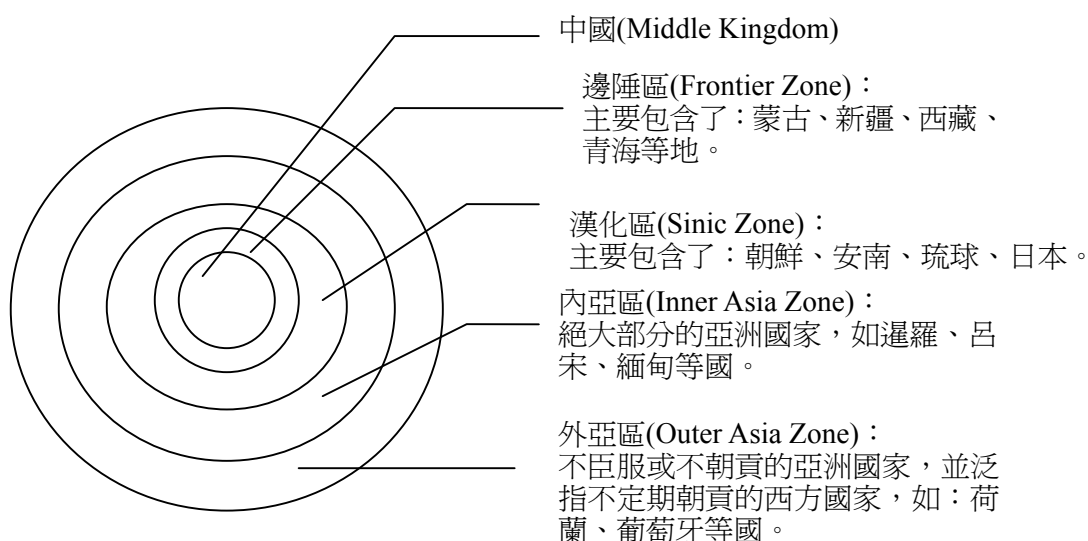
<sup>321</sup> Mark Mancall, "The Ch'ing Tribute System: An Interpretive Essay," in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72-84.

朝貢國制度除掉其文化與政治上的意義以外，另有其深厚的經濟基礎，這是它之所以能夠實行的主要因素之一。朝貢國向中國朝貢，除了向中國表達政治上的順從、效忠之外，更是與中國進行貿易關係的一種變形。中國的經濟，就東亞農業經濟的規模來看，是該地區中最發達的。中國一向自給自足而不待外求，因為其傳統的政策為重農賤商。可是東亞的其他國家，則欲藉通商來分享中國的繁榮，所以豐富的貿易利益成為該等國家向中國進貢的最大誘因。中國之所以允許對外貿易的存在，其主要原因也是由於政治上的需要。外國必須先取得朝貢國的資格，才有與中國在特定條件下通商的權利。透過冊封外國統治者的方式，中國賦予外國王室統治該國人民的政治正當性，而外國則以奉「正朔」回應之。同時，中國也必須為朝貢國的政治存續提供保護，在朝貢國發生政爭動亂時，中國必須出面調停、做出政治宣示，更甚者在必要時動用武力進行干涉，為順從中國的政權提供安全上的保障。另一方面，朝貢國家依據與中國在地理位置的遠近，以及與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親密程度，有不同親疏遠近的「貢期」。<sup>322</sup>

---

<sup>322</sup>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58-159.

圖 4-1：朝貢國制度結構圖



資料來源：梁伯華，《近代中國外交的巨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民 80，頁 15。

朝貢國體系的運作方式，是呈現不平等的階級等差關係。這與西方自一六四八年威斯特發里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後，形成的民族國家體系截然不同。在朝貢國制度下，中國與其他國家在政治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中國為朝貢國體系的中心（如圖 4-1 所示），同時也是體系中的最上層；其次，為受中國統治、管理，處於中國邊陲的「邊陲區」(Frontier Zone)；再者，就是「漢化區」(Sinic Zone)，包含朝鮮與安南、琉球等國。在「漢化區」的國家，主要是接受及採納了中國的典章制度；第四圈則為「內亞區」(Inner Asia Zone)，泛指絕大部分的亞洲國家，包含了暹羅（泰國）、呂宋（菲律賓）及緬甸等國。在「內亞區」的國家，主要是對中國稱臣納貢的朝貢國；最後，則為「外亞區」(Outer Asia Zone)，包含不臣服或不朝貢的國家，同時也泛指不定期朝貢的西方國家，例如荷蘭及葡萄牙等國。<sup>323</sup> 在此一階級等差的國際關係層級之結構（區域結構）中，朝鮮、安南、與琉球等國尊奉中國為「上國」，

<sup>323</sup> 同註 320，梁伯華，《近代中國外交的巨變》，頁 14。

承認文化及政治地位上未若中國，同時該等國家也稱呼日本、柬埔寨等國為「蠻夷」，藉此彰顯該等國家不同於「蠻夷」國家的優越地位。<sup>324</sup>至於，沒有透過朝貢國制度承認中國政治、文化優越地位的國家，中國與之政治關係更摸不著邊際，在文化上也被歸類為蠻夷之邦。

除此之外，中國與各國間的權利義務也是呈現不對等的。由於中國處於朝貢國體系的中心，以最高的道德及文化地位自居，所以在政治上除要「德威廣播」外，在經濟上也應「厚往薄來」，以收懷柔遠人之效。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中國的觀念認為藉由對外貿易無從促進國家富有。所以，中國的對外貿易係用以羈縻朝貢國，為大皇帝懷柔遠人的一種手段。而一般朝貢國也以朝貢為幌子，以通商為實質目的，是故朝貢與通商為一體之兩面：中國所重視者為朝貢的精神價值，朝貢國所追求者為通商的實際利益。<sup>325</sup>

## 貳、歷史與現場

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受到中國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的影響，在十九世紀以前，中國對待東南亞諸「邦」的態度，完全是採取君臨天下的天朝心態。由於地理上的相近、再加上中國以朝貢國制度為對外關係的處理模式，使東南亞諸國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此外，前文提及東南亞地區主要可區分為大陸的東南亞及島嶼的東南亞，<sup>326</sup>前者受到中國「羈縻」的程度大於後者。大陸的東南亞各國不時與中國有所衝突，不過該等國家一直維持自身獨立的狀態；而島嶼的東南亞諸國由於距離中國較遠，通常以朝

---

<sup>324</sup> Truong Buu Lam, "Intervention Versus Tribute in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1788-1790," in John King Fairbank, ed., op. cit., pp. 178-179.

<sup>325</sup> 同註 320，王曾才，《中國外交史要義》，頁 30。

<sup>326</sup> 有關東協成立前的東南亞地區相關歷史敘述，請參見第三章，第一節、第「壹」部分：東南亞地區的歷史與發展。

貢為名義進行貿易，幾乎沒有受到中國的武力威脅。另一方面，中國對東南亞諸國間的關係也僅止於貿易的恩賜，在政治上也甚少干預，只要各國表現出對中國進行朝貢、表達順服之意，同時不對中國本部進行侵擾，中國就完全放任東南亞諸國處理自身及彼此間事務，不加干涉。<sup>327</sup>

在朝貢國制度之下，中國在東南亞發揮影響力的鼎盛時期，為十五世紀鄭和下西洋的遠航之旅。Nicholas D. Kristof（紀思道）也盛讚鄭和下西洋對中國的影響甚大，更稱鄭和為中國哥倫布。<sup>328</sup>鄭和下西洋挾其龐大的政經及軍事力量進行武力展示，使東南亞諸國臣服於中國的權威之下。而中國概念的天下秩序，除了運用朝貢國制度顯示出的階級等差外，還需經由強大的武力展示，才能彰顯出中國在朝貢國體制下安全上的優勢。<sup>329</sup>另一方面，從歷史過程觀之，中國對東南亞諸國沒有佔領及納入版圖的意願，只有越南曾經納入中國版圖（僅該國北部）。換言之，中國滿足東南亞諸國形式上及「面子」上的稱臣，較願意接受朝貢國制度下諸國的臣服，對於實質佔領、治理則意願不高。

此外，「現代」中國表面上冠冕堂皇地表示與各國是處於平等的地位，但實際上中國「內心」世界依然烙印著深刻的記痕，打從心底認定該等國家文化上不如中國而且低下。或許（未來）只要有機會，中國仍會認為外國都是次等國家，是不配與中國平起平坐的，<sup>330</sup>只是這個時機尚未來到。至於，「傳統」中國沒有事事干涉東南亞諸國，對之採取放任的態度，主要也是基於該等國家承認中國在此間的霸權地位。

---

<sup>327</sup> 陳欣之，〈東協諸國對「中國威脅論」的看法與回應〉，《問題與研究》，第35卷，第11期，民85.11，頁16。

<sup>328</sup> 同註162，頁35。

<sup>329</sup> Wang Gungwu, "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Background Essay," in John King Fairbank, ed., op. cit., p. 61.

<sup>330</sup> Ibid.



## 一、大皇帝的焦慮：中國陷入朝貢國制度迷思

基於上述特殊的歷史過程，中國對東協諸國的策略及關係，主要反映在兩個重要的立場：一、由於歷史淵源和地理的因素，中國始終將東南亞視為勢力範圍，甚至以「宗主國」的心態自居，對於其他強權勢力的介入深具戒心；二、從中國的區域安全策略來看，假設中國無法掌握邊界地帶，將會危害中國安全。換言之，若中國對東南亞發展局勢無法掌握、發揮影響力時，如此將會嚴重危害到中國心理上的安全，進而產生內部的不安和失序。<sup>331</sup>除此之外，美、日在此間的經濟影響力，尤其是日本身為東亞經濟體的「雁頭」地位，主宰著東協諸國的經濟命脈，讓中國在該區域的優勢備受挑戰。

中國的「焦慮」其實出於自身心態上的思考模式，不過在一九九二年的中共十四大之後，中國在觀念上有了重大的轉變。中國修正其外交發展策略，不再以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掛帥，改採現實的經濟利益為其對外方針，同時追求區域政治經濟上的優勢。此種觀念上的轉變，有助於中國與東協間進一步的互動，雙方從根本的意識形態對抗，轉為實質利益關係的追求，同時也從衝突對立轉為相互結合的互賴關係。<sup>332</sup>不過，中國對於南海主權的堅持，成為與東協諸國合作的絆腳石。一九九二年美國因冷戰結束後，調整其全球戰略佈局從菲律賓撤軍後，「中國威脅論」的陰影即籠罩在南海上空。<sup>333</sup>東協諸國憂慮中國在南海興風作浪，也源自其歷史淵源，在美國為首的亞太主義勢力的軍力部署撤出，使東協主義在東亞三大區域主義的結構中，無法取得平衡，結構重心往大陸的東亞主義傾斜。即便中國離所謂朝貢國制度的

---

<sup>331</sup> John Cooper,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Donald E. Weatherbee, ed., *Southeast Asia Divided: The ASEAN-Indochina Crisi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5, pp. 48-50.

<sup>332</sup> 宋鎮照，〈解析後冷戰時期東協對外政經發展策略〉，《東南亞季刊》，第2卷，第4期，民86.10，頁48。

<sup>333</sup> Ross H. Munro, op. cit., pp. 10-16.

榮景還有一段距離，區域的政治經濟優勢也尚未形成。這個區域結構失衡的情況，要等到九一一之後美國主導的亞太主義回流後，才逐漸改善。

## 二、中國與東協（東南亞）：互動與轉變

至於在東協部份，原本在朝貢國制度下的東南亞國家，主要著眼於中國的繁榮經濟與廣大市場，換言之東南亞諸國藉通商來分享中國的繁榮，所以豐厚的貿易利益成為該等國家向中國進貢的最大誘因。而且，朝貢國制度除掉其文化上與政治上的意義以外，就是具有深厚的經濟基礎和「利之所趨」的誘因，這是它之所以能夠實行的主要因素之一。朝貢國向中國朝貢，除了形式上向中國表達政治上的順從、效忠之外，更是與中國進行貿易關係的一種「藉口」。另一方面，在朝貢國制度下中國與東南亞諸國雙方的貿易關係為「厚往薄來」，是中國大皇帝單方面(One-Way)「賞賜」朝貢國豐厚贈禮，同時給予該等國家來到中國通商貿易的機會。<sup>334</sup>

再換個角度觀之，中國與東協間自由貿易區的成立，中國展現了極大的整合意願，同時也提出雙方合作初期的整合誘因。從表面上來看，中國的運作方式似乎尚未脫離其自身所烙印的歷史記憶(History-Minded)。不過，中國在期間的歷史洪流中，仍是有所改變的，現在中國的思維方式不僅只是大皇帝「懷柔遠人」的手段而已，其策略走向業經轉向，改採西方民族國家（威斯特發里亞體系）追求國家利益的路子。Vincent Wei-cheng Wang 認為，「新中國」與舊中國有著主要的不同：後者是以文化作為認同及恩賜的指標，以文化優越取代實質的征服，同時其運作方式是單方面的授與；而新中國則是採取了較為務實的策略手法，除了適

---

<sup>334</sup> John King Fairbank 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12-113.

應在全球化下的諸多挑戰外，在面臨東協及美日等國「威脅論」四起，中國另闢道路改採「和平崛起」的論調，並自行沉潛「韜光養晦」(Taoguang Yanghui)，嘗試運用理性自利的手法，取得其在政治、經濟，甚至是軍事上的發展，充實其綜合國力。<sup>335</sup>

### 三、「人外有人」：美國在此間的角色

另一方面，美國作為冷戰後世界唯一霸權，其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更是不容忽視。面對東亞經濟的勃興，美國逐漸改變傳統「重歐輕亞」的策略，開始積極主導亞太乃至於東亞地區的合作，極力捍衛美國在此間的現實利益，亞太經合會即為美國主導下的產物。以美國為首的亞太主義，運用亞太經合會作為與東亞諸國溝通的管道。為了推動、遂行亞太主義，美國必須經常平衡中、日東亞主義間的衝突，以及用妥協或聯合方式來化解來自東協主義者的壓力。此外，為因應九一一所帶來的衝擊，美國順勢改變其全球佈局，以反恐的戰略思維為其對外政策的主軸。加上東協諸國因為種族、宗教等問題而衍生出的衝突日增，在雙方均有共識及利益的情況下，給予彼此再次合作的機會。美國與東協在區域安全與反恐等議題上進行合作，除了牽動著東亞三大主義的交鋒，也讓美國成功地重回東南亞地區，繼續發揮對該區域的影響力。

如同前文所述，中國在朝貢國制度下的鼎盛期，為十五世紀鄭和下西洋的創舉，成功地運用七次武力展示的機會，奠定了中國在此間政治、經濟、安全上的優越性，也由於安全上的出眾，給予朝貢國制度更完備的運作空間。不過，這都隨著中國國力的衰退逐漸式微，中國嚐盡百年來的羞辱(Century of Humiliation)，<sup>336</sup>直到近年經濟發展快速後，才慢慢回神過來。從歷史變遷、權力

---

<sup>335</sup> Vincent Wei-cheng Wang, op. cit., p.14.

<sup>336</sup> Ibid.

填補的角度來看，現今在中國全力營造和平崛起論調的同時，東亞地區早為三大勢力（區域主義）所掌握，而中國僅為其中一股勢力。換句話說，朝貢國制度瓦解近百年後，東亞地區的區域結構業經過變遷，東亞三大區域主義在其間的競合，已為大勢所趨。

### 參、強龍壓垮地頭蛇？

#### 東亞區域主義 VS. 朝貢國制度

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受到國際政治、經濟及歷史變遷的制約。隨著冷戰結束、外來影響力的減弱，東亞諸國的自主性逐漸提高，較有能力抗拒區域外先進國家的支配，也更有能力推動利己的區域主義。在東亞特殊的區域結構發展，其實是填補了朝貢國制度瓦解後的東亞區域結構。朝貢國制度下中國的霸業一分為三，東亞三大區域主義適時填補了中國勢力衰退的空缺。

一九九二年美國從菲律賓撤兵，再加上中國在南海積極的作為，一時間引發「中國威脅論」等諸多臆測性的探討。這些看法真實呈現中國逐漸增長國力的事實，相關國家穿鑿附會就是擔心東亞地區權力的失衡。此一時期，確實造成東亞三大區域主義間的失衡，一方面東協主義者尚在內耗不成氣候，而經濟大國日本主導之海洋的東亞主義，在缺乏亞太主義的奧援下，甚難與大陸的東亞主義在軍事上相抗衡。中國在起初的確盛氣凌人地主張南海主權，造成與東協諸國間的摩擦，也製造了互不信任的心結。這對於雙方未來的合作，蒙上一層陰影。中國在日後必須用「和平崛起」、「韜光養晦」等宣傳字眼，低調不露痕跡地追求自身國家利益與提升其綜合國力。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上升，中國在處理對外事務上將更加務實，同時也調整其心態，不再以受害者自居。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力求扮演負責任、愛好和平的大國角色。中國也不再以第三世界

為其目標，轉以強調「大國外交」、多邊主義的策略手法，遂行其國家利益。所以，不論面對權力真空論、中國威脅論，抑或「權力轉移」的說法，再加上中國礙於國力與美國間的差距，中國並不急著形塑新的區域結構，反而必需更加「韜光養晦」。中國對其外交政策改弦更張，不再堅持其「反霸」立場，改採「搭車」、「超越」的柔性反霸策略。透過積極參與多邊經濟、安全組織活動，以「新安全觀」為主要訴求，塑造中國愛好和平的大國形象，尋求制定對中國有利、所謂合理公正的國際規範。<sup>337</sup>

另一方面，Ross Terrill（譚若思）的觀點認為，中國雖然曾韜光養晦，骨子裡仍帶有帝國的成分，即便對外塑造愛好和平的大國形象，但是北京從未放棄從前的帝國行徑。<sup>338</sup> 換句話說，受限於「實力」、外在（國際）環境的制約，中國對於形塑新的區域結構、甚至重返朝貢國制度的道路尚遠。不過，中國追求一個新的朝貢國「精神」，似乎較為容易：中國透過其戰略思維，需先站穩東亞地區，從象徵性的準區域霸權，提升到實質的區域霸權；此外，經由外交活動塑造其愛好和平的形象，同時中國也極注重面子，以形式、排場取勝；<sup>339</sup> 最後，中國以提升綜合國力為國家的發展目標，全力拓展其國家利益。<sup>340</sup>

延續本論文之核心—東亞區域主義的探討，東亞三大區域主義的交會與變遷，著實影響東亞地區多方勢力的競合。朝貢國制度作為中國鼎盛時期之對外運作方式，在現今東亞區域舞台上的揮灑空間仍屬有限。特別是東協主義在經歷亞洲金融風暴後，內部的「區域認同」及整合的使命感，均有所提升，再加上其「等

---

<sup>337</sup> 于有慧，〈中共外交政策走向與選擇〉，《問題與研究》，第43卷，第1期，民93.01-93.02，頁121。

<sup>338</sup> 楊明暉、潘勛、王嘉源、尹德瀚、鍾蓮瑛與蔡繼光譯，Ross Terrill（譚若思）著，《一中帝國大夢》(The New Chinese Empire)。台北：雅言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93，頁59。

<sup>339</sup> 同上註，頁284-289。

<sup>340</sup> 所謂的「新中國」其對外政策是以國家利益為依歸，不再僅是重農賤商的受朝貢國。所以，一個新朝貢國「精神」的浮現是有可能的，伴隨著區域霸權、「面子」以及國家利益三個要素的「精神」，正嘗試左右著中國對外政策的產出。新朝貢國「精神」=區域霸權+「面子」+國家利益？

距外交」的策略手法奏效，已經漸與日本、中國，形成東亞地區三足鼎立的局面。<sup>34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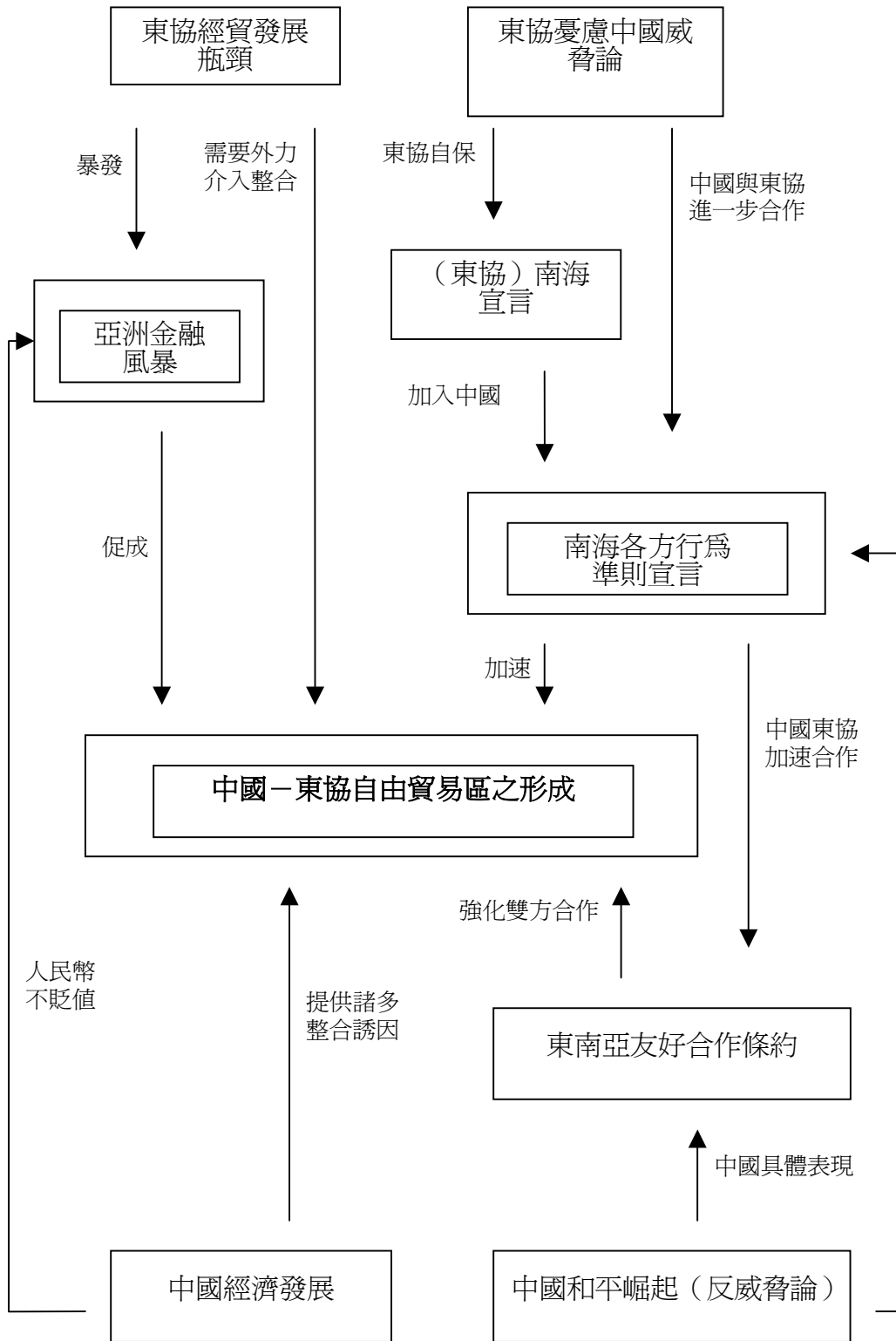
## 第四節 結 語

本章探討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之形成，主要從中國與東協雙方之觀點及彼此間的互動出發，分別以政治經濟、軍事安全，以及區域結構三個面向，來說明「東協加一」的形成。延續本論文之「論文場域」，以東亞區域主義變遷做為主軸，說明「研究標的」兩造間的互動。茲就本章探究的重心：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之形成，佐以「經濟政治的考量」以及「軍事安全的面向」等相關因素之影響，以圖 4-2 表示之：

---

<sup>341</sup> 同註 70。

圖 4-2：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之形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如圖 4-2 所示，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之形成，在「經濟政治考量」上及「軍事安全面向」上，均有推動的時間點及關鍵事件。前者即為亞洲金融風暴，時間點為一九九七、九八年間，中國在亞洲金融風暴的作為（人民幣不貶值政策）促成中國與東協間的區域整合。另一方面，由於東協及東協諸國在經貿發展出現瓶頸，除內部整合因發展不一而需要外力介入協助之外，中國適時提出整合誘因，均為雙方進一步合作的契機；至於軍事安全的部分，由於東協諸國長期憂慮中國威脅論所帶來的不安，尤其是南海問題衍生區域的不穩定。這項憂慮直到二〇〇二年，中國與東協簽署「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宣言」後，雙方在自由貿易區的整合運動上又向前邁進了一步。而二〇〇三年雙方簽署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使兩造在整合的議程上進展順利，因為該條約等同互不侵犯條約，中國實質上已成為東協「第十一國」。換言之，雙方在國際條約架構下的運作模式，已大致完備。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推動，讓該自由貿易區一方面成為東協內部的整合平台，另一方面該自由貿易區又是東亞進一步整合的試金石。此外，對中國來說，雖提供多項優惠給予越南、緬甸、寮國、柬埔寨，一併解決東協內部發展不一的結構性因素，不過也有助於中國戰略發展上西部大開發的執行。另外，中國針對越、緬、寮、柬等國提供優惠，亦有其地緣及擴增影響力的考量。例如中國支持緬甸獨裁軍政府，減輕了東南亞國家執意要緬甸加入東協所帶來的區域外壓力。<sup>342</sup>透過越、緬、寮、柬等與中國有密切地緣關係國家的合作，同時施展在其間的影響力，對中國在區域經濟事務上的地位助益甚多，畢竟對東協國家而言，快速成長的中國經濟和人口，無疑是她們經濟上的領航員。<sup>343</sup>

在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形成部份：在經濟面向上，東協

<sup>342</sup> 歐美等國以緬甸違反人權和民主，堅持「不樂見」緬甸加入東協。

<sup>343</sup> William Choong, "China Can Fuel Demand for Asian Exports," *The Straits Times*, Dec. 18, 2001.



需要外來力量，尤其是大國「介入」東協內部發展程度不一的整合問題。藉由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成立，除透過中國釋放極大善意與開發較緩的四國外，東協也要利用中國吸引外資的能力，運用區域化整合達到外資回流的效果。此外，中國與東協的合作表面上是政治面大於經濟面，不過實際上中國也可藉由此項合作計畫，讓國家內部發展程度不均的問題，做一適度的解決，例如配合西部大開發的跨世紀重大方針即為顯例。

在安全上，東協有必要將中國導入合作機制，通過制度規範將中國角色定位在友好經濟夥伴，透過雙方同意的運作程序，面對彼此間的糾葛，能運用現存的溝通協調機制和平解決。尤其是東協在意的南海問題，中國除表達「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外，中國以簽署「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宣言」及「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作表態，除讓東協寬心外，也有助於區域穩定，同時和東協間仍有進一步「外溢」(Spill-Over)的合作空間。

至於在區域結構因素的部分，短期之內東亞地區要重回「朝貢國制度」似乎是十分困難的。由於中國崛起引起的諸多討論及臆測，有可能因中國「自行認定」的沉潛及韜光養晦，暫時得到紓緩。不過，中國致力追求提升綜合國力及區域影響力的企圖，卻是不爭的事實。另一方面，在後九一一的全球反恐大旗下，東協諸國因國內宗教與族群衍生出的恐怖攻擊活動，與美國在區域穩定、軍事安全上密切合作，讓美國主導的亞太主義勢力回流，重新拼湊東亞地區的權力版圖。

延續本論文之核心論點—東亞區域主義的探討，東亞三大區域主義的交會與變遷，深深地影響著東亞地區多方勢力的競合。在東亞仍是三大區域主義鼎立的局面，在軍事方面，東協主義與亞太主義合作反恐；不過在經濟上，東協主義則與「大陸的東亞主義」合作，成立自由貿易區進行區域內、外的整合。此外，東

協主義者運用「等距外交」的策略手法與「海洋的東亞主義」交好，同時與中國、日本保持等距的合作發展，以利於取得更好的戰略位置。

# 第五章 結 論

##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在冷戰結束之後，國際社會的互動已漸由政治、軍事上的衝突，轉移到經濟、貿易上的合作與競爭。在此一國際大環境下，國際間為因應當前的政經局勢，由區域主義所延伸出的多項區域整合運動及機構，做為在此一趨勢下、區域主義間競合的自保及應變之道。在東亞地區潛藏著三大「品牌」的區域主義，主要有以美國為首的亞太主義、中國與日本相互競逐影響力的東亞主義，以及東協主導的東協主義。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受到國際政治、經濟，以及歷史變遷等多重的影響。三大區域主義間彼此的互動及交會，可視為國際社會政經局勢發展，另一種形式上的延續。

本文從東亞區域主義變遷出發，運用三大區域主義間的交會與變遷，探討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之形成，依此構成本論文主要研究場域。另一方面，從東亞三大區域主義間的互動中，可抽取出中國與東協間就自由貿易區之形成過程，雙方與其他勢力間的合縱連橫，連帶促使兩造作出不同的策略選擇。較為明顯的發展趨勢為：在軍事方面，東協主義與亞太主義在國際反恐的氛圍下，合作打擊恐怖主義；不過，在經濟面向上，東協主義則與「大陸的東亞主義」合作，成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進行區域內、外的整合。此外，東協主義者又運用「等距外交」的策略手法與「海洋的東亞主義」交好，同時與中國、日本保持等距的合作發展，以利於取得更好的戰略位置。換言之，東協主義在經歷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其內部的「區域認同」及整合的使命感，均有所提升，再加上其「等距外交」的策略手法奏效，已漸與中國、日

本，形成東亞地區三足鼎立的發展趨勢。<sup>344</sup>

在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形成原因，本文主要從「經濟政治考量」、「軍事安全面向」及「區域結構因素」三者進一步加以分析、探討。如圖 4-2 所示，首先依循經濟政治考量及軍事安全面向加以說明，在這兩個分析因素下，對自由貿易區的形成均有推動的關鍵事件及時間點。在左圖（圖 4-2）的部分，即為經濟上的考量，關鍵事件為亞洲金融風暴，時間點於一九九七、九八年間。中國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的作為—人民幣不貶值政策，促成中國與東協間的區域整合。此外，由於東協諸國在經貿發展出現瓶頸，除內部整合因發展不一而需要外力介入協助外，中國適時提出整合誘因及動力，開啟雙方進一步合作的契機。兩造間的合作氣氛，至二〇〇二年十一月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架構（框架）協定」時達到高峰，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成立也正式以條約文字確立。

即便如此，中國與東協間進一步合作的動力尚未打開，且兩造仍在尋求彼此間的「互信」機制。由於東協諸國長期憂慮「中國威脅論」所帶來區域的不穩定，尤其是南海問題。這項憂慮直到二〇〇二年，中國與東協簽署「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宣言」後，雙方在自由貿易區的整合運動上，又向前邁進了一步。如圖 4-2 右半部分所示，在軍事安全面向上東協長期盤據心頭的憂慮，即為中國在南海的不友善作為，尤其是標誌著領土主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大旗。中國如此「愛國」的行徑，非但未能解決南海問題，反而製造區域不安與東協諸國的憂慮。兩造簽署「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宣言」後，可暫時化解東協對中國威脅、崛起所帶來的疑慮。同時，經由條約文字化的確立，可為雙方未來的爭端解決，提供政治基礎和保障。「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宣言」的簽署，紓緩中國和東協間的「嫌隙」。而二〇〇三年雙方簽署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

---

<sup>344</sup> 同註 70。

約」，使兩造在區域整合的議程上進展順利，因為該條約等同互不侵犯條約，中國實質上已成為東協「第十一國」。換言之，雙方在國際條約架構下運作的模式，已大致完備。

至於，在「區域結構因素」的部分，本文延續東亞三大區域主義的核心論點，認為東亞地區要重回「朝貢國制度」並非易事。由於朝貢國制度已瓦解百年之久，且中國尚在「崛起」階段，中國以致力提升綜合國力及區域影響力為首要策略，並非與霸權爭霸競逐。此外，東亞三大區域主義在「朝貢國制度」衰敗後，填補了此間區域結構的權力真空。換言之，以目前的發展趨勢，東亞三大區域主義仍主宰及影響區域結構的發展，三大「品牌」的區域主義依舊各擅其位，三者間的互動與交會牽動著東亞地區的權力版圖。

相較於其他文獻的分析及說明，本文運用東亞區域主義變遷，探討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形成，為一研究之方向及初步的成果。另外，針對中國與東協間的互動關係，相關文獻著作頗豐。<sup>345</sup>不過，本文嘗試處理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形成之因，同時欲藉由圖 4-2 之標示，說明自由貿易區形成的關鍵事件與時間點。通過「經濟政治考量」及「軍事安全面向」的分析，以期能明確地指出自由貿易區形成的原因，及重要的關鍵因素。筆者希冀本文對該區域研究之領域，有填充部分內容空隙的作用。

## 第二節 論文省思及未來研究方向

---

<sup>345</sup> 茲舉數例提供參考：朱萍，〈論中共與東協成立自由貿易區的戰略與影響分析〉，碩士論文，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民 92；李元桐，〈區域貿易協定之政策發展研究：以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為例〉，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民 92；陳揮民，〈後冷戰時期中國大陸與東協關係發展之研究〉，碩士論文，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民 91。另外，關於期刊的部分可參見：參考書目。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成立，主要肇因於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生。為了防範下一個金融風暴的到來，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除了作為雙方經貿整合的「工具」之外，更是整個東亞區域整合的發動機和合作介面。延續東亞區域主義中三大次主義的匯流，東協以務實的手法，藉著與其他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方式進行雙邊談判與合作，主要著眼於東協內部「百廢待舉」的整合時程。此外，東協也運用若干現實主義的手法，縱橫擺盪在中、美、日、韓等國，利用彼此間的猜忌、競爭與合作，藉由「等距交往」的原則，東協的對外政策才能更有彈性，亦能取得東協組織的最大利益。惟有一點是東協國家內部急需克服的，就是在因應全球化趨勢以及區域化的問題時，針對區域內個別國家與區域外國家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問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若有違區域整合協議時，要以「區域利益」為重抑或是以「國家利益」為重，這是區域整合時相關國家急需面臨的抉擇之一。

另一方面，中國與東協儘管雙方針對「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成立，均有強烈的整合動機和意願，同時兩造關於軍事安全面向上的糾葛，通過國際條約的簽署，形成爭端解決的機制。即便雙方在相關整合議題方面的立場與利益上完全一致，兩造間還是存在下列幾種困難及挑戰：

一、自由貿易區的運作：由於在亞太主義主導下的亞太經合會，是在「開放性」區域主義下運作。同時，開放性區域主義也為區域主義發展的新趨勢。Leszek Buszynski 認為東協現今面臨的是，新舊區域主義間的衝擊。舊區域主義被定義為冷戰時的產物，具內向型、排外的，且大都是出於各國政府為特定安全或經濟目的所做的安排；不過新區域主義則是外向型、非排他的，同時具有多元的功能。<sup>346</sup>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該採行何種方式，除了

---

<sup>346</sup> Leszek Buszynski, "ASEAN's New Challenges." op. cit., p. 555.

考驗彼此的合作默契，也會影響到區域外其他國家的策略思維與觀感。

二、關於自由貿易區的領導權：從東協與東亞地區其他勢力交好的作為得知，東協一貫的「等距外交」策略，多少帶有現實主義色彩，欲利用東協十國的集體力量，與中國達到「平起平坐」的地位。而中國搶在「東協加三」醞釀前，即運作「東協加一」，其間的政治動機也十分清楚。不過，目前「東協加三」的相關議程仍持續進行。換言之，中國與東協甚至與日本間就東亞區域整合的角力還未停歇。

三、關於對外貿易與爭取外資進駐：從東協與中國的產業結構、人力資源等面向觀之，兩者諸多要素皆屬一致，且中國與東協國家屬開發中國家，彼此仍相互競逐外資及市場。<sup>347</sup>即便中國運用中資給予東協諸國在外資上加碼，但彼此間結構性因素仍然存在。除此之外，東協在中國熱(China Fever)的風潮下，也搶搭順風車錢進中國，但是將資本轉移至中國無異犧牲本國的經貿發展。<sup>348</sup>中國與東協間的整合之路，還需時間檢證。

四、關於南海問題：中國與東協間關於自由貿易區的成立，除了經濟貿易面向的考量外，雙方最大的歧見就是關於南海問題的爭議。雖然中國與東協已簽署「南海各方行為準則宣言」以及象徵互不侵犯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但是否履行條約及遵從「條約必須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的國際法原則，是後續值得觀察的重點。之所以會對中國產生如此質疑，其實是出自中國在加入世貿後，相關規範的遵守與實踐，缺乏誠意。<sup>349</sup>

---

<sup>347</sup> John Wang and Sarah Chen, op. cit., pp. 507-526.

<sup>348</sup> Lai To Lee, "China's Relations with ASEAN: Partner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Pacific Review*, Vol. 13, No. 1, 2001, p. 67.

<sup>349</sup> 滄海月，〈中國愛要賴 國際社會漸不耐〉，《Taiwan News 財經文化周刊》，第 136 期，民 93.06.03，頁 62-64。

最後，針對未來研究方向的部分，由於本文從東亞區域主義變遷出發，運用東亞三大區域主義間의 交會與變遷，探討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之形成。東亞三大區域主義動靜間都影響東亞區域的發展與變化，在此一結構氛圍下，就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形成過程及原因作探討，兩方面皆屬動態的狀態：東亞區域主義間的競合是現在進行式，且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亦為進行中的整合運動。換言之，本論文選擇「經濟政治考量」及「軍事安全面向」，作為分析中國與東協間互動過程及相關思維模式，同時在「慢速」的情況下，從東亞區域主義的核心概念，探討自由貿易區的形成。

除了「經濟政治考量」及「軍事安全面向」外，還有其他面向值得未來深入探討。此外，在「區域結構因素」部分，由於該區域結構性的制約，使東亞傳統朝貢國制度式微，再加上東亞地區已為三大品牌的區域主義所盤據，三方彼此牽制維持區域的平衡狀態。東亞區域主義在未來會不會朝某一方傾斜，中國與東協就自由貿易區的後續發展，亦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 參考書目

## 壹、中文部分

### 一、書籍

- 王曾才，《中國外交史要義》。台北：經世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82。
- 王逸舟，《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 88。
- 朱浚源編，《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 88。
- 李文志，《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從扇形戰略到新太平洋共同體》。台北：憬藝出版社，民 86。
- 李明譯，Joseph E. Stiglitz 著，《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台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 91。
- 李美華、孔祥明、林嘉娟與王婷玉等譯，Earl Babbie 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台北：時英出版社，民 87。
- 李登科、林文程、林正義、劉德海與鄧中堅，《國際政治》。台北：國立空中大學，民 85。
- 沈宗瑞、高少凡、許湘濤與陳淑鈴譯，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著，《全球化大轉變》(Global Transformations)。台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民 90。
- 宋鎮照，《東協國家之政經發展》。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 85。
- 林若零譯，Michael R. J. Vatikiotis 著，《東南亞政治與發展》(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台北：韋伯文化事業出

- 版社，民 88。
- 林碧炤，《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 88。
- 林添貴、顧淑馨譯，Henry A. Kissinger 著，《大外交》(Diplomacy)。台北：智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民 87。
- \_\_\_\_\_譯，Nicholas D. Kristof (紀思道) and Sheryl WuDunn (伍潔芳) 著，《東方驚雷》(Thunder from the East)。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92。
-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 92。
-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 92。
- 宮占奎、孟夏與劉晨陽，《中國與東盟經濟一體化：模式比較與政策選擇》。北京：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民 92。
- 陳欣之，《東南亞安全》。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 88。
- 陳漢文，《在國際舞台上：西方現代國際關係學淺說》。台北：谷風出版社，民 76。
- 陳鴻瑜，《東南亞國家協會之發展》。南投：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民 86。
- 張亞中，《歐洲統合：政府間主義與超國家主義之互動》。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88。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台北：曉園出版社有限公司，民 83。
- 梁伯華，《近代中國外交的巨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民 80。
- 黃碩風，《綜合國力新論—兼論新中國綜合國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民 88。
- 彭 澎，《國際政治經濟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民 90。
- 楊明暉、潘勛、王嘉源、尹德瀚、鍾蓮瑛與蔡繼光譯，Ross Terrill (譚若思) 著，《一中帝國大夢》(The New Chinese Empire)。台北：雅言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 93。
- 蔡百銓譯，D. R. SarDesai 著，《東南亞史》(Southeast Asia: Past and

Present) 。台北：麥田出版，民 90。

蔡東杰，《中國外交史》。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有限公司，民 89。

\_\_\_\_\_，《西洋外交史》。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有限公司，民 90。

\_\_\_\_\_譯，Joseph S. Nye, Jr. 著，《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台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 91。

蔡繼光譯，Michael Mandelbaum 著，《征服世界的理念》(The Ideas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台北：雅言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 93。

蕭全政編，《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台北：業強出版社，民 85。

## 二、期刊

于有慧，〈中共外交政策走向與選擇〉，《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1 期，民 93.01-93.02，頁 105-121。

李國雄，〈東協的區域組織發展與挑戰〉，《問題與研究》，第 34 卷，第 4 期，民 84.04，頁 12-27。

\_\_\_\_\_，〈東協安全機制的演變與區域秩序〉，《問題與研究》，第 34 卷，第 9 期，民 84.09，頁 21-40。

吳祖田，〈「東南亞國家協會」組織之發展與回顧〉，《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8 期，民 87.08，頁 35-48。

吳福成，〈亞洲的新震撼：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25 卷，第 7 期，民 91.07，頁 47-53。

宋鎮照，〈台海兩岸與東南亞國家之關係與策略〉，《問題與研究》，第 35 卷，第 5 期，民 85.05，頁 15-28。

\_\_\_\_\_，〈解析後冷戰時期東協對外政經發展策略〉，《東南亞季刊》，第 2 卷，第 4 期，民 86.10，頁 34-60。

\_\_\_\_\_，〈東方與西方價值保衛戰—吉隆坡東協高峰會之政治經濟意涵〉，《海峽評論》，第 85 期，民 87.01，頁 21-24。

- 林正義，〈亞太安全保障的新體系〉，《問題與研究》，第 35 卷，第 12 期，民 85.12，頁 1-18。
- 林欽明，〈東協區域經濟整合〉，《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25 卷，第 7 期，民 91.07，頁 61-68。
- 金榮勇，〈東南亞金融風暴的起因、影響與展望〉，《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1 期，民 87.01，頁 1-14。
- \_\_\_\_\_，〈東亞金融風暴對東協組織的影響〉，《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2 期，民 88.02，頁 55-68。
- \_\_\_\_\_，〈亞洲金融風暴與東亞經濟安全體系之建立〉，《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1 期，民 89.01，頁 1-13。
- \_\_\_\_\_，〈布希政府的東南亞政策與挑戰〉，《問題與研究》，第 40 卷，第 6 期，民 90.11-90.12，頁 53-68。
- 洪淑芬，〈新興工業國家經濟發展的瓶頸〉，《問題與研究》，第 36 卷，第 6 期，民 86.06，頁 39-55。
- \_\_\_\_\_，〈亞洲金融風暴的省思及對我國的影響〉，《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6 期，民 87.06，頁 17-33。
- 洪財隆，〈第三條路？—開放型區域主義之緣起、內涵與進展〉，《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26 卷，第 5 期，民 92.05，頁 14-17。
- \_\_\_\_\_，〈中國與東協建立 FTA 背景分析：兼論我國經貿策略應變之道〉，《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27 卷，第 1 期，民 93.01，頁 115-122。
- 侯真真，〈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與對我國影響〉，《東南亞經貿投資研究季刊》，第 14 期，民 90.12，頁 1-10。
- 孫國祥，〈新區域主義及其對台灣發展的影響〉，《全球政治評論》，第 3 期，民 92.07，頁 83-113。
- 秦宗春，〈國際化與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政治面初探〉，《東南亞季刊》，第 3 卷，第 1 期，民 87.01，頁 80-90。
- \_\_\_\_\_、譚瑾瑜，〈國際機制與東南亞金融危機救援方案：新自由主義之挑戰〉，《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第 8 期，民 88.08，頁 48-60。

- 郝培芝，〈亞歐會議形成的結構性動力與意義：從新區域主義的觀點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1 期，民 93.01-93.02，頁 125-144。
- 陳欣之，〈東協諸國對「中國威脅論」的看法與回應〉，《問題與研究》，第 35 卷，第 11 期，民 85.11，頁 15-33。
- 陳鴻瑜譯，〈東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海華與東南亞研究》，第 3 卷，第 1 期，民 92.01，頁 119-121。
- 張惠玲，〈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共區域霸權目標之影響〉，《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2 期，民 89.02，頁 51-66。
- \_\_\_\_\_，〈中共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之戰略考量評析〉，《共黨問題研究》，第 28 卷，第 7 期，民 91.07，頁 4-16。
- 曾怡仁、張惠玲，〈區域整合理論的發展〉，《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8 期，民 89.08，頁 53-71。
- 黃兆仁，〈東亞區域主義與經濟互賴〉，《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第 6 期，民 87.12，頁 167-184。
- 黃奎博，〈冷戰後中共與東南亞國協之政治合作〉，《國際關係學報》，第 15 期，民 89.12，頁 173-214。
- 蔡學儀，〈亞洲經貿區域化與台灣因應之道〉，《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2 期，民 92.03-92.04，頁 23-53。
- 盧倩儀，〈區域整合理論之比較與評析〉，《美歐季刊》，第 12 卷，第 1 期，春季號，民 86，頁 27-44。
- 蕭全政，〈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與台灣的角色〉，《政治科學論叢》，第 14 期，民 90.06，頁 201-222。
- 譚瑾瑜，〈東亞金融風暴之剖析與啟示〉，《東南亞季刊》，第 3 卷，第 1 期，民 87.01，頁 91-104。

### 三、論文

- 朱 萍，〈論中共與東協成立自由貿易區的戰略與影響分析〉，碩士論文，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民 92。

- 李元桐，〈區域貿易協定之政策發展研究：以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為例〉，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民 92.06。
- 林承正，〈論國際化對經濟調適政策的影響：以亞洲金融風暴中的東協五國為例〉，碩士論文，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民 89.06。
- 林雅慧，〈「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之形成對我國經貿之影響：可計算一般均衡分析〉，碩士論文，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民 92.06。
- 林碧美，〈東亞金融危機之政治經濟分析〉，碩士論文，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民 89.07。
- 陳治萍，〈東協國家的區域性政經發展〉，碩士論文，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民 82。
- 陳建昌，〈國際資金流動對東亞國家的影響—以東亞金融風暴為例〉，碩士論文，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民 90.06。
- 陳揮民，〈後冷戰時期中國大陸與東協關係發展之研究〉，碩士論文，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民 91。
- 潘永仁，〈東協與中華經濟圈競爭或互補關係〉，碩士論文，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民 90.06。
- 薛 釗，〈後冷戰時期我國南海戰略之研究〉，碩士論文，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民 88。

#### 四、報紙及雜誌

-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報告），《人民日報》，民 91.11.09，版 2 及版 3。
- 周大慶，〈日本以鄰為壑的底線在哪？〉，《聯合報》，民 87.06.15，版 15。
- 林 克，〈中國積極推銷「和平崛起論」〉，《商業周刊》，第 867 期，民 93.07.01，頁 110。
- 國際瞭望專欄，〈東協成為亞洲三鼎足之一〉，《中國時報》，民

93.02.20，版 A11。

滄海月，〈中國愛耍賴 國際社會漸不耐〉，《Taiwan News 財經文化周刊》，第 136 期，民 93.06.03，頁 62-64。

## 五、網路

大陸新聞中心，〈大陸、東協 FTA 協商達共識〉，《中國時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5+112004052200085,00.html>，民 93.05.22。

王玉燕，〈中共東協簽署戰略夥伴宣言〉，《聯合報》，  
<http://udn.com/NEWS/WORLD/WOR1/1608553.shtml>，  
民 92.10.9。

王銘義，〈博鰲論壇致詞 胡錦濤：中國盼與亞洲各國平等互信〉，  
《中國時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5+112004042500069,00.html>，民 93.04.25。

王 毅，〈水到渠成 意義深遠—寫在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談判  
即將啓動之際〉，《人民日報》，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464/6068/604840.html>，  
民 91.04.26。

**本報訊**，〈中國—東協十年內將共組自由貿易區〉，《華僑新聞》，  
<http://www.ocn-miami.com/OCN/285/html/ml/ml02.htm>，  
民 90.11.6。

\_\_\_\_\_，〈越南海軍船隻載客赴南沙旅遊 中國保持最大克制〉，  
《國防知識報》，  
<http://jczs.sina.com.cn/2004-05-01/1126196285.html>，  
民 93.05.01。

社 論，〈台灣正逐漸成為東亞政經整合的孤兒〉，《中國時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4+112003101200133,00.html>，民 92.10.12。

- 陳宜君，〈東京宣言 十年內打造東亞共同體〉，《自由時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民 92.12.13。
- 梁東屏，〈中國—東協自由貿區 前途多艱〉，《中國時報》，  
<http://www.future-china.org/fcn-tw/200111/2001110703.htm>，民  
90.11.7。
- \_\_\_\_\_，〈簽署三條約 中共東協空前密切〉，《中國時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  
0,3546,110505+112003100900069,00.html](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5+112003100900069,00.html)，民 92.10.09。
- 國際瞭望專欄，〈日本與東協「友好合作」的障礙〉，《中國時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  
0,3546,110504+112003121300054,00.html](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4+112003121300054,00.html)，民 92.12.13。
- 潘 勳，〈日本東協東京宣言致力擘建東亞共同體〉，《中國時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  
0,3546,110504+112003121300053,00.html](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4+112003121300053,00.html)，民 92.12.13。
- 霍達文，〈東京宣言 日與東協籌設東亞共同體〉，《聯合報》，  
<http://udn.com/NEWS/WORLD/WOR3/1733093.shtml>，  
民 92.12.13。

## 貳、西文部份

### (I) Books

- Anwar, Dewi Fortuna, *Indonesia In ASEAN: Foreign Policy and Regionalism*.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4.
- Balassa, Bel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Homewood, IL: Richard D. Irwin Ltd., 1961.
- Bhagwati, Jagdish, Pravin Krishna and Arvind Panagariya, eds., *Trading Blocs: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Analyzing Preferential*



- Trade Agreement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 Breslin, Shaun, Christopher W. Hughes, Nicola Phillips and Ben Rosamond, eds., *New Regionalism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2002.
- Cline, Ray S., *World Power Trends and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80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1.
- \_\_\_\_\_, *The Power of Nations in the 1990s: A Strategic Assessment*.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4.
- Deutsch, Karl W.,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8.
- Fairbank, John King,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_\_\_\_\_,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_\_\_\_\_ 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Fawcett, Louise and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Frankel, Jeffrey A., *Regional Trading Blocs in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 Funabashi, Yoichi, *Asia Pacific Fusion: Japan's Role in APEC*.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5.
- Gilpin, Rober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_\_\_\_\_,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_\_\_\_\_,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Haas, Ernst B.,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Heenan, Patrick and Monique Lamontagne, eds., *The Southeast Asia Handbook*.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2001.
- Henderson, Callum, *Asia Falling*. New York: McGraw-Hill Press, 1998.
- Hsueh, Chun-Tu, 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New Perspectives*. New York: Praeger, 1982.
-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eds., *Southeast Asia Affair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5.
- Kahler, Miles, e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Deb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 Kegley, Charles W., Jr. and Eugene R. Wittkopf, eds., *The Global Agenda: Issue and Perspectives*. New York: McGraw-Hill Company, 2001.
- Keohane, Robert O.,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 \_\_\_\_\_,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9.
- \_\_\_\_\_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89.
- Kim, Samuel, ed., *China and the World: New Directions i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9.

- Kissinger, Henry,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huster, 1994.
- \_\_\_\_\_, *Dose American Need a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imon & Shuster, 2001.
- Krasner, Stephen D.,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 Lloyd, Richmond M., ed., *Strategy and Force Planning*. Newport, RI: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1997.
- Mansfield, Edward D. and Helen V.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 Mattli, Walter, *The Logic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Europe and Beyon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McLeod, Ross H. and Ross Garnaut, eds., *East Asia in Crisis: From Being a Miracle to Needing One*.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8.
- Morgenthau, Hans J.,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Y: Alfred A. Knopf, 1985.
- Neher, Clark D., *Southeast Asia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Er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9.
- Nye, Joseph S., Jr., ed.,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68.
- \_\_\_\_\_, *Peace in Parts: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Regional Organiz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71.
- \_\_\_\_\_,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New York: Longman, 2003.
- Phongpaichit, Pasuk and Chris Baker, *Thailand's Boom and Bust*. Bangkok: Silkworm Books, 1998.
- Russett, Bruce M., *International Reg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s: A Study in Political Ecology*. Chicago: Rand McNally & Company, 1967.
- Sandhu, K. S., Sharon Siddique and Chandran Jeshurun, eds., *The*

*ASEAN Reader*.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2.

Stoessinger, John G., *The Might of Nation: World Politics in Our Tim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5.

Tilman, Robert O., *Southeast Asia and the Enemy Beyon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7.

Weatherbee, Donald E., ed., *Southeast Asia Divided: The ASEAN-Indochina Crisi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5.

Yeung, May T., Nicholas Perdikis, and William A. Kerr, *Regional Trading Blocs in the Global Economy*.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1999.

## **(II) Periodicals**

Acharya, Amitav, “ Ideas,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From the ASEAN Way to the Asia Pacific Way? ” *Pacific Review*, Vol. 10, No. 3, 1997, pp. 319-346.

Ba, Alice D., “ China and ASEAN: Renavigating Relations for a 21<sup>st</sup> Century Asia, ” *Asian Survey*, Vol. 43, No. 4, Jul./Aug., 2003, pp. 622-647.

Baker, James A., III, “ America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5, winter, 1991/92, pp. 1-18.

Bin Hassan, Mohamed Jawhar, “ Southeast Asia and the Major Powers, ” *Pacific Review*, Vol. 8, No. 3, 1995, pp. 508-517.

Bowles, Paul, “ ASEAN, AFTA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 *Pacific Affairs*, Vol. 70, No. 2, summer, 1997, pp. 219-233.

Buszynski, Leszek, “ ASEAN, A Changing Regional Role, ” *Asian Survey*, Vol. 27, No. 7, 1987, pp. 764-786.

\_\_\_\_\_, “ ASEAN’s New Challenges, ” *Pacific Affairs*, Vol. 70, No.

- 4, winter, 1997-1998, pp. 555-577.
- \_\_\_\_\_, “ ASEAN, the Declaration on Conduc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5, No. 3, 2003, pp. 343-362.
- Cal, Kevin G., “ The ASEAN-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East Asian Regional Grouping, ”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5, No. 3, 2003, pp. 387-404.
- Cheng, Tun-jen, “ APEC an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 Lost Opportunity for Institution-Building? ”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 No. 2, Dec., 1998, pp. 21-32.
- Choi, Young Jong and Nae Young Lee,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d the Americas, ” *Asian Perspective*, Vol. 26, No. 3, 2002, pp. 169-192.
- Cook, P. and C. Kirkpatrick, “ Globalization, Regionalization and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 *Regional Studies*, Vol. 31, No. 1, 1997, pp. 55-66.
- Crowe, William J., Jr. and Alan D. Romberg, “ Rethinking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2, spring, 1991, pp. 123-140.
- Feldstein, Martin, “ Refocusing the IMF, ” *Foreign Affairs*, Vol. 77, No. 2, Mar./Apr., 1998, pp. 20-33.
- Foot, Rosemary, “ China 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Organization Processes and Domestic Modes of Thought, ” *Asian Survey*, Vol. 38, No. 5, May, 1998, pp. 425-440.
- Funabashi, Yoichi, “ Japa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91-1992, pp. 58-74.
- Haas, Ernst B., “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European and the Universal Process**,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15, autumn, 1961, pp. 366-392.
- Hoffmann, Stanley, “ 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Fate of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ase of Western Europe,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Vol. 95, No. 3, 1966, pp. 862-917.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Jr., “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 *Foreign Affairs*, Vol. 77, No. 5, Sep./Oct., 1998, pp. 81-94.

Krugman, Paul, “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6, Nov./Dec., 1994, pp. 62-78.

Kurus, Bilson, “ Understanding ASEAN, Benefits and Raison d’Etre, ” *Asian Survey*, Vol. 33, No. 8, Aug., 1993, pp. 819-831.

Lee, Lai To, “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Conflicts, ” *Pacific Review*, Vol. 8, No. 3, 1995, pp. 531-543.

\_\_\_\_\_, “ China’s Relations with ASEAN: Partner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 *Pacific Review*, Vol. 13, No. 1, 2001, pp. 61-71.

Mathews, Jessica T., “ Power Shift, ”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1, Jan./Feb., 1997, pp. 55-66.

Moravcsik, Andrew, “ Preferences and Power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t Approach, ”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1, No. 4, Dec., 1993, pp. 473-524.

Morgenthau, Hans J., “ Another Great Debate: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6, No. 1, Dec., 1952, pp. 961-988.

Munro, Ross H., “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 *Policy Review*, No. 62, fall, 1992, pp. 10-16.

Nye, Joseph S., Jr., “ Soft Power, ” *Foreign Policy*, No. 80, fall, 1991, pp. 153-171.

\_\_\_\_\_ and William A. Owens, “ 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 ”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2, Mar./Apr., 1996, pp. 20-36.

\_\_\_\_\_, “ 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 *Foreign Affairs*, Vol.

- 78, No. 4, Jul./Aug., 1999, pp. 22-35.
- Ravenhill, John,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Changing Incentives," *Asian Survey*, Vol. 35, No. 9, Sep., 1995, pp. 850-866.
- Rüland, Jürgen, "ASEAN and the Asian Crisis: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Consequences for Southeast Asia Regionalism," *Pacific Review*, Vol. 13, No. 3, 2000, pp. 421-451.
- Ruggie, John G.,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3, summer, 1992, pp. 561-598.
- Sing, Lam Lai, "A Short Note on ASEAN: Great Power Interac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15, No. 4, 1994, pp. 451-463.
- Snitwongse, Kusuma, "Thirty Years of ASEAN: Achievement Through Political Cooperation," *Pacific Review*, Vol. 11, No. 2, 1998, pp. 183-194.
- Stubbs, Richard, "Sub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ASEAN: Military and Economic Imperatives and Political Obstacles," *Asian Survey*, Vol. 32, No. 5, May, 1992, pp. 397-410.
- \_\_\_\_\_, "ASEAN Plus Three: Emerging East Asia Regionalism?" *Asian Survey*, Vol. 42, No. 3, May/June, 2002, pp. 440-455.
- Takashi, Terada, "Constructing An 'East Asian' Concept and Growing Regional Identity: from EAEC to ASEAN+3,"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2, 2003, pp. 251-277.
- Tongzon, Jose L., "U.S.-Singapore Free Trade Agreement: Implications for ASEAN,"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20, No. 2, 2003, pp. 174-178.
- Wang, John and Sarah Chen, "China-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Shaping Future Economic Relations," *Asian Survey*, Vol. 43, No. 3, May/June, 2003, pp. 507-526.
- White III, George O., "Foreigners Beware? Investing in a Jungle with

Mary Predators: The ASEAN Investment Area, ”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No. 37, 2002, pp. 157-176.

Yu, Hyun-Seok, “ Explaining the Emergence of New East Asian Regionalism: Beyond Power and Interest-Based Approaches, ” *Asian Perspective*, Vol. 27, No. 1, 2003, pp. 261-288.

### **(III) Conference Papers**

Wang, Vincent Wei-cheng, “ China’s FTA with ASEAN Countries: Economic Statecraft of ‘ Peaceful Ascendancy ’. ” Paper Presen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Global Changes and Regional Challenges, ”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Mar. 5, 2004.

### **(IV) Documents**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ed., “ ASEAN Declara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9, No. 2, Nov., 1992, pp. 240-241.

ASEAN Vision 2020,

<http://www.aseansec.org/5228.htm>, Dec. 15, 1997.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Ninth Ministerial Meeting Joint Statement,

[http://www.apec.org/apec/documents\\_reports/annual\\_ministerial\\_meetings/past\\_meetings.html](http://www.apec.org/apec/documents_reports/annual_ministerial_meetings/past_meetings.html), Nov. 21-21, 1997.

APEC Economic Leaders Declaration: Connecting the APEC Community,

[http://www.apecsec.org.sg/apec/leaders\\_declarations/1997.html](http://www.apecsec.org.sg/apec/leaders_declarations/1997.html), Nov. 25, 1997.



Basic Agreement on ASEAN Industrial Complementation,  
<http://www.aseansec.org/6377.htm>, June 18, 1981.

Basic Agreement on the ASEAN Industrial Cooperation Scheme,  
<http://www.aseansec.org/6385.htm>, Apr. 27, 1996.

Basic Agreement on ASEAN Industrial Joint Ventures,  
<http://www.aseansec.org/6378.htm>, Nov. 7, 1983.

Basic Agreement on ASEAN Industrial Projects,  
<http://www.aseansec.org/6373.htm>, Mar. 6, 1980.

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ern II,  
<http://www.aseansec.org/15159.htm>, Oct. 7, 2003.

Foreign Closer ASEAN-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http://www.aseansec.org/newdata/asean\\_chi.pdf](http://www.aseansec.org/newdata/asean_chi.pdf), Oct., 2001.

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arat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www.aseansec.org/13196.htm>, Nov. 4, 2002.

Joint Press Statement of the 29<sup>th</sup> ASEAN Economic Ministers Meeting,  
<http://www.aseansec.org/1887.htm>, Oct. 16, 1997.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rand-to-Brand Complementation o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under the Basic Agreement on ASEAN  
Industrial Complementation (BAAIC),  
<http://www.aseansec.org/6382.htm>, October 18, 1980.

#### **(V) Newspaper**

Associated Press (AP), “ ASEAN to Tackle Drugs, Terrorism, ” *China Post*, Jan. 7, 2004, p. 5.

Perlez, Jane, “ Asian Leaders Find China a More Cordial Neighbor, ”  
*New York Times*, Oct. 18, 2003, p. A1.

Rosenfeld, Stephen S., “ Free Trade Can’t Be the Cure for Everything, ”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 22, 1997, p. 8.

**(VI) Internet**

Oorjitham, Santha, “From Our Correspondent: ASEAN+3 = EAEC, ”  
*Asiaweek*,  
<http://www.asiaweek.com/asiaweek/foc/2000/03/15/>, Mar. 15,  
2000.

Official Web Site of ASEAN: <http://www.aseansec.org/>